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近代后期政治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为百卷本《世界全史》之一，描述的是 19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末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党活动、政治思潮、国际关系以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等等。对于欧洲来说，本书以 1815 年拿破仑战败和维也纳会议为开篇，写到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比欧洲起步要晚，本书主要介绍 19 世纪中、后期这些地区广大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本国封建势力、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本书还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近代后期的政治状况，重点阐述了美国的领土扩张、南北战争和两党制度的形成，以及加拿大的短暂历史、政治制度和主要政党等。

一、概述

1. 世界近代后期的基本矛盾

世界近代是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影响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先进与腐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世界近代后期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尖锐激烈。

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欧洲近代早期居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革命和改革摧毁了封建统治，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起来，并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向全世界辐射扩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起步较晚，这一矛盾直到近代后期才突出起来，但直到整个世界近代史终结，这些地区还没有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在打击和铲除封建主义的过程中，“革命”起到了历史火车头的作用，而“改革”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一般是通过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通过政治、经济改革确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在德国、俄国和意大利，主要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改革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革命和改革并行，相辅相成，使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

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在近代，这一矛盾在欧美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有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1868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诞生，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领导地位。1889年又在恩格斯指导下建立了第二国际。

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近代后期也很尖锐。这一矛盾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列强对各被压迫民族的统治和掠夺，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各国之间争夺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最高形式是列强之间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英布战争和美西战争都是列强之间争夺和瓜分世界的战争。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在近代世界形成了一个附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很复杂，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纠缠在一起，人民大众、本国的统治阶级以及外来殖民势力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民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矛盾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反抗外来侵略势力，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抗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构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近代后期政治史的主要内容。

2. 拿破仑时代结束后欧洲政治形势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在

反法斗争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法国首都巴黎，表明俄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整个欧洲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亚历山大企图扮演拿破仑的角色，摆出了“欧洲和平仲裁人”的架势。英国早已拥有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优势，它在欧洲大陆新的政治目标是：保持势力均衡，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并防止任何大陆国家取代拿破仑帝国的地位，首先要阻止俄国取代法国。两个德意志世敌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为共同反法缓和过彼此之间的矛盾，拿破仑帝国垮台后，双方又都瞄准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目标。曾被拿破仑推翻和征服过的欧洲各国大小王室都企图恢复昔日的统治。

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曾使欧洲英、俄、普、奥四大国暂时联结在一起，战争一结束，盟国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出来。然而，它们不可能立即通过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问题，就产生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势力范围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它为国际间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使欧洲在一个世纪内免受大规模战争的洗劫。尽管1853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和1870年发生了普法战争，尚都属于局部性战争。所以，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的影响超过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条约，可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

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各国普遍要求改革现状，发生了法国1830年革命，波兰1830年起义，比利时1830年革命，签定了温加尔·伊斯克列西俄土条约（1830年7月8日），召开了1833年俄、奥、普三国君主会议，1840年英、奥、普、俄签订伦敦协定，以及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

50—60年代，英国工业垄断地位形成，并疯狂进行海外掠夺和殖民扩张。国内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掀起了第三次选举改革运动。英国的殖民统治激起了爱尔兰人的英勇反抗，马克思和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时期的法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拿破仑三世在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同时，对外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远征墨西哥的失败加深了第二帝国的危机，各种反拿破仑力量不断增长。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的失败埋葬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也结束了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普法战争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德意志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

在60年代，俄国实行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从此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掠夺和统治，激起波兰人民的不断反抗。1863年的波兰民族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成为波兰由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

3.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亚洲的觉醒

亚洲大陆是世界文明发祥地，曾经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然而当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结束中世纪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时候，亚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封建的和封闭的社会阶段，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制度腐朽落后，给欧洲列强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开始侵入亚洲，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随后是英国、俄国、法国，接着是美国。最初他们以通商为名，接着是武力占领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大片大片地侵吞亚洲各国的领土和搜刮各国的财富。到20世纪初期，亚洲有2/3地区完全沦为殖民地，将近1/3的地区成为

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唯有日本例外，明治维新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锁国政策被美国炮舰打破之后，它迅速适应新情况，国家很快强大起来。同时，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1894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目的是掠夺中国的藩属朝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在近代是大大落伍了。当西欧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之时，中国却滞留在封建社会中，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处于完全封闭状态，社会前进的脚步极为缓慢。机构庞大的帝国政权、层层封建官僚统治、以维护皇权为基础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造成了中国人落后、愚昧和盲从的心态。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对世界形势冷漠无知，甚至到19世纪初年仍然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丝毫不清楚正在崛起的西方世界的力量、地位和政策，更没有预感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当西方殖民国家迫使中国开国、企图开辟和占领中国市场、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之际，中国统治者手足无措，只能被动应付，以致于最后妥协投降。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中国国内要求改革和维新运动的高涨。1898年出现了“百日维新”。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残酷镇压。

日本和中国原来都是封建专制国家。中国的戊戌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以西方为榜样，以改革为手段，企图并不根本触动封建特权而发展资本主义。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固然由于两国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不同以及维新之前政局之差别，亦有在维新过程中具体方针路线、领导力量及阶级基础之不同及国际环境之差异。

明治维新把政权的改革和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并以暴力摧毁旧政权为前提，社会改革的条件也较为成熟。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已有“藩政改革”，并且维新派代表人物大权在握，又有下级武士的支持。而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维新领导人基本上是学者、书主，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主要在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寻求支持。尽管中国维新运动的思想宣传比日本广泛深入，但在政治作为方面则大大不如日本。尽管如此，戊戌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觉醒的表现，是有深远影响的。

殖民侵略加剧了亚洲人民的苦难和落后，也引起了亚洲人民的强烈反抗。近代亚洲出现三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9世纪中叶，中国、印度、阿富汗和伊朗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大都失败了。第二次高潮是在19世纪末，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第三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是在20世纪初年。这些都表明沉睡的亚洲在觉醒。

资本主义对亚洲的侵略，也给亚洲带来了西学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非殖民者的善意。开国之后，各国封建统治者一般都进行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革，如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幕政改革。第二次革命高潮之后，亚洲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兴起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如土耳其奥斯曼新党的立宪活动、印度的国大党运动、菲律宾联盟的改革活动及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等。所有这些改革和改良运动大都失败了。

4. 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非洲人民的反抗

非洲从 15 世纪起就遭到欧洲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在长达 300 年之久的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 1 亿人口。残酷的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发展是摧毁性的。19 世纪初，许多国家开始禁止奴隶贸易，但非洲大陆又被西方列强逐步占领和瓜分。到 19 世纪中叶，葡萄牙侵占了安哥拉和刚果河河口地区；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殖民地，并在黄金海岸沿岸地区和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建立了殖民统治；法国则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占领地，并沿塞内加尔河向上游推进。

非洲人民为了自由和解放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和斗争。19 世纪的重大斗争有：埃及人、苏丹人和阿散蒂人、祖鲁人的抗英斗争；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卫国战争；马格里布诸国人民的抗法斗争等。非洲人的失败加速了非洲殖民地化的进程。

在非洲各族人民英勇反抗殖民者入侵的时候，许多沿海国家及某些内地国家的统治者已深深地被奴隶贸易所腐蚀，他们满足于自己得到的好处，甚至与殖民者相勾结，甘心在殖民者保护下充当代理人。

非洲各族人民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权利的斗争也加速了 18 世纪末尚处于氏族部落制度下各民族的种族融合。非洲各族人民的力量虽然很单薄，但他们不屈不挠，反抗斗争日益发展，充分表现了非洲大陆在觉醒。

5. 拉丁美洲社会特色

19 世纪 20 年代，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南美的三个圭亚那仍为英、法、荷殖民地，西属印度群岛除海地外也还在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控制之下。

拉美的独立战争使所有的国家（巴西除外）都建立了共和政体，出现了欧洲式的与教会和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殖民地时期就享有特权的教会、军人和地主，推翻了西班牙统治、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继续保持并扩大了他们的特权。拉丁美洲独立后，政治上的“考迪罗主义”盛行。但“考迪罗”统治的时间都不很长，最短的只几小时，最长的也只是几年，然后就被其他“考迪罗”推翻和取代。玻利维亚从 1825 年至 1852 年发生 179 次武装政变；墨西哥独立后到 19 世纪末，更选了 72 个执政者，其中有 60 个是通过“考迪罗”式政变上台的。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动荡不安。各殖民国家继续争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权，极力在各国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独立后的各国之间存在着领土纷争，导致了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频繁战争，而英、美则竭力利用这些矛盾和战争在幕后争夺贸易、领土及政治的控制权，例如 1825—1828 年巴西、阿根廷为争夺乌拉圭的战争；1864—1870 年的巴拉圭战争；1879—1883 年的太平洋战争等等。

拉丁美洲各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进行得很不彻底，各国经济力量十分薄弱，使外国资本的渗透有机可乘。19 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在拉美的渗透令人注目。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仍然是欧美列强角逐的场所。

泛美主义的出现是世界近代后期在拉丁美洲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潮流。威廉·福斯特认为，泛美主义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与美洲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政治潮流；第二种是美国垄断集团利用泛

美主义作为称霸西半球的政治工具。由于美国的迅速强大，后一种情形往往成为主要趋势。美国在 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进而把这个口号演化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与泛美主义的第二种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渗透方面，美国比英国迟了一步，但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疾起直追，出现了英国的优势逐渐被美国取代的趋势。

6. 美国和加拿大的新发展

在世界近现代，美国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这是勿庸讳言的。美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诞生的新国家，它是在较好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摄取了较高的欧洲文明和生产力，并以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为动力；它从一开始就吸收了人类优秀的政治思想营养，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理论对美国国家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另外，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因而也能从全世界吸取精华。有学者说“美国是人类青年时代的宠儿”，不无道理。当然，美国的发展与它实行的领土扩张政策和强权政治有直接关系，许多国家都饱受过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经济侵略之苦。但是作为一个仅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能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国，其治国经验还是值得研究的。

在北美，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年轻国家加拿大也值得一提。根据不列颠北美法案，1867 年 7 月 1 日宣告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当时称加拿大自治领，确立了联邦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官方语言实行双语制，即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多元主义渗透到加拿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尊重人权、忍让和克制是普遍被接受的行为准则。加拿大在开国后的近百年间似乎与世无争、默默无闻，在大大小小的国际事务中很难看到它的影响。但在近一二十年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一个美丽发达的加拿大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仅有一百多年的建国历史，现在跻身于世界七大经济强国之列，其治国之道值得借鉴。

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多元文化主义是产生于加拿大的一种文化思潮，也是加拿大政府现行的官方政策。

加拿大人解释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意思是：各种各样出身和族裔的人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加拿大社会生活，同时自由地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是在加拿大创造出来的，其根基在历史上很早就奠定了。土著人是唯一拥有土生土长文化的加拿大人，而土著社会就曾是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社会。土著人士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是移民来加拿大的。移民始于 1600 年前后，他们带来了各种特殊的文化习俗。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来到加拿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当属这片土地的开拓者。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 20 世纪初年，大量的东欧和北欧人为了寻求土地和自由，移民加拿大，使加拿大的传统更加多姿多彩。20 世纪加拿大向世界大开门户，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定居加拿大，使加拿大真正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国家。据 1981 年统计，加拿大人口的 31.3% 都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的后裔。1986 年，申报非英国或法国出身的加拿大人有 938 万，占全国 2540 万人口的 37.5%，其中包括土著人。人数较多的族裔有：德国人、意大利人、乌克兰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兰人、北美印第安人、中国

人、犹太人、印度—巴基斯坦人、黑人、匈牙利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和俄国人。

在具有多民族文化背景的加拿大，在建设自己国家的过程中，他们认为发现了一个真理，即为了联合如此众多不同的并且往往是颇为分歧的各方面人士，就必须有容忍和灵活精神。这在当代的加拿大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并影响到国家的政策。

自 1971 年以来，加拿大的大多数省份都制定了一系列正式的多元文化政策和计划；1972 年任命了主管多元文化的部长。多元文化主义于 1982 年列入加拿大宪法和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1988 年 7 月加拿大政府还专门颁布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正式承认本国的多元文化性质，表示在联邦法律中把多元文化国家的各种价值观念奉为神圣，坚持下去。该法规定，每个公民不论其民族出身如何，都应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国内集体生活的一切方面，并为之做出贡献。它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在其各个部门与机构中促进贯彻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人认为，多元文化法的制定是破天荒的创举。

对加拿大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秩序非常稳定的国家，大多数人安居乐业，或许多元文化主义正是维系这个社会的重要纽带之一。

二、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

1. 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

反拿破仑战争使欧洲英、俄、奥、普四大国暂时结盟，并由于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拿破仑时代的结束而出现了新的国际格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欧洲和平仲裁人”自居，企图重新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英国则力图保持欧洲均势，一方面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另一方面遏制俄国取代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世敌之国则想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角逐中一决雄雌；曾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各国大小王室都渴望恢复失去的“天堂”。总之，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力和无意立即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形成了维也纳体系。

(1) 拿破仑战败和维也纳会议

拿破仑（1769—1821年），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史称拿破仑一世，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他不断对外用兵，多次粉碎欧洲反法同盟，严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但也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和侵略性。1812年，在对俄战争中失败，势力大衰。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被放逐到地中海厄尔巴岛。1815年3月，他又率领千人的军队从流放地出逃，20日重返巴黎，再登王位。这时，英、普、奥、俄等君主国十分恐慌，又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以22万军队分兵6路进攻法国。6月18日，反法联盟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大败拿破仑军队（约11万人）。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拿破仑这一次从称帝到退位，约百日之久（3月20日至6月22日），史称“百日”王朝。拿破仑宣布退位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1821年5月5日病死于圣赫勒拿岛，终年52岁。

维也纳会议于1814年底至1815年6月上旬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它是欧洲各国打败拿破仑后处理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其实质是一次消除法国大革命影响、恢复封建统治秩序、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和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

1814年5月30日，第六次反法联盟国家（俄、英、奥、普）曾与法国签订巴黎和约。后来，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参加了条约的签订。该条约对法国相当宽容，既没有让法国割让土地，也没有要求交付赔款和撤走驻扎的占领军，只要求法国退回到1792年的边界，甚至法国还扩大了150平方公里的地盘。根据巴黎和约，虽然法国被置于反法国家的包围圈之中，但由于它保有相当广阔的领土，其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并未真正丧失。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也是巴黎和约的一项规定。和约第32条规定：“凡加入战争的国家，无论属于哪方面，都应在两个月内派遣全权代表到维也纳开会，以便在全体会议上作出补充本条约各项规定的具体安排。”

除了土耳其（其领土跨欧亚两洲）之外，所有欧洲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216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奥地利首相兼外长梅特涅。操纵会议和起决定作用的是俄、英、普、奥四强的首脑。由于法国代表塔列兰的外交才干，使法国挤入四国行列，成为五国委员会的成员，使维也纳会议实际上成为五国会议，一切问题均由五国决定。除了讨论“最后总决议案”外，所谓的维也纳会议从未开过正式

全体会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梅特涅的书房里决定的。大多数代表无所事事，6个半月的时光都是在宴会和舞厅中打发的。奥皇弗朗西斯日复一日地举行招等会，每晚宴席40桌，庭院中排满了马车，厩中之马多达1400匹。

各列强在领土瓜分问题上充满矛盾和斗争，主要集中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意大利问题也是争论较多的议题。经过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815年6月签署了“最后总决议案”，实际上是由八个国家签署的（原来的英、俄、奥、普、瑞典、西班牙、葡萄牙七国，加上法国）。这次会议，强权政治表现得异常明显。

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俄皇兼任国王；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保护下的一个共和国。

英国获得了荷兰在好望角和锡兰的殖民地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等地，保持了它的贸易优势和海上优势。英国是获利最多的国家。

普鲁士获得了萨克森的一部分和瑞典领土的一部分；瑞典则从丹麦取得挪威作为补偿。

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底和威尼斯等地。

德意志的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德意志邦联。比利时（尼德兰）和荷兰合并为尼德兰王国。

各列强一致同意法国代表、外长塔列兰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肯定法国革命前的封建王朝，恢复其统治权力、政治体制和所属领土。这个原则成了维也纳会议的旗帜。会议秘书长、梅特涅的亲信根茨以目击者的身份评论说：“大会发出响亮口号：‘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欧洲政治制度’、在‘公平的力量配备’的基础上建立‘持久和平’等等，都是为了安抚各国人民，为了使这次隆重的大会带有一些崇高、庄严的性质；但是，大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战胜者瓜分战败者的遗产”。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认为是反法联盟的主帅，计划在欧洲建立由他起决定影响的局面，并且形成使欧洲列强不可能联盟反俄的政治均势。他基本上采取了压奥扶普政策，并把法国作为抵制迟早会兴起的德意志帝国的潜在盟友。他曾一手包办了第一次巴黎和约，在维也纳会议上直接提出了对波兰的具体领土要求。

英国代表卡斯尔累勋爵的政策是维持和巩固海上的非均势（霸权）和建立欧洲大陆的均势，以使英国进一步巩固在海上、殖民和工商业中的霸权，保持住战时夺取的通往印度道路上的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所以在会上英国竭力争取得到有价值的战略据点，例如马耳他和开普敦。英国特别害怕法国复兴，致力于在法国周围建立屏障，故尔支持普鲁士有关莱茵各省问题上的立场；并反对俄国兼并波兰的计划，以抑制俄国的过分强大，从而保持大陆的均势。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维也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战略思想是：在东、西欧实现均势，法俄互相牵制，从而保持奥地利的实力，维护其在德意志世界的优势。他采取了接近法国的策略，拥护塔列兰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认为主权是国王独有的权利，不能容许各民族人民分享。他反对一切自由和民族解放运动，并认为这种运动是对正统主义的侵犯，必须镇压。他的目的就是维护奥地利殖民帝国对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的统治。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出席了维也纳会议，他的政策基点是获得萨克森的全部和莱茵河两岸的重要领地，但其实力不足，在整个会议期间依附于俄国，

看俄国脸色行事，在会议上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法国实质上是作为战败国出席会议，但是由于法国代表塔列兰善于利用战胜国之间的分歧，在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效地捍卫了法国利益。他的目标是保持住 1814 年第一次巴黎和约确定留给法国的那些领土。他一再标榜“我什么也不要，我只给你们带来一样重要东西——神圣的正统主义原则”。这使他在会议期间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由于四强在会议开始不久就形成了两营对垒的局面，俄普为一方，英奥为一方，法国这个昔日的敌人则成为双方都力图争取的一个盟友，这使塔列兰看到了尽可能维护法国利益的机会和希望。

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性质，恩格斯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

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第一次被包括在一个共同的条约体系内。这是一个暂时维持和平的体系。由于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文件和 1815 年 11 月 20 日第二次巴黎和约的签订，欧洲出现了均势局面。尽管后来亦有种种曲折，但维也纳体系基本维持到 19 世纪 50 年代。

（2）神圣同盟

维也纳会议后，俄、奥、普三国君主于 1815 年 9 月 16 日在巴黎发表宣言，建立神圣同盟。首先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欧洲盟主自居，要求奥王和普王同他缔约结盟。三国宣言发表后，又以俄、奥、普三国君主的名义邀请各国签字。除了英国、土耳其和梵蒂冈以外，欧洲各国君主都在盟约上签了字。他们号召各国君主共同保护基督教教义和君主制。

神圣同盟宣言包括一段绪言和三条约文。绪言指出，俄、普、奥三国君主深感必须根据基督教教义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文则表示“缔约三国的君主将一致以一种真诚的与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去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约文还宣称他们“仅仅是受上帝之托，前来治理属于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即奥、普、俄三国，因而承认包括他们与他们的人民在内的那个基督世界除上帝外，实际上别无至尊之主”。言外之意是说三国君主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尊卑之别。神圣同盟只有“相互救援”的原则空话，而无互相制约的具体条件，所以它不是一个需要履行一定义务、名副其实和手续完备的协定。梅特涅评论说，这是一个“空洞而响亮的文件”。卡斯尔累说，它充满“神秘主义和胡言乱语”。但无论如何，神圣同盟实质上是强烈的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思想的产物。它主张用武力镇压任何地方发生的革命和扼杀政治上、宗教上的民主自由，这对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它是欧洲反动君主共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革命的同盟。梅特涅是神圣同盟的中心人物，而俄国则利用神圣同盟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

神圣同盟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15 年 9 月同盟成立到 1822 年末。这期间同盟召开过三次会议，组织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第二阶段从 1823 年初至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这期间，同盟内部矛盾和分歧越

来越严重，只举行了一次会议，也是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

1818年9月，应法国的要求，“欧洲国家同盟”在埃克斯·拉·夏佩勒（位于原西德，德文称亚琛）举行会议，亚历山大一世、梅特涅、卡斯尔累、哈尔登堡以及法国的黎塞留公爵出席。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法国已付清了赔款而提前从法国撤出盟国占领军的问题。条约于10月9日签字，同年11月底以前占领军撤离法国。四列强公开声明，向法国表示“这个庄严的条约造成了普遍和平”，并邀请法国参加四国同盟，法国表示同意。11月15日，五国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五列强的目的在于维持和平，保障已签订的协定。从而，法国恢复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在亚琛会议上，亚历山大挑起了一场重要争议。他提议签订一项公约，规定各国应互相保证彼此的领土所有权和当时的政治制度。他还提议建立一支以俄国军队为核心的国际军队。他的提议遭到英国和奥地利的强烈反对。英国认为同盟条约只是防止法国重新发动侵略的手段，决不能构成欧洲超政府的基础。奥地利更害怕邻国沙俄帝国的强大对它构成的巨大威胁。这一争论表明神圣同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1820年，在意大利境内的那不勒斯、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都爆发了革命，威胁到奥地利在伦巴迪亚和威尼西亚的统治，梅特涅建议召开五国（英、俄、奥、普、法）会议。同年10月，在奥属西里西亚的特洛波召开了神圣同盟第二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镇压意大利革命的问题。11月19日，俄、奥、普三国签署了《特洛波议定书》，宣布缔约国的君主有权对任何一国发生的起义不经他国邀请而实行武装干涉，并将因革命而引起政府变动的国家开除出神圣同盟。英法虽然反对“干涉原则”，但暗示自己不会阻挠奥地利的武装干涉。

1821年1月，在南斯拉夫的莱巴赫继续召开会议，作为神圣同盟的第三次会议，实际上是特洛波会议的继续。会议邀请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参加。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镇压了革命，并恢复了斐迪南一世的王位。4月10日，奥军又会同撒丁王国军队剿杀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

1822年10月至12月，欧洲列强在意大利的维罗纳举行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俄、奥、普、英、法及意大利等国。会议讨论了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的命运、希腊起义及俄土冲突等问题。由于英国的反对，维罗纳会议放弃了武装干涉南美殖民地的计划。这次会议既达成了协议，又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后神圣同盟再没有召开会议。从组织上看，至此神圣同盟已经瓦解。

2.19 世纪 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

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一片白色恐怖，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复辟，贵族僧侣趾高气扬。但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是阻挡不住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大陆仍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的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在20—30年代，先后爆发了西班牙革命（1820—1823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革命（1820—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年）、法国七月革命（1830年）、比利时革命（1830年），以及1830年和1836年的波兰起义，其中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1）西班牙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

1820—1823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是西班牙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自由派贵族就曾领导过 1810—1814 年的西班牙第一次革命，颁布了《1812 年宪法》，确立了最高权力属于国民的原则。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且国王仍然拥有很大权力。拿破仑帝国垮台后，革命政权被推翻，斐迪南七世重登王位，他取消了 1808—1814 年间实行的一切民主改革，恢复了旧制度。斐迪南下令逮捕他的政敌，并亲自参加审判。议会和各省委员会的名流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大批自由派贵族被监禁和流放，12000 名革命者被逐出国外。六年战争使西班牙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814 年 9 月，爆发了米纳将军领导的那瓦尔起义；1815 年 9 月，狄亚士·波雷尔领导了一场军队起义；1817 年 4 月，拉西领导了塞罗纳及其附近驻军的反封建专制的斗争；1819 年 7 月，基罗加上校领导的一伙军官策划了抵制斐迪南政府派遣远征军镇压西属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义，但因叛徒告密而流产。

以上起义和斗争成为西班牙革命的前奏。同时，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也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西班牙国内革命的爆发。

1820 年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就是拉斐尔·里埃哥领导的起义。里埃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熏陶，参加过 1808—1814 年反拿破仑的独立战争。1820 年 1 月，拉斐尔·里埃哥发动了起义。他以恢复《1812 年宪法》为号召，受到所到之处群众的热烈欢迎，但终因众寡悬殊，起义失败。与里埃哥起义相配合，基罗加也领导了一支 3 千人的起义队伍，最后因孤立无援而投降。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唤醒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1820 年 2 月，科隆尼亚举行起义，弗罗尔和西北部其他一些城市也纷纷响应，起义的旗帜仍然是恢复《1812 年宪法》。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斐迪南七世屈服，3 月 9 日以后任命了新政府，成员大都是自由派贵族，又称“十二年代人”，以奥古斯丁·阿尔奎列斯为首。7 月 9 日新议会开幕，议会里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矛盾。温和派是以“十二年代人”为核心的保守派，主张与国王妥协，得到城市大资产阶级、官吏、军官、自由派贵族和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激进派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主要领导人是里埃哥和基罗加。这一派得到官吏和自由派贵族中民主分子的拥护。他们坚决拥护《1812 年宪法》，要求限制王权，但没有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

1822 年 3 月 1 日举行新议会选举，激进派获得巨大胜利，里埃哥当选为议会主席。8 月 5 日，激进派组成了政府，并对 7 月叛乱的策划者进行审判，软禁了斐迪南七世。不久新政府又摧毁了保皇分子在西、法边境上建立的所谓摄政机关，巩固了新政权。

里埃哥等人没有重视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重视农民利益，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是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神圣同盟的武装干涉是西班牙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西班牙革命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1820 年 7 月，那不勒斯爆发革命；同年 8 月，葡萄牙爆发革命；翌年 3 月，皮埃蒙特爆发革命；同年还爆发了希腊反对土耳其民族压迫的独立运动。

（2）意大利 1820—1821 年革命

意大利曾多年为拿破仑帝国所控制，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则成为意大

利的主宰，并且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根据维也纳会议决议，意大利境内的原来各邦国都恢复了封建统治秩序，梅特涅同各君主国缔结同盟，无条件支持专制制度，镇压民主运动和革命组织，拿破仑占领时代的文武官员都被免职，现政权和军队的高级职务为特权等级所垄断，教会的势力得到加强。反动的政治统治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社会经济的发展，1815—1820年间，整个意大利经济处于极度萧条之中。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引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普遍不满，烧炭党成为反抗黑暗统治的核心力量。

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1820年7月在那不勒斯王国爆发革命，诺拉城的驻军（类似民兵的组织，成员多为烧炭党人）在古里叶里莫·佩帕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并收服了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国王斐迪南一世被迫同意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和成立自由派政府。但同时斐迪南又向神圣同盟求援，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革命。1821年3月下旬，奥军占领了那不勒斯城，斐迪南一世重登王位，以极残酷的手段报复革命者，数以百计的人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处死，数千人被流放。南方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在那不勒斯革命失败的前夕，烧炭党人、自由派贵族桑托雷·迪·桑塔罗萨伯爵为首的一批军官在意大利北方皮蒙特发动起义，要求颁布宪法和对奥地利作战。皮蒙特起义者和那不勒斯起义者一样不明确起义的性质和奋斗的目标，只希望能有一个代表自由派利益的开明君主，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曾把希望寄托在革命时期刚刚被指定的王储查理·阿尔伯特身上。由于奥军的介入，皮蒙特最终又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复辟势力对革命者大肆反攻倒算，起义领袖被迫逃亡国外。梅特涅还派遣警察到伦巴底侦察同起义军及烧炭党人有联系的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在伦巴底实行白色恐怖之时，教皇领地也发生了革命，意大利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小规模起义。

意大利1820—1821年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人势力的强大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革命队伍本身的脆弱和不成熟。他们不能发动广大城乡群众参加斗争，革命尚限于军事暴动和密谋，尤其是对国王抱有幻想。意大利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它动摇了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

（3）希腊1821—1829年民族独立运动

15世纪中期，希腊几乎全部在土耳其统治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由于俄国的干涉和俄土矛盾，实际上希腊处于半独立状态。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希腊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增长，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开始进行争取希腊独立及酝酿建立共和国的宣传和斗争。拿破仑战败后，希腊人民一度把民族独立寄托在维也纳会议的公正裁决上，但会议完全违背希腊人的意志，仍维持土耳其在希腊的统治。

1814年，希腊商人和旅居国外的希腊侨民在敖德萨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友谊社”，领导人是贵族出身、并在俄国军队中服过役的亚历山大·伊普西兰狄。1821年3月间，多瑙河沿岸的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两公国举行了反对土耳其占领的起义。伊普西兰狄率军进入摩尔达维亚。由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俄国的支持上，结果求援落空，加上起义军内部的分歧，土耳其军趁机而入，6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是，反抗的烈火却燃遍希腊半岛各地，到1821年底，希腊很大一部分地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

1822年1月，在厄皮道尔召开代表会议，宣布希腊独立，成立了国民政

府，会议通过了《厄皮道尔宪法》。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宪法，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参议院。政府或参议院的成员都是富有的船主和贵族代表人物。范纳尔 贵族马夫洛考尔达多当选为希腊共和国总统。

希腊的独立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和仇视。土耳其残酷镇压希腊独立运动，仅在开俄斯岛，一次就屠杀希腊居民 23000 人，把 47000 人卖为奴隶，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大惨案。希腊人民没有为此而退缩，继续坚持斗争。但是，在希腊革命营垒内部也充满矛盾和斗争。以马夫洛考尔达多为首的掌权派“亲欧”，与英国关系密切，并希望保持现政权，不愿将革命引向深入。以科洛卡特罗尼斯将军为首的游击队没有掌权，是民主派，与俄国关系密切。两派的矛盾导致了内战的发生，结果民主派失败。

1827 年 4 月，希腊召开第三次国民议会。长期在俄军服役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当选为总统，倾向英国的理查德·丘奇爵士和科克伦勋爵担任海陆军的统帅。希腊国内亲俄势力得到加强，而欧洲列强都不想容忍某一国单独在希腊称雄。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1827 年 7 月 6 日，俄、英、法三国在伦敦签订公约，承认希腊自治。土耳其拒绝该公约，仍然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 1828—1829 年在俄土战争中土耳其失败后，于 1829 年 9 月 14 日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土耳其才承认希腊独立。

希腊的独立运动经过 9 年曲折艰苦的斗争才最后完成。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的欧洲革命运动中，希腊是唯一获得胜利的国家，也是巴尔干半岛最先取得独立的国家。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是一场反对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对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4）俄国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19 世纪初，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奴制占统治地位。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迫切要求废除农奴制。广大的农奴和工人也深受农奴制压迫之苦，成为反对农奴制的坚定力量。在 19 世纪第一个 25 年里，爆发农民起义 281 次，平均每年 11 次。工人暴动和士兵暴动也不断发生。1800—1824 年间工人暴动 64 次；1816—1825 年间士兵暴动 25 次。俄国人民反农奴制的斗争高潮迭起，说明农奴制已濒临危机。

19 世纪初，一批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青年形成了革命团体“十二月党人”，成为反农奴制运动的鼓动者。他们在大学或军官学校学习时期，就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拉吉舍夫等人先进思想的启蒙和法国革命的熏陶，后来又经受了反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认识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成为俄国第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从 1816 年开始，“十二月党人”先后建立了许多秘密团体，中间几经改组，最后于 1821 年建立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特尔，思想先进，知识渊博，是南方协会的领导人。他于 1816 年 8 月被吸收加入救国协会，同年秋当选为协会章程起草小组的成员，草拟了《祖国忠诚子弟协会章程》的绝大部分。该章程草案于 1817 年 1 月被协会成员会议通过，使救国协会有了比较明确的纲领。他还组织了救国协会唯一的外省分会——米塔瓦分会。他早时拥护君主立宪制，1818

范纳尔是君士坦丁堡一个市区的名称，奥斯曼帝国统治希腊后，贵族豪绅多居于此，故名。

年所写《关于国家管理札记》表明了他的这一基本政治立场；1820年所写的《社会——政治论》，仍宣扬以实现君主立宪制为目标。1821年3月，南方协会的成立，表明他已转向共和主义立场。1822年1月，在南方协会的基辅会议上他系统地提出了共和国方案。次年，这一方案被通过为南方协会纲领。1824年1月南方协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他主笔的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草案提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共和政体、解放农奴并分给他们土地等主张。

北方协会主要领导人是尼基塔·莫拉维也夫。他于1821年起草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宪法，并希望该宪法能成为北方协会的纲领。协会中的一些成员信仰共和主义，不同意他的主张。俄历1826年4月27日，莫拉维也夫受审时曾说：“如果皇族那时候不接受宪法，那么我认为只有采取断然的手段放逐他们，并建议建立共和政体。”这说明莫拉维也夫也并不固执君主立宪制的主张。1824年，彼斯特尔来到彼得堡与北方协会谈判合并事宜，关于政体问题，最后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实行共和制；致于革命胜利后是否实行临时革命政府专政则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可见，南、北方协会在基本政治主张方面是趋向一致的。南、北方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皇位继承问题出现混乱，“十二月党人”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

亚历山大一世无嗣，根据罗曼诺夫王朝的传统，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应由其二弟康斯坦丁大公继位。但他与波兰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姑娘结婚，不宜再作沙皇，于是内定由尼古拉接替亚历山大一世。但亚历山大生前未向全国臣民公布这一重要决定。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沙皇政府文武官员则向康斯坦丁宣誓效忠。康斯坦丁也不公开宣布放弃皇位，以使尼古拉无法继位，造成了俄国历史上的“皇位空缺”时期。后来，尼古拉等得不耐烦，宣布俄历12月14日由全国文武官员向他“再宣誓”。

“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杜马决定利用“再宣誓”之机，以武力胁迫枢密院发布他们拟定的《告俄罗斯人民书》，若遭拒绝便举行武装起义。尼古拉一世得知北方协会的计划后，把“再宣誓”的时辰提前，打乱了起义者的计划。12月14日，起义士兵开到参议院广场时，尼古拉一世即位的礼仪程序已结束，起义的指挥官谢·特鲁别茨伊公爵背叛起义也未到广场，起义失去了主动性。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调遣4倍于起义者的兵力前来镇压，起义失败。

1825年12月29日（俄历），南方协会也发动了起义。起义者攻克了瓦西利科夫城，几乎全体官兵都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达到了高潮。12月31日，起义军到达莫托维洛夫卡镇后，附近农民听说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农奴制，纷纷表示对起义的拥护，有些农民则要求参加起义队伍。但起义领导者死抱着军队起义的方针，拒绝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次年1月3日（俄历），起义军在特利列斯村被政府军镇压而失败。

尼古拉一世以极残酷的手段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和报复，共有579人被提交法庭审判，彼斯特尔、雷列耶夫等5名起义领袖被处以绞刑，许多起义士兵被鞭笞致死，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公开武装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以后俄国革命有重大影响。

“十二月党人”起义有其突出特点，革命者采取了发动军队武装起义的斗争方式。参加12月14日起义的是近卫军莫斯科团、海军团、榴弹兵团和芬兰团的3000名士兵。12月29日在乌克兰起义的是契尔尼戈夫团1164名士兵。在总计4000多名起义军人中，约有40名沙皇军官。在起义失败后被审讯的579人中，456人是军官。另外，“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青年。第一个秘密协会的6名创始人中，年龄最大的只有27岁，最小的20岁。起义失败后被处绞刑的5名革命家，其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23岁。青年更富于理想和热情，这也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重要条件。但列宁认为：“十二月党人”是极少数没有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这也说明敌我力量悬殊，他们的起义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 马克思和恩格斯

(1)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年)

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律师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民主运动的影响和家庭、学校的良好教育，思想活跃、勤奋好学。他为父亲的“纯洁品德和法学才能出众”而骄傲；他赞美母亲把一生“整个地贡献给了爱与忠诚”。1835 年他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时的马克思尚未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但已表明他已具有超出常人的人生价值观、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怀。

1835 年 10 月，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他的学习兴趣广泛，历史和哲学是他更专注的学科，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使他从辩证思维的海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使他摆脱宗教的影响，接受无神论。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他并没有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止步不前。1841 年春，他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他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批判态度，主张哲学和实践斗争相结合，表现了改变德国社会生活的彻底革命精神。1841 年，马克思于柏林大学毕业，并获得了耶鲁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该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莫泽斯·赫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既有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也有最敏锐的机智。请你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当时的马克思年仅 23 岁。

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立即投入了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现实斗争。从 1842 年 4 月起，他为《莱茵报》撰稿，同年 10 月，任该报主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政策。他抨击普鲁士制度不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的自由时说：“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在《莱茵报》被查封后，1843 年 10 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同德、法工人的秘密团体建立了联系，并经常参加工人群众的集会。1844 年 2 月，他在与黑格尔左派分子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 1 卷，第 343 页。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几封重要信件，表明他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848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伟大友谊与合作。他们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并写出一系列著作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组织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从50年代起，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59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1—1863年写了23本政治经济学笔记；1865年完成长达200多万言的《资本论》全部草稿。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的革命首创精神，总结了公社的经验。他是各国革命运动的良师益友。在1850至1870年的20年里，他和恩格斯几乎每天通信，讨论各种政治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从1851年开始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报刊撰稿，评述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其中包括对中国社会特点的分析，揭露和谴责俄、英对中国的侵略，歌颂和赞扬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马克思一生写了许多伟大的著作，最为全世界熟悉的当属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他的名著《资本论》。他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是他一生中两项伟大发现。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是德国人，但在他65年的人生中有 $\frac{2}{3}$ 的时光侨居他国，其中有34年住在英国。德意志各邦反动政府把他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以各种借口拒绝承认他的德国国籍。他在法国和比利时期间也一再遭到当局的驱逐和骚扰。对此，马克思泰然处之，他豪迈地说：“我是世界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直到1883年他去世，也没有取得固定的国籍。他的母亲始终不理解马克思的胸怀和抱负。她希望儿子能获得法学学位和高官厚禄。但是马克思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而且从不追求官职。当他写成《资本论》后，他母亲感叹地说：“你如果不是写了一本论资本的书，而是弄到一笔资本，那就聪明得多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并且本身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者。他在写作《资本论》时，家里竟穷得没有煤烧，没有饭吃，自嘲“饿得象只鹰”，典当了上衣去买稿纸，写好稿子竟无钱买邮票邮寄。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生活压力以及繁重的理论创作和实际工作重担，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5岁。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时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他说马克思是“科学巨匠”，并且“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引起全世界反响，从3月16日起，在纽约，美国国旗下半旗致哀。3月19日晚，纽约工人和进步人士举行万人追悼会，与会者用英、德、俄、意、法、西班牙和斯堪的那维亚语等多种语言发表讲话，称颂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盛况空前。在欧美许多国家，不但各社会主义和民主报刊纷纷刊登悼念马克思的文章，欧洲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报刊，甚至已往曾受过马克思批判的报刊，也都发表了马克思逝世的讣告和评论。

马克思逝世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他的英名和事业是不朽的，他的著作在世界五大洲广泛传播，他的思想历经沧桑，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许多学者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甚至会有许多偏误，但这也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自己事业的继承人，所以，恩格斯中学未毕业就被送到巴门和不来梅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年轻的恩格斯十分厌恶工商界那种尔虞我诈的庸俗习气。他无心经商，而是致力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研究。1841年，他在柏林服兵役期间，闲暇时便去柏林大学听课，研究黑格尔哲学，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他被派往曼彻斯特他父亲入股的棉纺厂办事处工作。此间他周游英国各地，深入工厂和工人住区，调查和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参加工人集会，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and 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无愧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国际无产阶级导师的光荣称号。他一生写了许多光辉的著作，其中有一些是与马克思合作的伟大创造，也有许多是他独立完成的篇章。他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反杜林论》则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他致力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工作，唯有他能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恩格斯积极献身革命实践活动。1846年，他同马克思共同组织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年8月，在巴黎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及蒲鲁东主义展开论战。1847年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会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办《新莱茵报》，还亲自参加了对敌作战。他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活动，并创办了第二国际，指导了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说，恩格斯是“文武双全的英雄”，“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列宁在评价恩格斯伟大的一生时指出，恩格斯是在他的朋友马克思之后，“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近40年，结下了伟大的革命友谊，在全世界传为佳话。恩格斯对马克思及其全家的无私帮助和奉献精神更为世人赞叹。为了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他不得不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20年。起初他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上几镑钱；后来就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若干年后他成了公司的股东，大笔款子源源不断寄往伦敦。而当1869年6月30日他最后一次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并写信告诉母亲：这是他自由的第一天。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良心经常象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马克思还说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

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能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马克思还对恩格斯说过“我在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你的友谊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恩格斯对自己为马克思所做的一切终生不悔。

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巨人。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有人说，人类一切知识的领域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他不仅对哲学、历史、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对军事学、语言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也都有深入的探讨。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喉头癌病逝于伦敦，享年75岁。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罐在他生前喜爱的休息地伊斯特勃恩海滨（英国的南岸）被投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列宁写了悼念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章开头引用了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句：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是对恩格斯光辉一生的恰当评价。

2.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1）西欧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14—15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一般都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3个发展阶段。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18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也先后踏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

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的确，产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它孕育了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孪生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拼命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经历了自发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自发斗争表现为捣毁机器、工厂和殴打厂主等原始形式；经济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目的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政治斗争的形式主要是进行罢工、游行示威、议会斗争和武装起义等，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36—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被称为西欧著名的3大工人运动。3大工人运动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标志着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开始显示出无产阶

同上书，第13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2）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它使人们失望和不满。于是，许多人就幻想能够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美好社会。19世纪初英、法两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尔·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二是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这些理论贡献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来源。

圣西门是一位博学而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它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平民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认为。“这在1802年是相当天才的发现”。

提出了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观点。初步觉察到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主张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不受压迫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新社会。

圣西门把社会分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两部分。劳动者既包括雇佣工人，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他认为银行家、厂主、商人这些“积极的”资产者是未来社会的领导力量，可以对消极的无财产者发号施令。他的“游手好闲者”指旧时的封建特权分子，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

傅立叶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讽刺家。他出身于法国一商人家庭，当过店员、商店经理和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内幕有深刻的了解，揭露得生动、辛辣。他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本末倒置的世界：医生希望病人多；律师希望打官司的人多；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灾，烧毁半座城市；玻璃匠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人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第一个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他探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能辩证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把他为止的社会历史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他主张的未来社会被称为“法伦斯泰尔”，在那里人们共同劳动，男女平等，实行普及免费教育。他还提出了消灭脑体劳动对立和城乡对立的理想。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也不实行暴力革命，他寄希望于富人帮助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他贴出告示，声明每天中午在家等候富人前来捐款资助，甚至给拿破仑写信求援。结果，思想家望眼欲穿，无有富人登门。

欧文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出身于英国一手工业者家庭，10岁学徒，当过店员，后来成为工厂经理。他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的了解要比傅立叶和圣西门更深刻。他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进行了勇敢的实践，并百折不回。

从1800年起，欧文在他管理的苏格兰新拉纳克棉纺厂实行提高工人福利

的改革：缩短工作时间；经济危机时工厂停工，工人照拿工资；举办公共食堂、夜校和幼儿园，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恩格斯评论说欧文创造了一个“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但欧文自己也认为他的改革没有改变工人的奴隶地位。后来，他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

1823年他提出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他花3万英镑购买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坚持四年后失败，欧文也从此一贫如洗。

在美国的实验失败后，他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运动中活动30年。1834年主持建立英国全国工会联合会，并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832年还试办过一个“劳动市场”。欧文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一生的斗争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活动，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则是根本的原因。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享有着重要地位。1870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

（3）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黑格尔关于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国家应该体现理性的原则等观念是错误的，而国家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经济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这促使他起来批判自己一度信仰过的黑格尔哲学。使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3年11月迁居巴黎以后，他对工人运动的了解和理论研究工作，使他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他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人类从私有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主张对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力量，公然申明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完成的标志。

同一时期，恩格斯也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理论观点。他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他第一次说明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是实现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他还指出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的思想。这标志着恩格斯已经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后就开始了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事业。到1847年底他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神圣家族》（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合写）；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这些著作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要原理，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吸取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

果，他们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3.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1）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积极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846年2月，他们创建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这个组织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及工人团体建立经常性联系，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社会主义运动中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潮，逐步统一认识，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作准备。委员会选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日果（1820—1860年）组成常务委员会。

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面。正义者同盟是由到国外谋生的德国手工业者于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工人团体，其指导思想是魏特林的平均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口号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人人皆兄弟”；宗旨是企图用密谋手段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办法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于1839年参加“四季社”领导的起义失败后，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伦敦。这样，英、法、波、瑞士等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同盟的活动，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改造正义者同盟的第一步是对魏特林主义的批判。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予很大希望，耐心帮助他。但他以伟大人物自居，拒绝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1846年3月30日，在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批判了魏特林的宗派思想，并分析了密谋活动的危害，指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道路应该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马克思还要求魏特林抛弃在德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但是，魏特林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并且在5月11日的会议上公然为对工人运动危害极大的“真正社会主义”辩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声明与他决裂。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正义者同盟的多数领导人都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长期统治同盟的魏特林主义。

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正义者同盟的又一重要步骤。“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德国卡尔·格律恩为代表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爱”奉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一流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克利盖，1845年他把这一思潮带到美洲，以正义者同盟的名义在美国进行蛊惑性宣传，企图通过向上层人物乞求资助在美洲建立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1846年5月，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克利盖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批判克利盖用“爱”的胡言乱语冒充共产主义，这一荒诞宣传会使工人阶级的意志颓废，并指出他所代表的只是那些想逃脱破产命运、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的小资产者的心理状况。《通告》的发表给克利盖以沉重打击，从此他就从同盟的舞台上消失了。巴黎也是正义者同盟的主要据点之一，格律恩在那里有很深的影响。

1846年8月，恩格斯来到巴黎，向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格律恩及其追随者，斗争非常激烈。有一次辩论会持续了3个夜晚。恩格斯在辩论中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辩论的结果，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3项原则。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促使同盟盟员及其主要领导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并认识到彻底改组同盟的必要性。1847年春，莫尔（1813—1849年）根据同盟的决定，携带正式委托书，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改组同盟。鉴于同盟已有了根本转变，他们改变了过去拒绝参加的态度，欣然应邀，准备把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政党。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能出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成分的根本改变。这一新名称在于表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大会决定采取特别措施，如向各地派遣特使进行组织整顿，“让危害整个组织生存的个别盟员离盟”，“吸收其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一直在盟外的人士加入同盟”。

大会审议了恩格斯和沙佩尔为大会拟定的章程草案。章程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章程规定吸收盟员“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章程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为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委员会和代表都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些规定体现了民主制原则。

大会还过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选举了中央机构的成员，主席是沙佩尔，秘书是沃尔弗。大会还决定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以取代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2）《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秘密举行。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是沙佩尔，秘书是恩格斯。

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第一条关于同盟的目的修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1页。

同上书，第430页。

同上书，第420页。

会。”关于盟员的条件修改为：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支部。盟员不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

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再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辩论，最后一致赞成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纲领，以作为党的宣言公布。会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拟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用德文发表，共印1000册，寄往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和其他国家，由那里的盟员散发。

《宣言》以透彻鲜明的笔调阐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全面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有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

《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氏族解体以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宣言》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党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从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四、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运动

1. 1830—1848 年间欧洲政局和国际关系

19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末期，欧洲政局动荡不安，各国普遍要求改革现状，爆发了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1830 年波兰起义、1830 年比利时革命、1832—1833 年土耳其和埃及的战争。1833 年 7 月 8 日，温加尔·伊斯科列西俄土条约签订；同年，俄、普、奥三国君主会议召开。1840 年英、奥、普、俄四国签订伦敦协定。在 30 年代，法国七月革命的声势最大，它影响了当时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到 40 年代末期爆发了席卷全欧的革命运动。

（1）法国七月革命及其影响

1815 年拿破仑“百日王朝”覆灭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1824 年路易十八逝世后，查理十世继位。他在位期间推行反动政策，颁布了反宗教治罪法，严格限制出版自由，恢复长子继承权。他还颁布法令，给过去逃亡的地主 10 亿法郎的补偿，变相归还了法国革命时期没收的贵族土地。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

1830 年 7 月 26 日，查理十世颁布敕令：解散新议会；限制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实行新选举法。这样，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才有选举权，劳动人民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都被剥夺了。七月敕令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

7 月 27 日，巴黎爆发革命。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同政府军作战，几个军团的政府军倒向起义者，查理十世逃往英国，波旁王朝被推翻。七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被拥上王位，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次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又一次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成果。这次革命也沉重打击了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推动了欧洲革命运动。

由于欧洲政局的变化和出自本国利益的考虑，欧洲各国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沙皇尼古拉一世不愿容忍奥尔良公爵登上法国王位，开头他宣称不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法国的合法国王，并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法国发生的事情。法国代办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沙皇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 1830 年的法国已不是 1815 年的法国了，也不可能出现 1815 年的反法同盟。在英、奥、普三国同法国新政权建立关系 4 个月之后，尼古拉一世也只好承认路易·菲力浦为法国之君。英国的舆论欢迎法国七月革命。英国政府在法国革命爆发一个月之后就首先无条件承认了“七月王朝”。英国的这一态度出于西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二是出于对法国形势的考虑。英企图通过迅速承认法国新政府，增强它对法国的影响，使法国抛弃同俄国接近的政策，而靠拢英国，有利于英国阻止俄国向巴尔干和近东的进一步扩张。就法国形势而言，如果英国迟迟不承认“七月王朝”，就会削弱路易·菲力浦的国内地位，加强共和派和波拿巴派的力量，而英国的政策是要极力阻止法国革命向纵深发展。从 1830 年 9 月开始，英法关系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迹象。欧洲三个封建君主国家——俄、奥、普恢复了合作关系，他们既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法国，也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英国。但到 30 年代末期，由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冲突，包括在殖民扩张中的矛盾，英法的密切关系基本结束了。

从 1830 年革命后到 1848 年革命前这段时间，法国的对外政策是不成功

的。1840年它同欧洲四强英、俄、普、奥联盟争夺中东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只是最后征服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在顽强抵抗20年之后，还是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2）欧洲列强与比利时革命

比利时人民强烈不满维也纳会议关于比利时同荷兰的合并，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1830年8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起义，并迅速发展至全国，10月4日，起义者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比利时独立。

法国政府对比利时革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拒绝比利时革命者提出的法国出兵的要求。10月2日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写信给英、俄、奥、普政府，通报有关比利时的事态，要求各国出兵镇压比利时革命，但各国反映比较冷淡。因为比利时独立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他们也不怕得罪荷兰。就法国而言，其新君主甚至已开始构思与比利时的合并。英国和俄国都察觉到法国的意图。英国极力反对法国与比利时合并的打算，俄国则怂恿英国站到俄、奥、普一边反对法国和比利时。最后英法就比利时问题进行了谈判，10月15日，双方在伦敦签署了备忘录：法国政府承诺既不合并比利时，也不谋求比利时的王位。双方同意把比利时问题交五国会议讨论。

1830年12月20日，英、法、俄、奥、普五大国家承认比利时独立。比利时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关于比利时的王位问题，英法争执激烈。1831年2月3日，比利时国民议会以多数票通过路易·菲力浦的次子涅莫尔斯基公爵担任比利时国王。英国内阁对此坚决反对，并以战争相威胁，路易·菲力浦只好让他儿子放弃比利时的王位。6月4日，德意志人、英国王室的亲戚利奥波尔德就任比利时国王。

1831年11月15日，欧洲五强国在伦敦签署议定书，承认比利时王国的完全独立，并宣布比利时为“永久中立国”，确定了比利时和荷兰的国界，从而比利时革命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荷兰国王不愿意接受欧洲几个强国的这一安排，但又无可奈何，一直拖到1839年荷兰才正式宣布同意这样的解决方案。俄国虽然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但直到1852年尼古拉一世才派一名公使前往布鲁塞尔。

（3）英国的殖民扩张及其外交政策

英国从3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印度的统治，英国在1843年夺取了信德，1846年占领了克什米尔；为了垄断到印度的通路，1839年占领了亚丁港，并扩大了在马六甲半岛的领地，同年又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1840年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同年，侵占新西兰；1842年侵占婆罗州北部（沙撈越公国）；1843年侵占南非的纳塔尔。英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加剧了它同其他列强的紧张关系。英、法为争夺埃及和新西兰几乎开战；英、美为划定加拿大与缅因州之间的边界，为争夺奥里根等地的领土，为争夺中美洲的霸权，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在英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过程中，其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是一个重要角色，他的外交手腕堪称一绝。对此马克思有过精彩的描述：“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的政治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

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礼貌，……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这也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到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它的外交政策对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

（4）梅特涅体系的动摇和奥地利的衰落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是维也纳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外交中心点是着眼于同盟国的合作，反对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维护自己庞大的帝国体系和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30年的欧洲革命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占了上风，帝国内部的动乱更给梅特涅体系以沉重打击，他采取了同俄、普一致行动的政策，力图使中欧和东欧免受革命的影响。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本土，以及匈牙利、捷克、克罗地亚、西加利西亚、克拉科夫和伦巴迪亚各地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奥地利的统治摇摇欲坠。梅特涅只好以捷克军队防守奥地利本土，以南斯拉夫军队防守匈牙利，以匈牙利军队防守意大利，以意大利军队防守奥属波兰，以奥地利军队防守波西米亚。这反映奥地利的统治已近顾此失彼的境地，其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也在逐渐下降。梅特涅极力维系俄、普、奥三大封建君主专制的团结，但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30年代以后与1815年的三君主联盟时期已完全不同了，欧洲经济已向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国的民族觉醒也已不可逆转。

2. 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的进程

1848年欧洲革命以意大利巴勒摩人民的一月武装起义为发端，迅速扩展到欧洲广大地区。这次革命包括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六月起义、德国三月革命、十月维也纳起义和护宪运动，以及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次革命一直延续到1849年秋。在这次革命中，各个国家面临着不同的革命任务：有的是进一步扫除封建残余势力，实行民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如法国；有的是推翻封建统治，消除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如德国；有的是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意大利等国。这次革命来势凶猛，范围广泛，是一场影响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次革命的中心在法国，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而震惊整个欧洲。巴黎六月起义是这次革命的最高潮，其失败又是这次革命的转折点。

（1）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

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3日发展为武装起义，24日推翻了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奥尔良王朝，建立了临时政府，政权落入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以后，资产阶级政府立即着手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财政政策；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维持外部和平，不再公开反对维也纳条约，也不敢在行动上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5月15日，工人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政府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工人领袖布朗基等人。6月21日，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厂”，命令15—25岁的青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他工人到瘟疫流行的沼泽

地去做苦工。22日，4万多工人在巴黎市区举行示威游行。23日晨，起义者筑起街垒，提出实现“社会共和国”的口号。24日上午，巴黎外围的郊区都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在市区，起义者分四路进攻资产阶级市政厅。政府调集大量军队进行镇压。26日黄昏，政府军攻克了起义者最后的根据地圣安东区，并进行了大屠杀，6月起义最终失败。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

（2）德国三月革命

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三月革命。革命前夕的德国，资本主义虽有较大发展，但还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国家，包括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其中普鲁士和奥地利为最大的两个邦国。当时德国国内交织着复杂而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各邦之间的矛盾。3月13日，奥地利首府维也纳的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和武装起义，限令国王罢免首相梅特涅。当晚梅特涅男扮女装逃往英国。奥皇斐迪南一世被迫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3月18日，柏林起义工人包围了王宫，迫使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宣布实行立宪，召开议会，改组政府，但政权落到了以康普豪森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新内阁手中。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了帝国宪法，决定在德国建立统一的立宪君主帝国。但是，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都抵制和反对这部宪法。于是，从5月初起，在德国西南部又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到7月，起义失败。

（3）意大利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同期，在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塞尔维亚等国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1848年3月，匈牙利人民在民族英雄科苏特领导下举行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由于奥俄军队的联合进攻，于1849年8月失败。在意大利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志尼和人民英雄加里波第领导人民群众反抗奥国的统治，1848年8月建立威尼斯共和国，1849年2月建立罗马共和国。在法、奥、西等国的联合进攻下，7月罗马陷落，8月威尼斯陷落。至此，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结束。

欧洲的反动势力在1849—1850年破坏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使之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意大利北部还是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波兰仍然被参与瓜分的国家所统治。沙皇由于镇压了革命运动，拯救了奥地利帝国，俨然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英国在这一时期更加巩固了它在工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垄断地位。它巧妙地利用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和欧洲反动势力镇压1848年革命的机会，大大地加强了在亚洲的殖民扩张。但英国和欧洲均势政策受到来自俄国的威胁，俄、英矛盾进一步加剧。

3.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风暴时期的斗争

（1）组织准备和斗争策略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授权马克思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以领导革命。3月11日该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被选为主席，沙佩尔为总书记。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共产

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行动纲领。《要求》指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德国的封建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要求》提出完成民主革命的主要措施有：消灭封建压迫，没收各邦君主的封建领地、财产和一切矿山、交通运输工具、银行等为国家所有；实行普选权，保证国会中有工人代表，建立人民武装，使军队同时成为劳动大军；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免费国民教育等等。实行这些过渡性措施，有利于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之后，创造政治经济条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还为同盟制定了革命斗争策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成为彻底的革命派，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行为，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推翻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当时德国经济政治发展还比较落后，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较低，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要以民主派的身份参加革命，采取联合民主派的策略，同时保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2）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活动

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革命者先后秘密分散返回德国，选择工业发达、无产阶级比较集中、又有革命传统的莱茵省省会科伦作为革命活动中心。为了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指导分散在各地的盟员活动，于5月31日开始出版《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该报高举民主派的旗帜，无情地揭露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抨击资产阶级的背叛，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号召农民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声援巴黎工人起义，支持波兰、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揭露沙皇俄国充当的欧洲宪兵角色。《新莱茵报》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性质。该报共出版301期，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破坏，于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新莱茵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和恩格斯的文章《匈牙利》，还有编辑的告别词。告别词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在德国革命过程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同盟盟员、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否认德国所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主张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反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力量联合，反对工人参加议会选举，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同盟盟员、柏林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斯蒂凡·波尔恩则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主张单纯搞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指望依靠法兰克福议会，反对武装群众，主张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波尔恩一直对革命采取旁观态度，后来脱离工人运动，逃往瑞士。1848年10月马克思当选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联合其他民主派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1849年5月，在巴普、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并参加了起义。恩格斯在普法尔茨参加了由盟员维利希指挥的工人志愿部队，任副官，参加了4次起义。同盟领导人莫尔在战斗中牺牲。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被普鲁士政府驱逐，相继来到伦敦。

4.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高潮过去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及时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经验，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策略。

（1）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持什么态度，《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立场是：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并通过对德国国情和德国革命的具体分析，把资产阶级革命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他们认为，1640 年英国革命和 1789 年法国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敢于发动和领导手工业工人、农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新制度，顺应了当时欧洲各国和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德国的三月革命，“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级本身很软弱，同封建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脱离农民，又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所以它不仅丧失了对革命的领导能力，而且在革命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者、农民和小资产者是德国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是人民的绝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虽然还比较弱小，肩负不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但它却是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为了把革命引向胜利，就要把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基本的纲领；必须高举民主派左翼的旗帜，同时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争取团结人民的大多数，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民主派错误的自由。

（2）关于工农联盟的原理

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不论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农民的向背都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德国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农民和其他中间阶层“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法国农民对二月革命后的政局漠不关心，加之受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不但不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甚至对无产阶级持敌视的态度。路易·波拿巴所以能皇袍加身，原因之一也是人数众多的小农对他抱有幻想，把波拿巴王朝看成是“农民的王朝”。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1 页。

同上书，第 32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17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82 页。

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一切农民的国度里，都必须十分重视农民的作用，把注意力放在农民的民主力量上。

工农联盟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革命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维护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块土地所有者日益衰老和破产，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罢了。正是这一点，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有共同性，可以联合起来。但是这种联合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为，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又有保守的一面。同时，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彼此之间很少联系，作为个体经营者的农民也不容许有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此，在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农民不可能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纲领，也“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农民、小资产者幻想的破灭，他们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必定“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3）关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得解放，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对旧国家机器的根本态度。马克思第一次直接作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论。1789 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拿破仑·波拿巴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随后一系列的事变一次又一次地扩大和强化国家机器，这个历史表明：“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劳资对立的加剧，已经变成纯粹是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反动国家，不管它采用什么政治形式，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巴黎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这个教训促使无产阶级摈弃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改善自己处境的空想，并提出了大胆的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既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就不能简单地夺取它和利用它，而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将它彻底粉碎。这个结论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来的。1871 年，他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07 页。

同上书，第 697 页。

同上书，第 692 页。

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关于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他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作出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论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其他途径的可能性。当时英国的军事官僚机构尚未完备，初步实行议会民主制，工人阶级又占人口的大多数，马克思曾设想：“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4）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论断和“不断革命”的思想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打击和动摇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势力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先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次革命的历史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他们早已提出的“革命是历史的动力”的思想，并形象地把革命比喻为“历史的火车头”、“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过程。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只不过是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者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还把不断革命的思想扩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同上书，第332—33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同上书，第530页。

同上书，第18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

同上书，第385页。

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五、19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1. 工业垄断时代的英国

(1) 殖民扩张和工业垄断地位的形成

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疯狂地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1854年英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巩固和扩大了在土耳其的势力；1856年发动侵略伊朗的战争；1859年镇压印度民族起义；1856年英法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并于同期入侵日本；1865年镇压牙买加岛的奴隶起义；1868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同时，英国的政治势力还渗透到拉丁美洲。1850—1870年间，英国殖民地人口从1亿3千万增加到2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1835—1872年，英国仅向中国输入鸦片就榨取利润达1亿4千多万英镑；60年代从印度征税6500万英镑。

这一时期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飞速发展，交通运输业更有长足的进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商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原料供应地，被称为“世界工厂”，确立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2) 工人运动和工联主义的出现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手中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和严重失业。自由党的财政大臣格拉斯顿于1863年在下院发言时直言不讳地说：“财富和威力这种惊人增加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当时大工业家、大地主、大商人只占英国全国人口的2%，而他们占有的国民收入却达36%以上。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缺少安全措施，事故不断发生。据统计，1851—1870年间发生矿井爆炸事件1437起，有5000名工人不幸遇难。在50年代初期工人运动比较消沉，从1853年开始，工人运动活跃起来，一些地方陆续举行罢工，经受了3次打击的英国宪章运动开始复苏。宪章主义者、老工人巴莱斯顿逝世时，20万人为他送葬，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宪章主义者领袖琼斯再次积极走上斗争舞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他创办了《寄语人民》和《人民周报》等报刊，以宣传和组织群众。1854年4月6日，在琼斯主持下于曼彻斯特召开了“工人议会”，并组织了罢工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1855年，政府发布“新星期日法案”，企图剥夺工人在星期日处理个人生活和私事的权利，遭到强烈反对。宪章主义者把传单和标语贴满整个伦敦，并且一连在四个星期天于海德公园举行集会，抗议这一法案，参加者达20万人，马克思也出席了集会，最后迫使政府撤销了该法案。

50年代以来，英国工会运动发展很快，许多部门都成立了工会。工会组织和领导了工人群众反抗资本家的斗争，这对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对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英国工会领导人却逐步走上了工联主义道路。“工联”，是英国各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简称。同业工会联合会有机器工业联合会、木工工会联合会、漆工工会联合会等。这是由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经济互助团体，参加的条件很苛刻，必须是领高薪者才能参加。工联主义就是19世纪50—60年代英国工人联合会领袖们所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总称。它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工联主义者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的让步来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鼓

吹劳资合作，把改善目前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条件视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要求，即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改善工人被奴役的条件，而不是消灭工人被奴役的地位，不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联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主要是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内部进行的，主要是围绕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选举改革问题和爱尔兰问题进行的。马克思肯定了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强调不应夸大这种日常斗争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工联领袖们反对争取普选权的政治斗争和只进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发动了全国各地的群众。1866年7月，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数万群众集会游行拥护选举改革。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都有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斗争，批判了工联主义者反对爱尔兰独立的殖民主义立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英国工人阶级日益觉醒，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

（3）第二次选举改革

英国1832年的选举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急剧增加。1846年谷物条例废除以后，他们在政府中的势力更为增长。从50年代起，原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发展为自由党，代表地方资产阶级要求的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势力的扩大和影响的增强，自由党在1851—1874年间曾掌握内阁达19年之久。这期间英国实行了所谓自由主义政策，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允许外国革命流亡者在英国政治避难。从60年代初起，英国各地工人纷纷组织起来，参加选举改革运动。1865年5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成立了“全国改革同盟”，负责领导全国的选举改革运动。1866年7月，在第一国际领导下，伦敦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集会，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也都相继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全国掀起了选举改革的高潮。

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议会于1867年8月通过了新的议会改革法，这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议会改革。按新法案规定，重新调整了选区，取消了46个“衰败市镇”选举议员的资格，把它们所占的议席分给新兴的城市。法案降低了选举资格限制，扩大了选民范围，规定城市中每年交付10镑以上的房租而且居住一年以上的房客和缴纳济贫税的房主都有选举权，乡村中凡每年交12镑以上地租的租佃者以及每年收入5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也获得了选举资格。这次改革，使选民由135万人增加到225万人，但一般工人和城市贫民仍无选举权，当时全国拥有人口2千多万。

（4）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在英国长达200年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经济方面也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爱尔兰的土地被英国大地主霸占，爱尔兰农民多半是英国大地主的佃农。爱尔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846年“谷物条例”废除后，欧洲谷物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英国和爱尔兰，谷物价格下跌，英国地主把耕地变为牧场，赶走佃农，使大批爱尔兰农民无法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许多人到美国和加拿大寻求生路。1841年至1871年的30年间，爱尔兰人口从820万锐减到540万。

英国的殖民统治激起了爱尔兰人民的英勇反抗。1858年，一批流亡在美国的爱尔兰爱国者组成了“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又称芬尼党或芬尼亚社，这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其领袖是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詹姆斯·斯蒂芬斯。该团体成立不久就开展了反英活动，并准备以武装起义推翻英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芬尼党人坚决反对大土地所有制，认为“土地是公共财产，应属于全人类”，“地主没有、也毫无占有土地的权利”。土地问题在芬尼党的纲领中占主要部分，他们的革命活动始终把争取独立和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但其纲领只限于对成员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和秘密起义，一直没有注意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也没有同英国的工人运动相联系，一直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他们的革命性，并多次指出过他们的弱点。

自1856年起，芬尼党人曾经几次在爱尔兰举行起义，并且于1866年和1870年两次从美国攻入加拿大，试图从那里打击英国的统治，都以失败而告终。1867年，芬尼党人在爱尔兰一些城市发动起义，仍因以密谋方式不能发动广大群众一起斗争而遭到失败。11月23日，3个芬尼党成员在曼彻斯特被处死，爱尔兰人把这一天称为国丧日，至今爱尔兰人还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同情和支持爱尔兰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爱尔兰应该脱离英国而独立，以各种方式揭露爱尔兰问题的真相，号召各国工人支持爱尔兰人民，并特别注意教育英国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统治的重要工具，“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那末，他们在英国也就会并且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一致的立场，爱尔兰革命者同马克思恩格斯及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在爱尔兰成立了国际支部。

2. 危机中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1）拿破仑三世及其军事独裁统治

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登上皇位，称拿破仑三世，法国进入了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

路易·波拿巴（1808—1873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拿破仑帝国灭亡时他才6岁，随母亲流亡国外。其母经常给他灌输一种思想：凡属波拿巴家族者，必能成大业于世界。他在英国寄居多年，当过英吉利的特务警官，身居异乡，常常梦想当法国皇帝。1840年8月6日，曾策划一次政变，偕朋党数人在布伦港登岸，结果失败并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了《论贫穷》的小册子，标榜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者。

1848年革命后，他指使其代理人大肆宣扬波拿巴主义，以扩大他的影响，结果在一次议员补选中有3个选区投了他的票。1848年9月2日，他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53页。

返巴黎，以民主主义者的面貌活跃在巴黎舞台上，宣扬他坚信统治权属于人民。1848年12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由于广大农民投了他的票，当上了第二共和国总统，但他不满意总统的职位，企图称帝。

为了达到称帝之目的，路易·波拿巴安插亲信，打击政敌，以“不明职责”为由撤换了许多官员。经精心部署后，他提出修改宪法，以使称帝合法化。他事先给立法议会写了一封“独具匠心”的信，说：“法兰西首先需要安宁，至于我，我是民众选出来的，我的执政完全应该感谢他们，我将永远服从他们的合法意志。如果这次议会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为此召开的制宪会议将调整行政权的状况。不然的话，民众将在1852年隆重宣布自己的决定。但是不管将来的决定如何，我们都会达成协议，使热情、意外事件或暴行不再成为我们伟大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我所关心的首先不是谁将在1852年统治法国，而是利用我所有的时间，使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潮和骚动。我向你们披肝沥胆；你们应信任我的坦率，协助我的高尚愿望实现，其余一切自有上帝保佑。”这封信是收买人心和警告政敌的战书。

各种准备就绪后，路易·波拿巴决定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12月2日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纪念日，也是拿破仑一世加冕日。12月1日，他召密友数人进宫部署政变计划，当夜逮捕60名最有威望的议员。2日晨巴黎市区贴满总统布告：解散议会和国务院，恢复普选；定于14—21日选举；巴黎和邻近各郡实行戒严，史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政变。

政变后波拿巴在巴黎逮捕26000人，所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共和党领袖和他的一切政敌均被驱逐出境。14—21日的选举，740万票赞成政变，只有60万票反对。一年后的12月2日，波拿巴称帝，即拿破仑三世。从此开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实行“鞭子加蜜糖饼干”的策略。他的内政部长解释说，“一手拿钱，一手拿剑，我们就能把国家引导向前。”

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法国经济有所发展，到50年代末，其工业水平仅次于英国，60年代社会经济各部门呈现了繁荣景象。但是劳动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的对外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70年9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波拿巴被俘。1871年1月普法缔结和约后波拿巴被释放，与其妻旅居英国，1873年1月9日死去。他在位期间对国家作为不大，但在搞阴谋诡计方面是颇为能干的。

法兰西第二帝国是金融贵族集团和工业巨头的政权。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帝国宪法赋予拿破仑极大的权力，他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草拟法案的国务会议和批准法案的元老院人选都由皇帝指定，立法团主席由皇帝直接任命，立法团被剥夺了创议法案的权力，只能对法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另外，还规定立法团不得批评帝国的政策和发表任何辩论的言论。这样，立法团和元老院已形同虚设。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系统和一支拥有40万人的军队，对社会生活实行严密监督，报刊杂志的出版必须得到政府的允许，报社要向政府缴纳高额保证金。在工厂里，工人的举动要受到警察和监工的监视，有不满行为的人被编成名单，甚至遭到逮捕。政府还颁布了对付工人的治安法令。在这一时期，工人联合会和合作社被解散，共和派被摧毁，民主报刊被取缔，地方自治也被废除。1868年3月和5月，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参加罢工为借口，对巴黎支部委员审讯两次，并判处长期监禁。1870年

4月，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建立，拿破仑政府又以这些支部成员参加1870年春克勒佐的许奈特工人罢工为借口，对巴黎支部的委员进行第三次审讯，并多次镇压国内工人的罢工运动。

（2）殖民扩张和第二帝国的危机

拿破仑三世在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同时，对外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法国强占了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参加撒丁王国的反奥战争，侵吞了萨伏依和尼斯；向中国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还侵占西贡，对柬埔寨实施“保护权”，并远征墨西哥等。

1854—1856年，法国为同英、俄争夺西亚的势力范围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历时一年半之后打败俄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由1856年的巴黎和约肯定下来，提高了拿破仑三世的威信，使他取代了已故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和影响，成为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欧洲大陆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战争的胜利也使法国夺得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但是，法国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折兵20万，耗资150多万法郎。

从19世纪起，在马达加斯加岛，法、英两国就开始激烈的角逐和争夺，到1862年，法国终于获得在该岛的自由贸易权和其他特权。

远征墨西哥是拿破仑三世最大的军事冒险。1862年，法国以墨西哥拖欠法国银行家的债务为借口出兵墨西哥，支持反动的地主教士叛乱，企图颠覆墨西哥共和政府。墨西哥人民在民族英雄本尼特·胡亚雷斯的领导下奋勇抗战，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加深了第二帝国的危机。

1860年以后，法国进入了所谓“自由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稍稍扩大了一些立法团的权力，立法团有权选举自己的主席团。他还采取见风使舵的伎俩，企图拉拢和收买工人阶级，对出版集会的监督也放宽了。但这些对于处于危机中的帝国是无济于事的，各种反拿破仑三世的力量都在不断增长。1866年国内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国内政局更加不稳。就是大资产阶级，也对帝国的政策失去了信心，梯也尔指责帝国政府：“种种错误，无一不犯。”1860年英法商约签订后，英国商品充斥法国市场，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蒙受损失，因而对帝国政府极为不满。

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形成了反政府的一股势力。共和派政论家昂利·罗希福创办《路灯》杂志和《马赛曲报》，抨击政府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组成新雅各宾派，重新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主张建立世俗学校和实行各种民主改革，还出版了《觉醒报》，揭露和批判第二帝国的暴政。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时期非常活跃。1865年立法团选举时，他们获350万张选票，只比帝国支持者少100万张。各大城市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力量更强。新当选的反对派以甘必大（1838—1882年）为首，要求建立共和制，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常备军，废除警官区。但是他们不主张用革命手段同拿破仑政府作斗争。

工人运动的发展更使帝国政府惶惑不安。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大好形势。60年代初，在巴黎、图卢兹、马赛等大城市都成立了一些互助会。1864年，在工人群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拿破仑三世被迫废除《霞不列法》。这一时期法国工人的斗争已不限于经济斗争，他们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坚决反对君主制度。1864年立法团补选时，巴黎工人发表了《六十人宣言》，要求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加入立法团，认为，任何资产阶级反对派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在这次补选中，雕刻工人昂利·路

易·托伦被提名为工人的候选人。1864年，法国工人代表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建立活动。次年，在巴黎和法国的其他城市建立了第一国际的支部，仅巴黎支部就拥有500名会员。“国际”巴黎支部委员利用被帝国审讯的机会宣传革命主张。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在法庭上发表演说，揭露政府的反动政策，要求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更加恶化。1867年巴黎铜矿工人举行罢工，同年亚眠、马赛、鲁贝的工人也举行罢工。1869—1870年，罗亚尔矿区和克勒佐各工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斗争中无产阶级逐渐组织起来，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1869年，巴黎40个工人团体建立了“工会联合会”，联合会与第一国际支部建立了联系，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力量。

1870年1月12日，共和派新闻记者维克多·努亚尔被拿破仑皇族的皮埃尔·波拿巴亲王所杀害，激起强烈的民愤，巴黎有20万人为他送葬，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拿破仑三世为了测试人们对他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态度，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有189万人弃权，157万人投了反对票。这一切表明第二帝国已不能按照它的方式统治下去了。为了挽救帝国垂危的命运，拿破仑三世企图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870年7月19日，他挑起了普法战争。

3. 德国的统一

（1）实现统一的两条道路和50—60年代的工人运动

直到19世纪，德国还是一个封建诸侯割据的分裂国家。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成立了所谓德意志邦联，由大大小小的38个独立的诸侯邦和自由市组成，其中包括1个帝国（奥地利）、5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和符登堡）、几十个公国、侯国及4个帝国自由市。因为英国国王领有汉诺威邦，丹麦国王领有荷尔施坦和劳恩堡邦，尼德兰国王领有卢森堡邦，他们都成了邦联的一路诸侯。各邦都有自己的利益，并且都有独立的主权，各邦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邦联没有统一的政府和军队，也没有统一的法院和关税。由各邦代表组成的统一的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通过的决议对各部邦没有约束力，各邦对它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德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统一，但是，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到了60年代，德意志的工业和农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但是，各邦国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德意志境内繁多的关税和多种工商业条例的限制，一个商人从柏林去瑞士，必须经过10个国家，要换10次钱，办10次过境手续。因此，消除国家分裂，实现德意志统一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德国的统一，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一条道路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另一条道路是王朝战争的道路，即由普鲁士或奥地利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保留贵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统治地位，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无产阶级当时也没有力量来领导革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落到普鲁士容克地主手中。

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进展，50—6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1849年有产业工人70万，到60年代初增加到150万。德国工人的处境非常困难，日平均工作14小时，有的工厂竟长达18小时。1865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美国低77%，比英国低39%。工人在政治上更是毫无权利。1848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解散，许多工人组织遭到破坏，大批革命者流亡国外。60年代初，工人运动逐渐高涨，在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大城市相继爆发罢工运动，先进工人开始酝酿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1863年5月，德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它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迈出了新的一步。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拉萨尔出身于德国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本人是律师。他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参加过1848年革命，并一度被捕入狱。60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高涨之时，他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写了《工人纲领》、《公开的答复》等著作。《公开的答复》成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拉萨尔鼓吹一套机会主义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个规律，就必须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要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必须依靠“国家帮助”；要取得国家帮助，就必须争取普选权；要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其核心是依靠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解决工人的问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前后，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有6次密谈和频繁的书信来往，乞求俾斯麦赐予普选权，并表示效忠普王和政府，表示支持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来统一德国。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主张和叛卖活动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危害，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64年8月，拉萨尔为争夺别人的未婚妻，在决斗中死去。但是他的继承者施韦泽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等继续推行拉萨尔路线。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长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李卜克内西（1826—1890年），出身于德国一知识分子家庭，16岁中学毕业后当过教员，参加过1848年革命；1850—1862年流亡伦敦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努力钻研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63年在柏林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成立后，他参加了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组织工作，1865年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

倍倍尔（1840—1913年），从小家境贫寒，13岁当学徒，14岁作旋工。1861年，他加入莱比锡手工业教育协会，两年后该协会并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1864年他被选为联合会常务委员。1865年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相识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年后加入第一国际。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最早控制在资产阶级分子手中。李卜克内西加入该组织以后与倍倍尔共同团结联合会中的革命分子，使这个组织逐渐摆脱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控制，在1868年9月召开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终于接受了第一国际的纲领。与此同时，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拉萨尔派分子之间的宗派斗争使整个组织四分五裂。以威廉·白拉克（1842—1880年）为首的反对派于1869年6月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打算

同倍倍尔及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一个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7月发表了160多人签名的宣言。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城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62名，来自国内198个地区。会议听取了倍倍尔关于纲领和组织问题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亦称爱森纳赫纲领）和章程，选举了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还选举了监察委员会，宣布《民主周刊》为党的机关报（从1869年10月1日起，改名为《人民国家报》）。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建立使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

俾斯麦（1815—1898年），是19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西方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在19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上，他所起的作用仅次于拿破仑。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德意志革命”的主要发起人，这场革命意在改变欧洲力量的均衡。俾斯麦是个资本主义化的容克地主，是有名的保皇派和1848年革命的死敌。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意义在于他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因此，恩格斯称他是“非出本心的革命者”。

俾斯麦毕生维护容克特权和君主政体。在他的墓碑上写着：

安息于此

俾斯麦公爵

1815年4月1日生

1898年7月30日死

皇帝威廉一世的忠实的德意志臣下。

1848年革命时，俾斯麦组织地主武装准备援救普鲁士国王；他坚持用武力镇压革命，曾任普鲁士出席邦联会议的全权代表和驻俄、驻法大使。1862年9月22日，47岁的俾斯麦担任了普鲁士首相，10月8日又兼任外交大臣。有一次议会否决了政府的军事改革方案，但他不顾议会的反对，仍拨付大量经费来改组军队，并在议会上声称：“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也不是多数票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而是普鲁士的武装。”这就是所谓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因此俾斯麦也有了“铁血宰相”之称。

俾斯麦是个具有非凡才智和胆识的人物，他12岁上中学，自幼不信教，16岁就不再祈祷，17岁上哥廷根大学，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爱好哲学和文学，懂得多种语言，青年时期游历过许多国家，大开眼界。32岁时，即1847年作为议员出席了柏林的联合议会，涉足政坛。他通过3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并当上了德意志帝国宰相。任宰相20年，大权在握，颁布反社会党人法，镇压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运动。普法战争后企图设法改变德国没有殖民地的局面，迫使英国让出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喀麦隆给德国。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皇孙威廉二世继位，君臣不睦，1890年俾斯麦被免职。免职后他回到庄园写“回忆录”。1898年7月30日去世，终年83岁。

（3）三次王朝战争和德国的统一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条件日渐成熟。这个时期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已走在德意志各邦的前列，并出现了小德意志地区与普鲁士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为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普鲁士比较有利，竞争对手奥地利在意大利战争中被削弱；俄国的欧洲霸主地位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被动摇；英国害怕法国称雄欧洲而采取支持普鲁士的策略。在1862—1864年间，尽管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在国内的专横曾激起民愤，但是资产阶级软弱，不敢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因此容克地主阶级牢牢地掌握了政权，通过3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

1864年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1863年末，丹麦新王颁布新宪法，把在丹麦和易北河之间的什列施维希和霍尔斯坦两公国的政治制度与丹麦统一起来，吞并了两公国。这引起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俾斯麦以此为借口，1864年2月向丹麦宣战。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把奥地利也拉入战争。战争以丹麦的失败而告终。10月，签订和约，普鲁士吞并了什列施维希，奥地利获得霍尔施坦。

1866年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看到奥地利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主要障碍，必须在战场上把奥国彻底摧毁。为了对付奥地利，俾斯麦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860年4月，普鲁士与意大利缔结盟约，并得到法、俄两国不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承诺。1866年6月，普鲁士出兵霍尔施坦，挑起了普奥战争。意大利为收复威尼斯也对奥宣战，奥军节节败退。经过拿破仑三世调停，8月23日，普、奥签订了布拉格和约。和约规定：旧德意志邦联解散；奥国承认普鲁士成立北德意志联邦（由美因河以北各邦组成）；把什列施维希、霍尔施坦、汉诺威和法兰克福等地划归普鲁士；威尼斯归还意大利。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包括18个邦和3个自由市，普鲁士国王为联邦元首。

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拿破仑三世惧怕在自己的东方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国，企图阻挠德国的统一，同时为了摆脱国内困境，转移人民的视线，1870年7月19日，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俾斯麦也早对法国矿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垂涎三尺，并企图通过对法战争统一南德。因此，俾斯麦顺水推舟，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篡改电文，激怒法国。

普法战争以法国失败而告终。1870年底，南德四邦（巴伐利亚、符登堡、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得）加入了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皇帝，普鲁士宰相任帝国宰相。1871年2月，普、法在凡尔赛签订预备和约，法国割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1871年4月，新选出的议会批准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德国由22个自主的君主国、3个自由市和1个直辖区组成，德国统一最后完成。

德意志的统一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结束了德国在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局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的国家统一，有更多的弊端，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已往对德国统一的研究，偏向于考虑军事和外交在统一中的作用，近年来出现了注重德国统一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的趋向。

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成为19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国史学家奥托·普弗兰兹认为：“俾斯麦的民族主义、独裁和军国主义也都是纳粹运动产生的

社会背景。”

4. 意大利的统一

(1) 1848 年革命失败后的意大利

1848 年，意大利也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没有成功，没有完成统一国家和实现民族独立的任务。革命失败后的意大利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仍然受到奥地利与法国的压迫和控制。奥地利统治着北部最富庶的伦巴底和威尼斯，并间接控制着中部的帕尔马、莫德纳、托斯坎纳、教皇国的罗曼纳等公国和地区。法国占领军驻扎罗马。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着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只有撒丁王国的政权掌握在自由派贵族手中，保留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其他各邦都恢复了封建专制制度，大批革命志士受到了迫害，意大利的解放运动经历了一个低潮时期。

尽管 1848 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它还是严重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19 世纪 50—60 年代，意大利经济有了发展。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冶金、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陆续问世，纺织业也有了显著发展，伦巴底的丝织业名闻遐尔。在北部地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也不断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裂、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派贵族的势力日益增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他们渴望拓宽和统一国内市场。饱受异族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期待赶走外国侵略者获得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样，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2) 民族统一运动的新高涨

围绕着意大利统一道路的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以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社会基础是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他们主张同封建势力妥协，依靠萨伏依王朝，自上而下地实现国家统一，建立一个意大利王国。另一派是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这一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驱逐外国侵略势力，推翻各邦封建王朝，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志尼曾创建青年意大利党，并在 30—40 年代几次发动起义，但都遭到了失败。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实际上是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路线发展的，加富尔伯爵成了统一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新的统一运动是从反对奥地利民族压迫的斗争开始的。1857 年欧洲发生工商业危机，引起意大利的连锁反映，企业相继倒闭，失业严重，工人和农民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伦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奥运动，托斯坎纳、摩德纳和其他地区也都发生了骚动。

为了在反奥斗争中取得法国的帮助，1858 年 7 月，加富尔同拿破仑三世会晤，并以割让萨伏依和尼斯为代价同法国缔结反奥军事同盟。为了利用人

转引自《西方史学界对俾斯麦的评论》（刘红光摘译），《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6 期，第 3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64 页。

民的力量，1859年初加富尔又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加里波第请到都灵，以利用加里波第的威望和才能来对奥作战。加里波第接受了加富尔的邀请，并在撒丁王国政府领导下参加对奥作战。

1859年4月，意、法对奥战争爆发，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军连战连捷。加里波第率领的志愿军——阿尔卑斯山猎兵也重创奥军。奥军被迫退出伦巴底，退守威尼斯。

对奥战争的胜利激起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中部各邦爆发了反奥起义，赶走了奥地利统治者，推翻了当地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浪潮震惊了拿破仑三世，他害怕统一起来的意大利会成为法国的劲敌，于是背弃诺言，单独与奥国讲和。1859年7月11日，法、奥在维拉弗兰卡签订停战协定，奥国同意放弃伦巴底，由法国转交撒丁王国，威尼斯仍由奥国占领。托斯坎纳、巴马、摩德纳和罗曼纳完全恢复封建特权。同年11月，撒丁王国政府同奥国签订和约，承认维拉弗兰卡协定。

维拉弗兰卡协定保留了奥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并维护了意大利的分裂局面，激起了意大利人民的强烈不满。意大利中部人民坚决反对封建王朝复辟，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中部各邦都建立了临时政府。他们组织起国民自卫军，准备奔赴战场。这时加富尔积极活动，游说中部各邦与撒丁王国合并，得到了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响应。1859年秋，托斯坎纳、巴马、摩德纳和罗曼纳等国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加入撒丁王国。1860年3月，上述各邦正式并入撒丁王国，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统一告成。

意大利的全面统一战争开始于西西里。两西西里王国受制于西班牙波旁家族，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国实际上由法国控制。西西里人民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1860年4月4日，西西里首府巴勒摩首先举行起义，其他城市的贫民和农民积极响应，与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激烈搏斗。5月初在撒丁王国的加里波第率红衫军前往援助，7月初解放西西里全岛。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组织了政府。加里波第接受了专政者的称号。

9月，加里波第又率军攻入那不勒斯，西班牙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被推翻；10月初，又在沃耳土尔诺河附近一役，彻底击溃西西里王国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南意大利的解放。

（3）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是有可能沿着民主革命道路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以加富尔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加紧活动，力图把统一运动纳入撒丁王朝的改良主义道路。加富尔极力阻挠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进军，并积极策划通过“全民投票”方式确定两西西里归属的阴谋活动。加里波第没有识破和抵制加富尔的阴谋，一切都按照加富尔的计划进行。投票结果，自由派大获胜利。1860年11月，南部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加里波第被迫交出政权。至此，除威尼西亚和教皇领地外，意大利7个邦都归服了撒丁王国。

1861年3月，第一届意大利国会在都灵召开，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为意大利国王，加富尔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交和海军大臣。首都设在佛罗伦萨。意大利王国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政权。

1866年7月，意大利参加普奥战争，收回威尼斯。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9月，意大利政府军和加里波第的军队乘虚占领教皇领地，从此罗马教皇国亦并入意大利王国（但王国政府还是把近半平方公里的梵蒂冈留

给了教皇)，遂迁都罗马，意大利统一最终完成。

意大利的统一结束了国家分裂和衰败的局面，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意大利的确立和发展供了前提。

（4）加里波第（1807—1882年）

加里波第在争取意大利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1807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尼斯镇一个贫寒的水手家庭里。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使他从小就对祖国的危难感到忧虑和愤慨。1833年他加入青年意大利党，开始了革命生涯。1834年1月，在撒丁王国的海军舰队中发动过起义，失败后流亡拉丁美洲，参加过巴西和乌拉圭的民族解放战争。他战功赫赫，但坚决谢绝当地独立政府给他的将军薪俸，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1848年6月，他回到意大利，参加1848年革命，在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身先士卒。

加里波第不仅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和伟大领袖，而且是人类进步事业和革命斗争的亲密朋友。在普法战争中，他坚决支持法国，不顾自己年迈和身残，率8000人的部队大败普军2万。他积极支持巴黎公社，并缺席当选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支持第一国际，关心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以及波兰民族解放运动。

加里波第在地中海卡普列拉岛度过晚年，1882年6月2日与世长辞。意大利人民怀念他，许多外国代表团纷纷前去参加他的葬礼。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编辑了《加里波第回忆录》，并增写了“1859年的出征”等章节。

六、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和波兰民族独立运动

1. 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1) 农奴制度的危机

俄国在 15 世纪以前不为世人所注意，犹如马克思所说：“惊慌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直到 18 世纪，俄国还是一个弱国，日耳曼人、蒙古人、波兰人、瑞典人都侵扰过它。直到 18 世纪前期，俄国的农奴制度仍有发展余地，资本主义关系极为微弱。世界性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迫使俄国农奴制经济转向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交换而生产，为增殖货币财富而生产，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自然经济的狭隘眼界，动摇了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从 19 世纪中叶起，俄国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的地主开始采用雇佣劳动制，购置农业机械，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流向城市。30 年代，俄国开始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产业革命。但是由于农奴制的严重阻碍，工厂得不到充分的原料和自由劳动力。厂主为了雇佣仍属于农奴主的农奴，必须付给农奴主一些利润，这又影响了工业资本的积累，束缚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总之，到 19 世纪中叶，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一方面，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农奴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农奴制的危机；另一方面，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的农奴制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废除农奴制已提上俄国社会发展的日程。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严重冲突的社会环境中，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沙皇政府在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更暴露了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并加剧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为了满足军事开支，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徭役和税收；商业和工业的紊乱打击了城市居民，临近战场的南方诸省更饱尝战乱之苦。于是农民揭竿起义反抗农奴制，1858—1860 年间发生的农民起义竟达 280 多次。1859—1860 年工人起义也有 28 次。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预感到农奴制的废除已无可阻挡。

(2) 民主主义思想家

俄国先进的思想界一直在探求俄国社会解放的道路。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有“十二月党人”的鼓动宣传和发动起义的尝试。到 40 年代，又涌现了一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废除农奴制，主要代表人物有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

赫尔岑（1812—1870 年），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从小就接受了违背贵族家庭传统的熏陶。两位家庭教师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是法国雅各宾党人，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另一位是倾向进步的反农奴制的医科大学的学生。他们给少年赫尔岑灌输了许多自由民主思想。十二月党人起义也给他的思想以巨大震撼。1829 年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他关心政治，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讨论和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大学毕业后，沙皇政府以“一个大胆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危险而诡秘的狂热之徒”为罪名，将他流放维亚特卡省。后他又流亡西欧，先到巴黎，以后到伦敦。在国外，他先后出版《北极星》和《钟声》等杂志，宣传言论自由、免除赋税和解放

农奴。他曾期望在 1861 年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革命按他宣扬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他把农民和农民村社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企图从农奴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对许多俄国青年产生过重要影响。赫尔岑的晚年在巴黎度过,他很关心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他于 1870 年 1 月 21 日病逝。列宁称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一个时代。在他墓地的青铜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他只活了 58 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 30 卷文集,留下了许多至今还象火一样燃烧的文章。”

别林斯基(1811—1848 年),出身于海军医官家庭,与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同学,因揭露和抨击农奴制度而受到严格监视,1832 年 7 月被开除学籍。他早年曾希望以启蒙教育的办法达到废除农奴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后来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走向革命民主主义。他毕生以文艺批评活动反对沙皇制度,1847 年发表的《给果戈理的信》,集中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早期受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40 年代初,在反对俄国和西欧反动思想的斗争中,逐渐成为唯物主义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出生于一个神甫家庭。在大学读书期间接触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他一直从事文艺评论和政论活动,成为当时俄国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从 1856 年起,他担任《现代人》杂志主编,在他主持下,该杂志积极从事反农奴制的革命宣传,揭露农奴主的阴谋,主张农奴应无条件地获得土地和自由。1862 年他遭沙皇政府逮捕,后被剥夺公民权,并被流放西伯利亚,1889 年才回到故乡。他的主要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怎么办?》,试图解答怎样反对农奴制度的问题。他批判贝克莱、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力图以唯物主义精神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深刻,提出俄国避开资本主义直接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年),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他自幼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13 岁就已博览群书 400 余种。1853 年他考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大学读书期间,他对现实生活进行积极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并确立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他研究了法国启蒙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追随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学生时期他就积极投入人民解放运动,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哲学政治学习小组,出版了手写的秘密刊物《消息》。他写讽刺诗,抨击封建农奴制度。1857 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到《现代人》杂志社工作,主持该杂志《批评栏》,直到 1861 年他病逝前的 5 年中,几乎每册都有他的论文或书评,篇篇都能引起文化界人士的注意。他称农奴制的俄国是“黑暗王国”,象一个监狱,象一口棺材,散布着腐朽的空气。他的书评贯穿农民革命的思想,认为劳动人民同寄生者之间的斗争就是社会史的全部内容,只有革命才能根本改变社会关系。他以极大的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以及同书报检查官作斗争所过多耗费的心血,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英年早逝。1861 年 11 月 29 日,年仅 25 岁的杜勃罗留波夫病故。

(3)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广大人民对农奴制度的反抗情绪更加强烈，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震撼了沙皇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已看到王朝覆灭的危险，他承认农奴制迟早要废除，并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所以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很不成熟，也无力领导革命推翻农奴制度。

1857年1月3日，沙皇召开了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以后又在欧俄各州成立了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州委员会，拟定改革方案。1861年2月19日（俄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法令。这个法令包括《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为主的17个文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给予农奴以人身自由。法令规定，农民获得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人身自由权利，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有权从事一切工商活动和订立契约、诉讼。但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劳役，并没有立即完全取消。

农民获得份地和份地的赎取条件。法令规定，农民获得人身解放时，分得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对份地，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所有权在法律上仍属于地主；在存在村社的地区，农民不得单独与地主签订赎取份地合同，在赎取份地之前农民使用份地，要负担“临时义务”。宅旁园地交60卢布赎金，可随时取得；份地须经地主同意，交一定高额赎金方可取得，农民先交赎金的20—25%，其余由国家垫付，农民可在49年内向政府偿还本息。份地数量，因地制宜，规定了最高和最低的定额，农民份地额超过最高标准时，地主可以“割地”。这条规定使地主有了掠夺农民份地的借口。据统计，地主割去了改革前农民份地的18%。

关于改革后的农村统治形式。旧有的农民村社被保留，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由当地地主任调停官，并监督村社的秩序和安全。为了便于统治改革后的农民，在原有的农民村社中实行连保制，农民未经允许不得随便到外地谋生。在名义上，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管理村社，但实权操在政府官吏和地主调停官手中。

俄国的这次改革是逐步推进的。首先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在1863年和1866年又根据2月19日法令的原则解放了皇庄农奴和国有农奴；1864年进行了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1874年实行军事改革，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此外，还推行了关于国民教育、书刊检查、财政预算和城市自治的一些新措施。总之，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改变。

1864年和1870年俄国先后颁布了地方自治机构法规及市政自治法规，各省、县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城市建立了在财产资格基础上选举产生的杜马（意即代表大会）和自治局。在地方自治机构中，代表选举资格以拥有土地多少为基础，因此贵族仍占优势，资产阶级和农民也有代表参加；在城市自治机构中，富裕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选举权，大多数城市居民无权参加选举。所以，它实质是资产阶级地方代议机关。地方和城市自治机构的职权只是管理经济、卫生保健和部分国民教育等问题。

1864年司法改革的内容是：建立代表各阶层的法院，建立公开的诉讼程序，法院受理刑事案件须有陪审人参加，建立律师制度等。在实行资产阶级原则方面，司法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相比是比较彻底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也可能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由于革命力量不够成熟，在俄国历

史上没能出现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演进，而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最为典型。

1861年的改革，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作用的，它是近代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改革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开辟了整个俄国“欧化”的新时期。农奴制的废除，使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自由雇佣劳动力有了来源，以赎金方式从农民身上掠夺的近20亿卢布，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资金。可见这次改革是俄国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重要一步。据统计，19世纪60—90年代，俄国工业产量增加7倍。1861年以后，俄国只用数十年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转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接近工业发达国家。

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后俄国开始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使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前进了一步。

这次改革，在“解放农奴”的口号下，对农民又一次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并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在经济上，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触动，在政治上，沙皇专制制度仍然统治俄国。广大农民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和压迫，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存在严重障碍。因此，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仍然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直到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才完成。

（4）沙皇俄国的对外侵略扩张

在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继续实行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9世纪其侵略扩张方向之一是向南吞并土耳其，夺取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把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沙皇格勒”。在1828—1829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沙俄占领了克里米亚、多瑙河口和高加索的大片土地。但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失败，被迫退出比萨拉比亚。

与此同时，沙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54—1857年，沙俄以防卫英、法为借口，悍然违反《尼布楚条约》，4次闯入中国黑龙江一带，屯兵筑垒。在枪炮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同意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又侵吞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4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部的三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1881年沙俄还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割占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19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末，沙俄总共强占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

19世纪中叶，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细亚的征服。19世纪前半期，中亚细亚有三个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还有半独立的白克领地和许多独立的部落。1864年俄军入侵中亚，翌年占领了塔什干，1867年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被迫并入俄国版图，成立了土尔克斯坦总督领地，以塔什干为首府。1873年沙俄又入侵希瓦汗国，签订了希瓦为俄藩属的条约。

沙俄在中亚细亚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把中亚细亚变成了俄国的商品市

场和生产原料供应地。当地手工业受到俄国工业的排挤而日趋衰落，人民生活也相当困苦。

2. 波兰民族独立运动

(1) 沙皇俄国对波兰的统治

波兰是一个东欧大国，曾与立陶宛合并组成波兰立陶宛联合共和国。到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俄普奥三国瓜分而亡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又重新瓜分波兰，俄国掠得原波兰领土9/10，建立了波兰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普鲁士分得波兰西北角，建立了波兹南大公国；奥地利得到了加里西亚。波兰再次陷入亡国境地。

波兰王国以农业为主，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1859年波兰王国有330万农民，其中有130万人没有土地。劳役地租在农村占统治地位，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大批的农民破产。

沙皇俄国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不允许进行任何改革，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俄籍官吏充斥王国国家机关。沙皇还控制着波兰教育事业，80%的波兰人都是文盲。

亚历山大二世顽固推行对波兰的民族压迫政策。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鉴于国内农奴制度的危机，俄国不得不对波兰有所让步，亚历山大二世取消了对波兰的军事管制，允许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回国。1857年，他又允许成立波兰小贵族的政党——农业协会，并在全国建立分会，有会员25000多人。他们要求波兰复国，恢复到1792年的国界（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但他们反对武装起义，寄希望于欧洲列强对俄国施加压力而迫使俄国让步来达到目的。后来波兰小贵族也发生了分化。

面对沙俄的殖民统治，波兰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城市市民、农民，甚至资产阶级都投入了斗争。许多城市的人民运动采取宗教爱国形式。华沙的手工业行会不仅提出民族爱国口号，而且要求进行民主和社会改革。沙皇当局多次镇压革命群众运动。1861年2月21日，农业协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农业问题。各革命小组为给农业协会施加压力，2月27日举行示威游行。沙皇当局下令向群众开枪，死亡5人，伤数十人。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沙皇企图同波兰小贵族妥协，以维持其在波兰的统治地位。1861年3月27日，宣布恢复波兰王国国务会议，组成教育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妥协派维列波夫斯基被任命为首脑，以莫扎伊斯基为首的农业协会反对这一决定，沙皇政府决定镇压。4月4日解散了华沙代表团；4月6日农业协会也被封闭；4月8日开枪镇压示威游行的群众，死亡200人，许多人受伤。

(2) 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

在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由于阶级基础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以原农业协会成员为主形成了白党，代表波兰小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人是弗拉基斯拉夫。这一派反对武装起义的方针。另一派是红党，也称运动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无产者、贫民、小知识分子、小私有者都站在它一边。他们主张消灭封建制度，争取民族独立。红党内部又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右翼以阿加顿·吉列尔为代表，倾向于同白党合作；左翼则是以东布罗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东布罗夫斯基是著名

的波兰革命家，1865年逃亡巴黎，后成为巴黎公社的杰出将领，巴黎武装起义时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1861年10月，华沙各革命小组组成城市委员会，后改称中央民族委员会，它是红党的领导机关。1862年东布罗夫斯基来到华沙，成为中央民族委员会领导人，并被任命为华沙武装司令。他拟定了起义计划，确定1862年6月举行起义，后起义时间改为1863年1月。

1862年夏，中央民族委员会提出一个纲领，宣布波兰为独立的共和国，恢复1792年国界，土地归耕者所有，国家付赎金，废除等级特权，公民不分语言、民族和宗教信仰一律平等。沙皇当局进行了残酷镇压，逮捕并枪决了革命组织的3个成员，8月20日又逮捕了东布罗夫斯基，判处15年苦役。为了控制局势，沙皇频繁更换波兰总督，并吸收一些波兰人担任政府官员。为了打击红党和破坏起义，1862年10月当局泡制了招募新兵草案，按照特编的名册，征招城市青年入伍。

为了把青年和起义骨干保留在革命队伍中，红党领导人帕德列夫斯基决定在征兵开始时便举行起义，日期定在1863年1月22—23日。

1月22日，中央民族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同时颁布两项土地法令。两个法令分别规定把农民耕种的土地过渡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参加起义而无地的农民。

起义按照东布罗夫斯基的计划进行，首先夺取摩德林要塞，但沙皇军队防守严密，遂决定攻取普洛次克，但1月22日当夜未能克胜。当时波良斯克省、卢布林省、克拉克夫省和圣多米尔省都成为起义活跃的地区。中央民族委员会领导的几支起义队伍都未能获胜，1863年5月，中央民族委员会改称国民政府，一度实权掌握在白党或靠近白党的人手中。9月17日至10月17日，红党曾一度夺取国民政府领导权，组成了以赫米林斯基和弗兰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但他们畏惧警察逮捕，不久就离开了华沙。10月中旬起义领导人之一罗穆阿尔德·特劳古特解散了国民政府，自任起义“总裁”，试图鼓动和吸收人民参加斗争，以挽回局面。他打算组织一支5万人的队伍，要求实行1月22日土地法，但为时已晚，很难再组织起强有力的队伍。1864年4月11日特劳古特被捕，8月5日就义。4—5月份，尚有一些零星的战斗，最后完全被镇压下去。在绞杀波兰革命中，普鲁士充当了帮凶。

在起义进行过程中，沙皇政府为了抵消起义者对农民的影响，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敕令。

1863—1864年这场席卷波兰全国的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波兰封建农奴制的消亡，是波兰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迈进的转折点。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宪兵沙皇俄国，削弱了沙皇的专制统治，鼓舞了邻近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非常关注和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亲自起草了声援波兰人民的宣言，对波兰人民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正是在支援波兰人民的共同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加强了联系，并于1864年建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波兰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和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阶级。波兰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站在人民斗争之外；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也不能胜任领导革命的重担。波兰的革命民主派人数少，缺乏斗争经验，不能牢牢把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一度由白

党分子攫取了革命领导权，并且对起义有破坏作用。俄国未能与波兰同时爆发起义，致使沙皇能够调集优势兵力镇压波兰起义，这是 1863 年波兰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

七、第一国际

1. 第一国际的创立

(1) 欧美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欧洲大陆。进入19世纪5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扩张，以及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各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60年代初，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

60年代初的欧美工人运动已开始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各国工人阶级日益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各国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加强国际团结和联系的必要性，呼吁加强国际联合。1859年7月，英国伦敦建筑工人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举行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和支援，罢工斗争坚持一年之久，终于取得胜利。1860年5月，伦敦各工联举行代表会议；成立了“工联伦敦理事会”，从此英国工人运动更加活跃，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法国工人运动在经历了反动年代的重大挫折后开始复苏，1863年成立了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并在同年的第二帝国立法团选举时巴黎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1864年法国工人又迫使政府废除了禁止工人罢工、结社和集会的霞不列法。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日益增强，迫切要求从资产阶级的控制和影响下解脱出来，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1862年2月，莱比锡的先进工人毅然退出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单独成立了“前进工人政治协会”，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会议。1863年5月和6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相继成立。这样，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斗争阶段。同期，美国工人运动也有重大进展。1857年，在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1863年初，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在6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都逐渐活跃起来，过去工人运动比较落后的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也都陆续建立起了工人的阶级组织，开展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

50—60年代，欧美工人运动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对广大工人群众有较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还限于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传播。因此，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科学思想指导，加强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已成为欧美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

(2)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革命失败后直到6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积极致力于理论研究，并着力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为后来国际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培养和教育工人运动的骨干极为重视。他们争取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纳斯特·琼斯等人，以便影响和团结英国广大工人。1854年秋，英国宪章派和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组织了国际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注意教育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一批骨干，帮助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总结和研究革命的

经验教训，鼓励他们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时，充满激情他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我们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努力积累知识，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

直接促成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 1863 年波兰人民起义。1863 年 1 月波兰爆发了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1863 年 7 月 22 日，英国工人在伦敦举行声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法国工人代表昂利·路易·托伦等参加了大会。会后，英国工人联合会选出一个委员会筹建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委员会委托乔治·奥哲尔起草《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对于劳工事业是极为必要的，并建议召开一个有美、法、德、意和波兰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这个建议得到法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热烈响应。

1864 年 9 月 28 日，英、法、德、意、波等国工人代表 2000 人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盛大集会。马克思应邀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由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爱德华·斯宾塞·比利斯担任。会上奥哲尔和托伦分别宣读了呼吁书和答复信。随后法国侨民勒·吕贝代表法国工人提出建立国际工人活动中心的倡议，并建议在伦敦设立中央委员会，在欧洲各国首都和大城市设立分会。大会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国际性工人组织，并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委员会（1866 年日内瓦大会后改称总委员会）。奥哲尔和威廉·朗达尔·克里默（英国工联领袖之一）分别当选为主席和总书记，德国工人代表埃卡留斯当选为副主席。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在 10 月 11 日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正式确定组织的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第二国际建立后统称为第一国际。

（3）《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制定纲领和章程。在 10 月 5 日举行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一个由 9 人组成的小委员会，专门负责起草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小委员会成员思想倾向非常复杂，他们都从各自信奉的主义和宗派需要出发去理解这个新组织的性质，并想在纲领和章程中留下自己思想的烙印。英国工联主义者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目的在于限制资本剥削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国际工联组织；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则想使国际成为一个国际互助信贷组织；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则妄图使国际成为一个以马志尼为首的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为了统一思想，小委员会和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反复酝酿和讨论。最后决定由马克思修订有关文件。而在当时要制定一个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又为参加国际的各派所能接受的纲领和章程，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马克思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出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份文件在 1866 年日内瓦大会被批准，成为“国际的宪法”和行动指南。

《成立宣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宣言中列举大量事实，分析 1848 年至 1864 年间无产

阶级的状况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势，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没有消除劳动群众的贫穷，反而加深了劳动群众的困苦，“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道路，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并含蓄地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有科学共产主义的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成立宣言》还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主张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指出这“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成立宣言》最后重申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伟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协会临时章程》阐明了国际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原则。它包括序言和条例两部分。

“序言”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序言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和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条例”共 10 条，简要规定了国际基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规定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支部或联合委员会选派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并决定国际的重大方针政策，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监督各级组织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加入协会的工人团体保存自己的原有组织，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协会的各级组织活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为第一国际提出了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

2. 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

（1）支持和领导各国工人罢工斗争

60 年代后半期，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罢工斗争遍及整个欧美。第一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积极领导和声援各国的工人运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讨论工人运动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特别是马克思为 1866 年日内瓦大会起草的《临时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同上书，第 13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5 页。

同上。

同上。

同上。

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成为各国工人统一的行动纲领。它提出了争取 8 小时工作日的口号；强调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必须互相支持，指出工会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等等。

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国支部在斗争中互相支持。1866 年，伦敦编筐工人发动反对资本家解散工人协会和降低工人工资的罢工时，资本家从比利时招募工人进行破坏。总委员会及时派人到比利时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他们第二天就返回了比利时。1867 年 2 月，巴黎爆发了铜器工人罢工，总委员会立即发动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人捐款几千法郎予以援助，厂主被迫答应了组织工会的要求。1868 年春，日内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由 12 小时缩短为 10 小时，并增加工资 20%。雇主联合起来拒绝谈判。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组织所有的建筑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总委员会大力为罢工者募捐，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国际组织也大量往日内瓦汇寄捐款。雇主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美国内战后的多次工人罢工斗争也都得到了国际的有力支持。国际总委员会还组织各国支部成功地声援了 1865 年 3 月德国莱比锡排字工人罢工、1866 年 3 月英国伦敦缝纫工人罢工和 1867 年 2 月比利时沙勒罗瓦煤矿工人大罢工。

第一国际团结各国工人群众，在劳资斗争中互相支援，联合行动，一方面成功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本阶级的力量，使他们认识到：“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看到工人阶级是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不能无视工人阶级的要求。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政治运动

国际始终把揭露和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作为争取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积极支持波兰和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1866 年日内瓦大会把“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独立的波兰”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正式表明了第一国际坚决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原则立场。1867 年 1 月，总委员会与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一起举行纪念 1863 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群众大会，马克思和埃卡留斯在会上发言。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1867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之际，巴黎的工人和学生举行了反对沙皇、声援波兰人民的示威游行，高呼“波兰万岁”的口号。国际总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巴黎人民的这一正义行动。

19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芬尼亚党领导发动了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一震撼当时英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是英国工人阶级和第一国际所面临的必须正确对待的重大问题。国际总委员会举行群众集会声援爱尔兰人民的斗争，抗议英国政府的暴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揭露爱尔兰问题的真相，号召各国工人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并特别注意教育英国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这样就使英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62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41 页。

工人群众了解到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对英国工人运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

国际总委员会密切关注各国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它对英国选举改革运动给予正确的指导，在其倡议和参与下，1865年2月在伦敦成立了改革同盟。同盟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应有选举权的要求。国际还十分关心德国民族统一运动，支持法国人民反对波拿巴专制统治的斗争，支持美国北部民主力量反对南部奴隶制的斗争，支持国际比利时支部为争取人民的一般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国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贯彻了协会章程的精神，使第一国际不仅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成为支持各国争取彻底解放的政治运动的战斗司令部。

（3）反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在法国，50—60年代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主张建立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互助制”的“自由社会，竭力维护私有制；宣扬改良，主张通过建立“交换银行”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组织政党。

早在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蒲鲁东于1865年1月逝世后，托伦和弗里布尔等人顽固坚持蒲鲁东主义的信条，妄图将其改良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国际。因此，在国际内部展开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尖锐斗争。斗争主要是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的：关于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道路问题；关于消灭私有制问题。

消灭还是保留私有制是关系到工人运动最终目标的重大问题。1867年9月国际的洛桑大会第一次进行了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蒲鲁东主义者竭力反对实行公有制的原则，主张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瑞士代表库勒里说：“我是自由的拥护者，因而也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比利时代表德·巴普主张把土地交给集体所有。大会争论激烈，未能形成决议。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只有实行土地公有制才能使农民获得解放，使农业得到发展。1868年7月的布鲁塞尔大会继续就所有制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德·巴普提出对金属矿、煤矿、运河、铁路、电讯、森林和土地实行公有化的草案。蒲鲁东主义者认为这是对私有制空前未有的侵犯，是“粗暴的共产主义”；托伦再次鼓吹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最主要的前提”。最后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号召各国工人学习《资本论》的决议。1869年9月的巴塞尔大会再次讨论所有制的问题，结果只有4名蒲鲁东主义者坚持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大会最后就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了决议，指出：“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使土地归公共使用。”布鲁塞尔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决议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沉重打击，并促使蒲鲁东派内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

鲁东主义者，他们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布鲁塞尔大会之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中的影响逐渐下降以至最后消失。

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同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总委员会内部进行的，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英国选举改革问题和爱尔兰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英国工联领袖们反对争取普选权的政治斗争和主张只进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批判了他们反对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殖民主义立场。马克思肯定了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强调不应夸大这种日常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上明确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鉴于工联领袖奥哲尔的叛卖行为，1867年9月国际总委员会撤销奥哲尔的国际总委员会主席职务。

在第一国际后期（从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之后至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这段时间），国际内部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巴枯宁（1814—1876年），俄国人，曾先后侨居德国、瑞士和法国，是继蒲鲁东之后的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产生在瑞士、意大利等国并具有极大危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它反映的是流氓无产者（无业游民）的心理状态和要求。它不同于蒲鲁东主义和工联主义，是用“左”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因而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巴枯宁主义在政治上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各阶级平等，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任何政治运动，主张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在经济上主张“集产制”。巴枯宁认为，财产属于人们自愿组成的工业、农业组合，这种“组合”各自为政，不应受到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权力的限制。

巴枯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极大的瓦解和破坏作用。1868年巴枯宁混入第一国际，并秘密保留了自己的宗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了分裂国际的活动。于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展开了反对巴枯宁主义及其分裂活动的尖锐斗争。

在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上，巴枯宁建议把讨论废除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企图以此打开缺口，以其无政府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基本路线，从而控制国际，并提出把国际总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迁到日内瓦，以便完全控制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巴枯宁提出的废除继承权可以消灭私有制的谬论。会上通过了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并决定委员会仍设在伦敦，挫败了巴枯宁集团的篡权阴谋。

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歪曲巴黎公社革命，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说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勇敢的明显的否定”；配合国际资产阶级向国际进攻，进行分裂和破坏国际的活动。他们借口总委员会没有按期发表公报，诽谤总委员会失职，反对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总委员会对英国各支部的直接领导，还以发展国际组织为名，在意大利、瑞士等国大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势力。

1870年1月，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写了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3月间又写了《机密通知》，有力地驳斥了巴枯宁对总委员会的攻击并论述了总委员会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和策略，揭露了巴枯宁的两面派手法

和阴谋行径。1871年9月，总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通过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独立的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决议和组织问题的决议，痛击了巴枯宁集团的宗派分裂活动。会议还讨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问题，并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巴枯宁集团的阴谋活动。1872年9月国际在海牙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审查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活动，并通过决议将这个集团的首恶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分裂国际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为了清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至1875年间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等著作，透彻地阐述了革命权威的作用和实质，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也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忽视工人的日常斗争而脱离群众，加上70年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巴枯宁主义日渐衰落，最后彻底破产。巴枯宁于1876年死去，巴枯宁派也发生了分化。

3. 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1)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1871年3月爆发了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革命不是国际直接发动的，但它却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巴黎公社的行动与国际的宗旨及国际所要实现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公社的事业得到了国际的坚决支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高度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创举并给予了大力援助。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在斗争策略、军事技术和社会经济措施等方面给公社以中肯的指示。

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各国无产阶级不顾本国政府的阻挠和镇压，在舆论上声援巴黎公社。国际会员、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倍倍尔在议会上发表赞扬公社革命的演说。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工人和群众举行声援公社的集会。数百名外国工人运动领袖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战斗。

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工作，营救仍在法国的公社社员，协助他们解决逃到国外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国际总委员会组织各国际支部捐款救济大量涌入英国的巴黎流亡者。

马克思恩格斯还痛斥了国际资产阶级诬蔑公社革命是第一国际策动的谎言，同时又公开宣布公社的事业就是第一国际的事业，并及时总结了公社革命的经验，阐述了公社革命的伟大意义，捍卫了公社事业的正义性。国际总委员会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向英国各报提供公社活动的真实材料，为公社作辩护，并揭露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暴行，维护了第一国际的声誉和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

(2) 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进行疯狂的迫害，加上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国际已经很难进行正常活动，另外国际的组织形式也已不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1872年国际海牙大会后，国际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事实上它已无法发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

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1876年7月，总委员会在美国费城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国际解散。

第一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欧美17个国家建立了支部；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团结和教育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并支持和领导他们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前进。在组织上，第一国际为各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它在工人解放斗争史中是万古长青的”。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0页。

八、美国和加拿大

1. 19 世纪上半期的美国

(1) 领土扩张与对外侵略

1776 年美国独立后建立了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的联合政权。在领土扩张方面资本家和种植园主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刚刚独立的美国很快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野心勃勃地扬言，美国的领土是“预先注定”要扩展到整个北美的。19 世纪上半期，通过侵略扩张，美国的领土向南伸展到墨西哥湾，向西伸展到太平洋东岸，构成了今天美国本土的轮廓。

1803 年，美国以每英亩 4 美分的象征性地价，从法国手里购买了面积达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使美国领土扩大到墨西哥湾。

1810—1819 年，美国采取先派兵强占，然后出低价购买的手段，仅花 500 万美元就从西班牙手里夺得了佛里罗里达半岛。

19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通过武装颠覆手段，从墨西哥攫取了得克萨斯；又通过侵略墨西哥的战争抢走了墨西哥格兰德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它包括现今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科罗拉多等州。1846 年，美国从英国手中取得包括现今奥勒冈、华盛顿、爱达荷三州和怀俄明、蒙塔那两州的一部分，约 74 万多平方公里。

1853 年，美国又以 10 万美元强行“购买”现今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两州南部的狭长地带。

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的领土从原来的 230 万平方公里扩展到 770 万平方公里。美国内战后又于 1867 年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151 万平方公里），这样美国领土的总面积达到 920 多万平方公里，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约占北美大陆的一半。

美国向西部扩张领土的过程也是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和财产的过程。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屠杀，到 19 世纪末，印第安人由原来的 100 多万减少到 24 万，并且都被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贫瘠山区。

美国为了巩固自己在北美的地位，奉行“门罗主义”政策。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1758—1831 年）在致国会咨文中说：“任何欧洲列强都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和不友好的行动。”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表面上是反对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革命，实质上是打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幌子，企图把拉丁美洲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建立美国的霸权。

(2)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人运动

领土扩张和海外掠夺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已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到 1860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四位，棉纺织品占世界第二位。煤铁和其他重工业以及铁路交通运输业也都有很大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1850 年，美国的产业工人已达 957,000 人，到内战前夕增加到 130 多万人。美国工人也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特别是新从欧洲移居美国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所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很尖锐，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1833—1837 年，仅 4 年时间，就发生工人罢工 173 次之多。这一时期

工人的斗争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

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美洲传播。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流亡到美国的革命者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6月在纽约创立了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无产者同盟”，1858年10月又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这个组织还加入了第一国际。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促进了美国工人觉悟的提高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3）两种制度的冲突和废奴运动

美国独立后并没有废除奴隶制度。19世纪前半期，当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之际，南方各州则发展种植园经济，仍然实行黑人奴隶制。资本主义和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引起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主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使美国社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种植园主把黑奴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黑奴没有人身自由，受到非人的虐待。到19世纪，美国的种植园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奴隶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是不相容的。两种制度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原料和销售市场的争执。北部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迫切需要原料和销售市场，而南部种植园经济带有殖民地经济的性质。南方奴隶主把大部分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运往英国，从英国输入大批廉价工业品和奢侈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使北方完全失去了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第二，关税的争执。北部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关税，以抵制英国工业品的输入和竞争。南方奴隶主却主张自由贸易和降低关税，以便从外国进口工业品和日用品。第三，劳动力的争执。北部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南方却把黑奴束缚在土地上。北部资产阶级要求把扩张的西部各州变为自由州，发展资本主义，南方奴隶主却要使这些州成为蓄奴州，扩大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到19世纪中叶，南北方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集中表现在黑人奴隶制的废存问题上。

美国黑奴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多次举行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22年丹马·魏斯领导的起义和1831年纳特·唐纳领导的起义。但是，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从19世纪30代起，在美国掀起了群众性的废奴运动，工人、农民、黑人以及一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都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并涌现了一批“废奴主义者”。1831年在波士顿出版的《解放者报》，要求立即无条件废除奴隶制；1833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其中的领导成员多是白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到1840年该组织拥有成员20万人，地方组织达2千个。废奴主义者组织群众掩护黑奴从南方各州逃往北部或加拿大，到50年代逃离的黑奴达4万多人。

（4）约翰·布朗起义

南北方围绕奴隶制问题进行了长期斗争。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为争夺联邦政府控制权的斗争。自由州和蓄奴州数目的多少关系到南北双方谁在参议院占据优势的问题。1819年美国有22个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各占一半。1820年当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时，南北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国会通过了一个“密苏里妥协案”，即规定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但从马萨诸塞州把缅因地区分出来，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仍保持南北方州数相等。该法案还规定，以后凡在西部建立的新州，其

位置在北纬 36° 30' 以南者为蓄奴州，以北者为自由州。

“密苏里妥协案”并没有遏制南方奴隶主扩展奴隶制的活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变本加厉。在民主党操纵下，1854 年国会通过“逃亡奴隶引渡法案”，规定种植园奴隶主可以在北部自由州搜捕逃亡的奴隶。这与以前关于奴隶进入自由州即为自由人的规定相比是一个倒退。同年，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申请加入联邦，这两个地区都在北纬 36° 30' 以北，按“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应成为自由州，但是南部种植园主硬是把这两个地区变成了蓄奴州。他们操纵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否定“密苏里妥协案”，规定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建立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进一步加深了南北方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堪萨斯事件”。

黑人德里特·斯考特原是密苏里州的一个奴隶，他曾被主人带到自由州居住几年，他请求最高法院批准他为自由人。但在南部种植园主的操纵下，1857 年最高法院否决了斯考特的申诉。法院公然在判决书中宣布：过去的奴隶无论在美国何处居住，都是他的主人的财产。这个决定激起了美国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南部各州不断爆发反对奴隶制的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859 年 10 月约翰·布朗领导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把废奴运动推向高潮。10 月 16 日，起义在弗吉尼亚的哈帕斯渡口爆发，占领了联邦政府设在那里的一座军火库，解放了周围种植场的奴隶。但因力量对比众寡悬殊，起义者最后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约翰·布朗也受伤被俘，并英勇就义。

约翰·布朗（1800—1859 年），是美国废奴运动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他出生在康涅狄克州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就立志要消灭奴隶制，并主张用暴力革命解放黑奴。他为废奴运动贡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就义前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说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马克思对约翰·布朗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当代世界发生的最伟大事件之一。

2. 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南北战争

（1）内战的爆发和进程

堪萨斯事件揭开了美国南北战争的序幕，也是南北战争的预演，它引起了国内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1854 年共和党成立，这是北部各州主张废除奴隶制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团体，同当时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相抗衡。1860 年 11 月，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美国第 16 届总统。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主张限制和逐渐取消奴隶制。

林肯当选总统引起南方奴隶主的惊恐不安，遂制造分裂，挑起内战。1860 年 12 月 20 日，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退出联邦，密西西比、乔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等 6 个蓄奴州也相继退出联邦。1861 年 2 月，退出联邦的各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并制定新宪法，选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此后，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等蓄奴州也脱离联邦加入“同盟”。这样南部 11 个蓄奴州公开结盟，打起叛乱分裂的旗帜，并定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

林肯总统曾试图谋求与南方奴隶主的和解，他在去华盛顿就职途中一再强调不允许分裂联邦，并向南方保证政府不会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现存的奴隶制度。但是南方奴隶主不作任何让步。戴维斯公开宣称：“我新政府的基石，乃是坚信黑人不能与白人平等；当奴隶……是黑人正常的社会身分。”

1861年4月12日，南方叛军首先炮轰查理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公开挑起内战。林肯被迫宣布南部各州为叛乱州，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而战。人民群众纷纷响应，联邦政府迅速组织起30多万人的军队。

美国南北方的矛盾终于发展成全面的武装斗争。马克思指出：“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是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处。”从战争的性质看，北部进行的是反对奴隶制的正义战争，因而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黑人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

内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4月至1862年年底。这一时期南方奴隶主控制着战局的主动权。1861年7月21日，马那萨斯城会战，联邦政府军惨败，南军直逼华盛顿城下。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南方奴隶主谋反叛乱已久，南军准备充分；而北部准备不足，林肯开始尚缺乏作战的决心，内战爆发后，只能是仓促应战。林肯对战争的性质也缺乏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作战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联邦宪法和恢复统一，没有明确认识到要彻底废除奴隶制，因而没有采取切实的革命措施，没有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解放黑人奴隶的问题。1862年6—7月，政府军进攻里士满又遭失败，首都华盛顿再次告急。联邦政府方面的屡次失败，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纽约和其他城市的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挽回败局。1862年5月20日，林肯政府通过了著名的《宅地法》；9月22日，林肯又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黑人奴隶的参战热情，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联邦政府军方面好转。

1862年年底到1865年，是内战的第二阶段，联邦军转入反攻。1863年7月1—3日，联邦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盖特茨堡战役的胜利，在西战场又攻陷了维克斯堡，南军开始溃退。1864年，谢尔曼将军率领的联邦军占领了南方许多重要地区，切断了叛军的供应线。1865年4月3日，联邦军攻占里士满，4月9日，南军总司令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城率部投降，内战以北方胜利而告结束。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取消了黑人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为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迅速发展、赶上和超过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

（2）林肯及其民主改革

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年），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但在学校里学习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后经自学当上律师。青年时代他当过雇工、店员、水手、测量员、邮务员。1834—1842年，任伊利诺斯州议员；1847—1849年当选为联邦国会众议院议员；1856年加入共和党；1860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

林肯在青少年时期就痛恨奴隶制度。他在奴隶拍卖场目睹奴隶贩子毒打

奴隶的惨景大为震惊，对伙伴说：“我们走吧，等到那么一天，我有机会来打击这一制度的时候，我一定彻底把它打垮。”林肯品德高尚，在作律师期间曾获正直廉洁之美名。内战时期，他征得妻子的同意，把儿子送上战场，他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内战的进程，他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为消灭奴隶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美国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政治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在历届总统排名中，林肯高居榜首。

在内战刚刚结束之际，不甘失败的奴隶主收买的间谍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一个演员）于4月14日在华盛顿福特戏院开枪射击林肯，林肯中弹，次日晨逝世。林肯是一位为民主和自由而献身的战士，马克思满怀尊敬之情评价林肯说，他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伟大的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后退；……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这位出类拔萃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林肯政府实行民主改革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颁布《宅地法》，二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不反叛政府或不与政府作对者，只要缴纳10美元之证件登记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西部国有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可拥有该土地所有权。该法案用“美国方式”解决了美国人的土地问题，并杜绝了奴隶制向西部的扩张，保证了农业资本主义沿着美国式道路发展。这一法案在内战期间颁布，极大地调动了北方人民参加反奴隶主斗争的积极性。

《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凡反叛合众国的州及地区的奴隶从1863年1月1日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行政部门，包括海陆军当局将承认并保障这些人的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中”凡符合条件的人，“合众国将接收他们服兵役”，参加保卫合众国的事业。这一宣言使390万黑奴获得解放，23万人加入了联邦军，3.8万黑人官兵在内战中捐躯。

在内战期间，林肯政府还采取措施打击后方反战通敌分子。为了整顿和扩充军队，1863年3月国会通过了《征兵法》，实行义务兵役制。政府还清除了部队中立场不坚定的军官，依据个人才能和战绩选拔各级指挥人员，重用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将领。国会还于1862年制定征收累进所得税法案，年收入600至1万美元的人必须缴纳3%的所得税，收入1万元以上者缴纳5%。这使富裕阶层承担了较多的税额，缓解了内战军费开支的困难，也是和平时期国家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3）南部的重建

1865至1877年是美国南部“重建”时期。内战结束后，全国政权掌握在北部资产阶级手中，但是南部的民主党和奴隶主集团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影响依然存在，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南部面临着系列政治改革和社会重建的任务。

林肯总统逝世以后，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他站在奴隶主集团一边，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大赦参加叛乱的奴隶主，

恢复其政治和财产权利。在后来的 10 个月内，约翰逊颁布 7 项“重建”宣言，允许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允许南方同盟的代表出席国会，恢复了奴隶主对南方各州的控制权。约翰逊政府还怂恿南部奴隶主和种族主义者成立秘密恐怖组织——“三 K 党”，到处迫害和屠杀黑人。南部各州还制定了《黑人法典》，强行剥夺黑人获得土地的权利及其他民主权利。

约翰逊政府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1865 年到 1866 年秋，田纳西、北卡罗来纳等地黑人召开代表会议，抗议约翰逊政府重建南部的反动政策。这也推动了工业资产阶级为民主重建南方的斗争。国会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激进共和党人积极组织进步力量，并以 1865 年 11 月底成立的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为核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革命的措施，开始了共和党激进派重建南方的阶段。

1866 年 3 月 13 日，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法案规定给予一切在美国出生的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论其民族与肤色，也不管以前他是奴隶还是劳工。4 月，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提出了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承认黑人具有公民权和投票权，并承认黑人和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法案 1868 年由各州批准，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1867 年 3 月至 1868 年 3 月，又通过 3 项有关重建的法案，将未经重建的 16 个南部州分为 5 个军管区，实行军管，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给予保障；在军管时期，各州逐步建立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宪法会议，制定保障黑人选举权的宪法；各州逐步建立州议会，批准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然后依法请求加入联邦。从 1867 年 3 月到 1868 年夏天，南方各州举行了联邦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建立了南方诸州政府，这是工业资产阶级进步势力、非奴隶主白人居民和黑人代表共同执政的政权。有些黑人被选入议会和州政府，有的还担任了副州长，但主要权力掌握在白人激进派手中。

新建的各州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政策，如颁布《黑人公民权利法案》，废除《黑人法典》和过去的奴隶法。各州还实行教育改革，建立公立学校，实施普遍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免收学费，贫苦的黑人儿童有了就学机会。

在重建时期，没有用民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原种植园主的手中，原来的黑人奴隶变成了他们的佃农。他们每年至少要把收成的一半缴给种植园主。这种谷物分成制实质上是奴隶制的残余。

南方种植园主采取各种方式破坏民主重建事业，他们用“三 K 党”这一恐怖组织破坏和扼杀新政权。“三 K 党”活动很猖獗，1867—1868 年至少杀害了 5000 人。南方民主党人还利用共和党人的内部矛盾向民主政权进攻。共和党一些人的贪污腐败也使其威信扫地，一部分共和党人转向民主党。在 1876 年的大选中，形势对于共和党极为严峻。大选结果，除了 4 个州的 20 张选票发生争议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票还略多于共和党候选人海斯。1877 年 2 月，两党协商达成协议，将有争议的 20 票给了海斯，海斯当选为总统，但条件是必须结束南部的军管，恢复地方自治，保证民主党在联邦政府的发言权。1877 年 4 月，海斯总统下令撤出驻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军，恢复了民主党人在南部各州的统治，民主重建南方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民主重建南方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北方的妥协不等于南方奴隶制的完全复辟，可以说借助法律手段基本上废除了奴隶制度。民主改革也改变了南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其经济形态已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但是由于

资产阶级保守派在南方占上风，奴隶制残余有所保留，种族歧视仍是压迫黑人的一座大山。

3. 美国两党制度的形成

(1) 早期的全国性政党

美国最早的两个全国性政党是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联邦党形成于 18 世纪 80 年代，成立的目的是批判“邦联条例”，宣传联邦制，促成联邦宪法在各州议会通过。联邦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他以拥护联邦宪法自居，自称“联邦党人”。联邦党代表东部新英格兰富人、土地投机者、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利益。1789—1800 年，联邦党人在政府和参众两院中均占优势。汉密尔顿任华盛顿政府的财政部长。

民主共和党于 1792 年成立，创始人为杰斐逊。该党成立的目的是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维护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该党建党初期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其主张受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及南方部分地主的拥护。

两党在前几届政府的内外政策方面存在许多分歧和斗争，这表明政党已开始干预政治。但是，开国元勋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政党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甚至还在不同程度上厌恶政党，希望消灭政党。1796 年华盛顿谢绝连任后，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首次以政党身份竞选总统，政党干预国家政治公开化。但是双方都没有使本党获胜的强烈意识，允许同时投两党候选人的票，结果产生了两党分别担任正、副总统的局面。这一时期两党对于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两党制还没有真正形成。

(2) 两党制的形成和总统选举的演变

19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美国两党制形成的条件逐渐成熟。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繁荣。1812—1814 年，美国取得第二次反英战争胜利，获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权。经济发展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政治力量也发生分野。在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出作用；随着外贸的扩大，旧有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日渐强盛。1800 年以后，民主共和党蝉联总统职位 24 年。

法国革命爆发后，英法矛盾激化。民主共和党反对联邦党的亲英立场，声援法国人民。但在 1796 年的大选中，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当选为总统，杰斐逊为副总统。1798 年，亚当斯政府颁布 4 项摧残人民权利的法令。民主共和党发动全国进行斗争，取得胜利。1800 年，杰斐逊当选为总统。该党主张在经济上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和对英国的依赖，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并积极参加 1812—1814 年的第二次反英战争，得到全国各阶层的支持。联邦党由于反对法国革命，并于 1794 年派代表赴英签订对英妥协而有损美国利益的条约，美英战争期间策划分裂国家的阴谋，导致联邦党名誉扫地，大失人心，到 1816 年联邦党人已不复存在。

1816—1828 年，民主共和党成为国内唯一政党。在民主共和党内，工商业资产阶级为共同对付种植园主的力量而走向联合。在 1824 年的大选中，他们打着青年共和党的旗号，竞选总统获胜。20 年代末，该党分裂为两个政党：一个是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1828 年成立；另一个是以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的国民共和党，1825 年成立，1834 年改称辉格党。民主党以西部和南部棉花种植园主为核心，联合东北部的小农场主、中西部的个体小

农以及一小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在 1828 年的竞选中战胜国民共和党，其领袖杰克逊当选总统。

马克思曾经指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实际上是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杰克逊执政后大权独揽，运用行政首长的身份，运用宪法给予总统对国会所通过的法案可以进行否决的权力，直接参与立法。可以说，美国总统把宪法赋予的否决权扩展为立法权，始于杰克逊执政。他还加强了内阁的作用，不邀请任何反对派入阁。在杰克逊周围聚集一批亲朋密友组成的小集团，在重大方针政策方面献计献策，被时人称为“厨房内阁”。由此，总统的权力大为膨胀，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总统制。杰克逊公开宣扬说总统比国会更有资格代表选民意志。杰克逊就职后罢黜了近一千名官吏，另外选拔了一批忠实于自己的民主共和党党员担任要职，其中有银行家、土地投机家等等。杰克逊的亲信威廉·马西直言不讳他说：“在政治上正象在爱情上、战争上一样公平，脏物属于胜利者。”

在 18 世纪末，美国两党对于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认识是不自觉的，没有把实现本党的建国方针和政党的作用密切联系起来。但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各党已把主要目标瞄准在竞争总统职位上了。这是一个质的变化。1828—1834 年是民主党和国民共和党对峙的年代。可以说，这时两党制在美国已经初步形成。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1834—1854 年民主党与辉格党对立期间又有进一步发展，并最终确定下来。在 19 世纪 20—40 年代，选民基本上都卷入两党政治，成为两党相互竞争所依靠的基本队伍。拉选民、争选票、组织竞选已成为两党基层机构的重要活动内容，选民的财产限制也逐步被废除，美国的政党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

（3）共和党的建立及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

共和党于 1854 年 7 月成立。它是废除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条件下，由辉格党人、北部民主党人和其他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起来的。共和党在建党初期主要代表东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该党主张废除奴隶制，得到国内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共和党人林肯于 1860 年 11 月当选为总统，该党首次执政。在南北战争中，以林肯为代表的共和党人领导北部军民粉碎南部奴隶主的叛乱，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联邦的统一。

南北战争以后，共和党连续执政 20 年，先后由约翰逊、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出任总统。1885 年大选失败，成为在野党。1888 年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再度执政。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资产阶级内部两大派别互相矛盾和制约，形成了两个主要资产阶级政党互相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共和党自 19 世纪中期建立以来至今，一直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

4. 年轻的国家加拿大

（1）短暂的发展历史

加拿大位于西半球北美洲的北半部，国土面积 9,997,610 平方公里（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401 页。

威廉姆斯：《美国史略》，芝加哥 1966 年版，第 237 页。

加拿大外交及国际贸易部提供的资料),居西半球之首,是世界第二大国家。加拿大东、西、北三面分别被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所环绕,南部与西部与美国相邻。美国是加拿大唯一的邻国,两国之间国界线长达 5500 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界线。两国公民不需签证即可跨越国界。

加拿大这一名称的来历有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据说第一个发现加拿大的人是欧洲航海家雅克·卡蒂尔。他曾来到现在称为魁北克市的地方,问当地的印第安人那个地方叫什么,他们以为他是在问他们居住的小镇,就回答说:“Kanada”。在休伦·艾罗夸印第安语中“kanada”是“居民点”的意思。卡蒂尔回到欧洲后就宣布自己发现了一个叫“Kanada”的新大陆。就这样,以讹传讹,这一片新土地后来就被称为“Canada”了。

加拿大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 500 年,其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昔称爱斯基摩人),一般认为他们是在 3 万年前通过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从亚洲来到北美洲的。欧洲人与这里原始居民的接触约在 1000 年前,当时冰岛的古挪威人到纽芬兰定居了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又经过 600 年,欧洲人开始对北美产生探险的兴趣。后来,为了探寻通往远东商业市场的最佳路径,英国和法国的探险家们踏遍了北美的水道,并且建立了一些殖民的前哨基地,法国人大都沿着圣劳伦斯河、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英国人则围绕哈得孙湾和沿着大西洋沿岸建起了一些基地。永久性的英、法拓居地是从 17 世纪初开始建立的,经济活动也日渐增多。北美的新法兰西殖民地和纽英格兰殖民地在经济上一直依赖当地的毛皮交易,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却依赖他们各自的祖国。因此,北美也就成了英、法两国的角逐场。1759 年法国在魁北克城亚伯拉罕平原之役中被英国打败。1863 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根据巴黎条约,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法国领土都割让给英国,但不包括纽芬兰附近的圣皮埃尔及米克隆 2 个小岛。这样加拿大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的统治下,讲法语的加拿大居民一直坚持他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的决心及来自南方殖民地(纽英格兰)的动乱,导致英国于 1774 年通过魁北克法案。这个法案对法国的民法做了正式认可,并承诺保障其宗教自由。

1776 年美国独立之后,众多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居民,即所谓联合帝国保皇党人士大量涌入加拿大避居,其中大多数定居在新斯科舍及新不伦瑞克及五大湖沿岸地区。1791 年,“旧魁北克省”被分割为上加拿大(现在的安大略)和下加拿大(魁北克)两部分。两者都被授权组建自己的治理机构。

1837 年和 1838 年在上、下加拿大都发生过短暂的叛乱事件,这促使英国当局在 3 年后把这两个殖民地联合为一个省,但仍分别称为东加拿大(魁北克)和西加拿大(安大略)。1848 年这个联合省被授权组织自己的政府,负责除外交之外的所有活动。加拿大因此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仍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2) 新国家的诞生和向西部的扩张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加拿大爆发了争取独立的运动。这一时期,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及纽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起来。但美国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一些人意识到必须把北美英国殖民地联合起来才能抵抗被美国吞并的命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867 年 7 月 1 日根据不列颠北美法案的规定,东、西加拿大和新斯科舍、

新不伦瑞克合并起来，成为加拿大自治领，在英联邦内获得独立。这个历史性事件可以看作是将“加拿大”一词正式用来指现在这个国家的开端。

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不久，就从哈得孙湾公司买下了鲁珀特之地——即从哈得孙湾向南及西延伸数百公里的广大地区。现今加拿大的某几个省就是从这片土地划分出来的：1870年的马尼托巴省和1905年的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达省。1905年以后，剩下的土地被称为西北地区。育空地区于1898年爆发淘金热之后，被正式纳入版图，以确保加拿大在当时当地的主权。不列颠哥伦比亚自1858年即是皇家殖民地，1871年在取得兴建铁路与全国各地连接的承诺后，也决定加入联邦。1873年爱德华王子岛也加入联邦，只有纽芬兰拖到1949年才成为加拿大第十个省。

（3）不列颠北美法案及加拿大政治制度

该法案1867年春由英国议会通过，同年7月1日正式生效。在1982年4月颁布《加拿大宪法法案》以前的100年间，它一直发挥着加拿大宪法的作用。这一法案的提出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也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统一联邦条件成熟的产物。1863年6月，各省代表参加了夏洛特敦会议，一致同意就联合问题进行协商；同年10月，举行魁北克会议，继续讨论了联合的原则和具体事项，并作出了72条决议，称魁北克决议案，它奠定了建立联邦的基础。1866年加拿大省、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的代表和英国殖民部官员举行伦敦会议，就联合问题进行最后磋商，并将修改后的魁北克决议作为不列颠北美法案草案提交英国议会通过。186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该法案，确立了加拿大的联邦制度，定名为加拿大自治领，实质上是一个内政自主的殖民地。当时加入联邦的只有4个省。到1931年，加拿大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法案主要规定了联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议会与省议会的组织机构以及中央和地方立法权、行政权的划分等。按照规定，联邦拥有处理国防、外交、贸易、金融、邮政、筑铁路等全国性事务的权力；各省拥有处理土地、财产、民权、卫生、教育、市政等地方性事务的权力。法案的修改权属于英国议会。

1867年，加拿大参照美国的模式，实行联邦式政府。联邦制的创始人将立法权一分为二，设立了参议院与众议院。加拿大又采取了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国会由三部分组成：总督（由英王任命）、参议院和众议院。

加拿大实行责任政府制。内阁制定政府的政策，并向众议院负责。总理掌有行政与立法权，并被赋予极大的权力。通常总理从执政党议员中选任部长。政府要维持其政权，必须赢得众议院的信任；如不能得到众议院的信任，政府则必须下台，或要求总督解散议会。

加拿大是一个富于法制传统的国家，多数省份采用“习惯法”原则，这主要是受到英国的影响。在魁北克省实行民法原则，这是源于法国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久远年代。两种法制传统奠定了加拿大人的法制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加拿大的法制观念。加拿大的10个省之中有9个省实行的民法是以习惯法为基础的。习惯法是以先例为基础的法系。当一位法官的判决被执行之后，该判决就成为一个先例，其他法官后来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就依此判决为标准。加拿大的许多法律都是由这些先例和多年发展起来的习惯性做法所构成的。但魁北克省的民法却是以成文法为基础的。它详尽而全面地列出了决断各种不同类型案件的准则。法官根据民法来处理案子时，首

先要依据成文法的指导，然后才是参考先前的判决所提供的先例。

加拿大法律是由法院来解释和运用的。各省建有法院，负责实施联邦和本省的法律。联邦国会也设立一些法院。各省的法院分为两级或三级。第一级是省法院，主要办理大多数刑事犯罪案件。另一级是区法院或县法院，办理某些刑事案件和下级法院转来的上诉案件，还包括较大数额钱财的私人争端。省内最高级的法院是省高等法院，办理最为严重的案件。全国最高层的法院称为加拿大最高法院，它所审理的省高等法院转来的上诉案件，判决后是不能上诉的。

(4) 第一任总理及主要政党

约翰·麦克唐纳(1815—1891年)，加拿大自治领第一任总理。他生于1815年1月11日，1836年取得律师资格，1844年作为保守党代表进入加拿大省立法会议，1854年成为自由保守党领袖，1857年出任加拿大省总理。在1864—1867年的联邦运动中，他与卡蒂埃、布朗等政治家联合，推动了加拿大联邦的建立。1867年联邦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总理，后来被英国封为巴思高级爵士。1873年，因发生太平洋铁路丑闻而自动辞职。1878年，他再度出任总理，直到去世。他在任内积极主张和维护加拿大的统一，始终采取亲英立场，对美国保持独立。

19世纪建立的加拿大政党有进步保守党和自由党。进步保守党于1854年成立，代表银行保险业、铁道运输业等垄断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的利益，早期亲英，随着美国势力的渗入和发展，日益倾向美国。它一直是加拿大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自由党建于1873年，代表工业垄断集团的利益，也注意兼顾中小企业的利益，大部分时间处于执政地位，同美国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

议会制是加拿大人选择的政治制度，而保障权力划分的联邦制度，则不但适应加拿大多姿多彩的地理环境，而且尤其考虑到了加拿大是由两个历史上相对立的民族所建立，加上文化团体的多样性和双重法律及两种官方语言等传统。在多样中求统一是加拿大的目标。这也是加拿大希望能利用其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向全世界宣扬的理想。这确实是许多加拿大人的看法。

九、日本明治维新

1.19 世纪中期的日本

(1) 幕府的封建统治

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三个幕府：镰仓幕府（1192—1333 年）、室町幕府（1336—1573 年）和德川幕府（1603—1868 年）。幕府原来是指将军带兵出征时处理军务的营幕，后来将军掌握了全国统治权，幕府便成为将军统治全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1603 年德川家康在日本全国确立了统治地位以后，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到 19 世纪中叶日本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住在京都，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手中。幕府设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占有全国 $\frac{1}{4}$ 的土地，包括江户、大阪、长崎等重要地区。将军下面的封臣叫大名（诸侯），大名的领地叫“藩”，全国有 200 多个藩，大名从属于将军，向将军负担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一定义务，但在自己的藩内拥有军事、行政、税收等大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将军和大名都有自己的家臣（武士）。武士从将军或大名那里得到封地和禄米。天皇、将军、大名和武士构成了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

为了控制大名，幕府实行“交替参觐制”，把大名分为两部分，要求他们轮流到江户朝见将军，大名的妻子则长年留住江户作为人质，使之不能起反叛之心。在军事上，幕府握有直属常备军，其兵力大约在 10 万人左右，以控制各藩。

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除皇族外，全国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就是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占全国人口的 90%，无任何政治权利，而赋税负担却极为沉重。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的职业是固定不变、世代相袭的。在四个等级之外，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和屠宰等职业）和“非人”（即艺人、乞丐）等贱民，其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农民是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占全国人口的 80%，每年要向封建统治阶级缴纳地租和附加税，仅地租一项就占收成的 50—60%。此外还要负担各种劳役，如修桥、补路等，再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反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意识非常强烈。

实际上，到 18 世纪后半期，日本封建社会已开始解体，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已深入日本农村，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受到破坏。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把农民抵押过期不能赎回的土地收归己有，并招募农民开垦土地，开始用占用的土地剥削农民，成为新兴地主。工场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江户、大阪、京都等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并出现一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高利贷商人。

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大名、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逐渐资产阶级化，要求社会变革。本来上层贵族是鄙视工商业的，但是日益扩大的消费要求，增加了他们对货币的兴趣和追求。一部分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很想发财，他们或收商人为养子，或给商人作养子，或通过包税、

收高利贷，逐渐资产阶级化，士商等级被逐渐突破。日本西南部的萨摩、长州、肥前、土佐四个藩中的下级武士迅速扩充实力，成为当时日本政局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代表着日本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

（2）外国入侵和民族危机加深

早在17世纪初，日本的海外贸易就很活跃，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也很迅速。但是进入17世纪30年代以后，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这是西方殖民主义大肆进行海外扩张时，发生在东方封建国家的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这些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外面的世界隔绝。“锁国”政策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它不仅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更严重的是影响日本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锁国政策是不能永久维持下去的，它受到了日本社会内部力量的反抗，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冲击。

19世纪初，美、英、俄等国就谋求打开日本的大门，与日本通商，遭到幕府的拒绝。1842年，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妥协，首先允许外国船只在某些港口加煤上水。1853年美国以武力扣关，强迫日本开国。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舰队闯入浦贺港，打开了日本大门。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日本幕府被迫于1854年和1858年两次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54年条约规定：日本开下田、函馆（当时称箱馆）为美船停泊地，并允许美国在两地设领事和获得最惠国待遇。1858年条约规定：开放神奈川（后改称横滨）、长崎、兵庫、新泻、函馆五港通商；限制日本的海关自主权（低税率，非经美国同意不得改变）；承认美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

这期间，英、法、俄、荷等国也步美国后尘，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日本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外国的廉价商品潮水般涌进日本市场，使日本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和排挤。1860—1867年间，商品输入增加了13倍，输出增加了2.5倍，日本黄金大量外流，米价暴涨，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就连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义暴动连绵不断，出现了50—60年代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起义的高潮。1852—1859年发生起义50次；1860—1867年增至93次。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日本国内的危机，加紧对日本进行侵略。1862年，英、法两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驻兵横滨。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下关炮台，向幕府勒索300万美元的赔偿。1866年，该四国又迫使幕府修改税率。面对西方列强对日本主权的一再侵犯，幕府无力对抗，促进了幕府危机的总爆发。

（3）倒幕运动

1866年由于农业歉收，米价暴涨，幕府又加征巨额临时税，许多城市发生饥民起义。暴动从兵庫开始，扩展到大阪，进而席卷了近畿和东海各地。连幕府所在地江户也燃起了反抗怒火，斗争的矛头直指幕府。

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幕府的根据地武藏、上野一带，以贫农和手工业者为主发动了起义，他们要求选举地方官，平分土地和解除封建义务。城乡人民的斗争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推动了倒幕运动的发展。

幕府统治末期，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当时日本各级武士约有40万人，连同家属180多万。武士的生存是依赖于封建制度的，但是幕府日趋减

少其禄米供应，武士的生活日渐贫困，中下级武士与上级武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一种“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为了生存，一些下级武士不得不行医、当教师或经商，也有的当上了资本家。反对幕府统治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形成。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兰学”的传播成为倒幕运动的一种思想舆论准备。兰学是指用荷兰文来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包括天文、医学、草木学和兵学。在德川幕府时代，“程朱理学”被推为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宣扬“上者贵、下者贱”和“上下不违、贵贱不乱”的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1720年，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禁书令”，允许西洋自然科学书籍进入日本，在江户、大阪、长崎、京都等各大城市得到广泛传播，于是在日本形成了向儒学挑战的新的思想流派——兰学。兰学的传播，使一些资产阶级化的武士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政治思想和科学民主观念，对幕府昏聩无耻的封建统治更加不满，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下级武士和资产阶级结盟，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力量。

在外国势力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19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出现了由主张改革的下级武士领导的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幕府的“尊王攘夷”运动。“尊王”是指尊崇天皇，“攘夷”是反对外国的殖民侵略，“尊王攘夷”运动是因1858年（安政5年）5月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幕府的“大老”后发展起来的。井伊屈从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不顾许多武士和大名的反对，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即“安政条约”，使日本丧失了主权。一些武士联合部分公卿皇族胁迫天皇否决了“安政五国条约”。1859年，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下令，逮捕并处罚反对派人士百余人，处死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7人，西乡隆盛被流放。这就是有名的“安政大狱”。1860年3月，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刺死，“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进一步高涨。尊攘派同一部分公卿、豪农、豪商结盟反对幕府，并于1863年初以天皇名义敕令幕府攘夷。同年5月，长州藩的尊攘派炮轰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船只，接着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这一时期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西方列强对此疯狂报复，美、英、法等国舰队炮轰长州、萨摩等藩，攘夷志士们遭到失败。

维新派的著名代表木户孝允认为，攘夷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与夷人争论是非，而是与幕府争论是非。显然，攘夷是倒幕的手段。孝明天皇看到了尊攘运动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1863年8月18日，天皇和幕府发动政变，搜捕清洗尊攘派，尊攘派遭到毁灭性打击。尊攘派虽然失败了，却从中分化出一批更有革新精神的倒幕派。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对幕府和天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决定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同幕府进行斗争，并积极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时期人民起义运动更为高涨。

处于倒幕派和人民起义夹攻下的幕府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极力笼络反对派大名，谋求同朝廷妥协，以便孤立和打击倒幕派；另一方面，对作为倒幕势力根据地的长州藩，实行武力讨伐。1864年和1866年，幕府两次发动讨伐长州藩的战争。由于长州藩保守势力抬头，第一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幕府不战而胜。1866年幕府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这时整个形势已对幕府非常不利，农民、市民不断暴动，英国侵略者也从切身利益出发转而支持倒幕派，向倒幕派供应军火。这时许多大名看到幕府大势已去，均按兵不动，并反对讨伐长州藩。幕府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只好退兵。1867

年，安艺藩和土佐藩也加入讨幕联盟，倒幕势力更加壮大，倒幕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66年7月，幕府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在战败中突然病死，8月德川庆喜继任。他企图依靠法国挽救幕府败局。他在法国的支持下进行了军事改革，并向法国借款购买舰船和武器，法国得到了垄断日本蚕丝贸易及修筑铁路等经济特权。这样，幕府在日本国内完全丧失了民心，倒幕思想更加发展，倒幕势力日益聚集和强大。许多富农和商人都倒向倒幕派，在后来的倒幕战争中为倒幕军助战，甚至还直接组织武装参战。幕府的覆灭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 明治维新

(1) 明治政府的成立和1868—1869年的战争

1866年12月，孝明天皇去世。在倒幕派的拥立下，年仅16岁的睦仁天皇即位。1867年反幕军开始东进，迫使将军德川庆喜辞职，还政天皇。德川幕府则企图用形式上的还政，以天皇为招牌，继续维持幕府的统治。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等掌握了政权，并得到一些商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他们决定彻底剥夺将军的权力，勒令他交还土地。这一决定引起将军的反抗。1868年1月3日，倒幕派以天皇名义发布了《王政复古号令》，声称恢复幕府统治以前的那种由天皇独揽统治大权的政治局面，宣布废除幕府及一切旧的官制，建立由总裁、议定、参与组成的三职制的天皇政府。总裁由炽仁亲王担任，议定由公卿和藩主担任，参与由廷臣、藩士和平民担任。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倒幕派中坚人士都担任了“参与”。

新政府成立后，幕府看到大势已去，决定发动战争作最后的较量。1868年1月，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亲自率军从大阪出发，进军京都，扬言要把未成年的天皇从奸臣的围困中解救出来。在德川庆喜挑起战争的情况下，新政府立即派兵还击。幕府军同以萨摩、长州两藩军队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和伏见发生激战，德川庆喜战败，逃往大阪，最后回到江户，企图组织最后的抵抗。

鸟羽、伏见战役后，京畿以西各藩全部归附新政府，宣誓效忠天皇。2月，新政府组织以西乡隆盛为实际领导人的东征讨幕军，向江户进发，宣布要为民伐罪，得到沿途各阶层人民的支援和响应。幕府当局看到自己已溃不成军，遂决定投降。新政府畏惧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会不利于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便对德川庆喜有所让步，双方达成协议。德川庆喜于4月投降，政府军占领江户。新政府没有将德川庆喜处死，而是准许他回到家乡水户藩，并给他保留了领有80万石大米的领地。

德川庆喜投降后，关东和本州北部地区的幕府残余势力拒绝投降，组成了以会津为首的北部诸藩的联盟，举兵负隅顽抗。新政府军乘胜前进，1868年9月占领会津藩要塞松若城，接着平定了本州全岛。1869年5月新政府军大获全胜。

在胜利局面既定前夕，即1868年10月，新政府宣布改江户为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次年3月，国都由京都迁至东京。1868年10月23日，天皇睦仁将年号改为“明治”，即取中国古籍《易经》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话之涵义。政体是天皇制，睦仁年幼，实权掌握在改革派武士

手中。明治政府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2）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

施政纲领。如前所述，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稍后又于4月颁布《五条誓文》；6月发布《政体书》。这几个文献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施政纲领和改革纲领。

《五条誓文》的内容是：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破除旧类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

《五条誓文》表达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基本要求，倾向近代化、倾向民主的意向已很明显。

《政体书》曾被认为是“明治政府最初的宪法”，它是关于国家制度和机构设施的基本构想，基本遵循了近代欧美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来确立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机构。《政体书》明确规定实行太政官制。太政官掌握全权，下设行政、议政和司法三个部门；在地方设置府或县，受中央政府——太政官统一领导。“太政官制”采用了日本古代王朝使用的名称，而又模拟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实权掌握在行政官手中，辅佐天皇处理政务，从而完备了天皇亲政体制。明治政府的官制后来又有变更，“太政官制”也进行过若干次修改，其中明治四年的修改，使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参议，总揽政务，下设内务、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工部、文部等省。在国家机构的调整中，公卿和藩主逐渐被排除，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逐步加强，下级武士改革派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的地位不断加强，掌握了实权。

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1869年和1871年，明治政府先后实行“奉还版籍”（版，指土地；籍，指户籍）和“废藩置县”的改革措施。奉还版籍是明令各大名交出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和统治全国的土地和人民；废藩置县是打破藩界，把全国分成3府、72县（3府即东京、京都和大阪），由中央任命县、府知事治理政务。旧藩主迁居东京，政府发给相当于过去领地收入的俸禄。这一措施改变了过去由大名控制地方的封建割据局面，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措施为其他方面的资本主义改革奠定了基础。

废除封建等级制度。1872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旧的等级身份制，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平等”。除“具有神性”的天皇外，均改变原来的封建身份，大名、公卿改称华族，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和贱民统称平民。废除武士佩刀制度，各等级间可以通婚。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四民平等”，华族和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拥有很多特权，如政府发给他们俸米。1876年修改俸禄制度，制定以公债代替俸禄的条例，公债券一次发给领受者，有人用于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有的投资工商业，成为资本家。总之，封建身份制的初步改革以及职业和迁移的自由，扩大了地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地税改革。1872年以后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土地政策。1872年政府下令废除自1643年颁布的关于不得买卖土地的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种植。1873年，明治政府又颁发《地税改革条例》，

废除过去以土地产量为标准、水田纳米、旱田纳款的旧税制，实行新的地税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全国各地，不论水旱田，统一按土地法定价格征税，税率为3%，丰歉之年不予增减；新地税皆用货币交纳，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所有者还要附加缴纳合地价1%的“村费”。

明治政府的土地政策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占农民总数 $\frac{1}{3}$ 的佃农没有土地，只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1877年1月，由于农民的斗争，地税降至地价的2.5%。1881年地税改革基本完成。土地和地税改革剥夺了领主土地所有权，确立了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标志着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日本循着地租——地税——经营国家企业、扶持特权商人、发给封建主年俸（不少封建主将此款投资办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同时许多小生产者破产，沦为雇佣工人。这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军事改革和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明治政府建立起常备军和警察，作为推行新政权职能的主要暴力工具。内战结束后，明治政府把各藩舰队统编为国家舰队，以后又进行扩充。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三藩中挑选精良士兵组成近卫军，作为天皇近卫军队。1872年，太政官发布征兵法令，向全国人民征兵，建立现役和预备役的常备军，称“皇军”。日本军队一方面效仿西方模式，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封建武士道精神，许多旧有的武士充当了新式军队的军官，他们强调忠君爱国的封建传统思想。为了培植陆军骨干，1873年设立了陆军大学。

为了控制国内政局，对国内革命力量进行镇压，日本效仿欧洲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1872年司法省设立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1874年又决定警保寮归内务省掌管，在东京设立了警视厅，警察派出所遍布全国城乡，形成了全国性的庞大的警察网络。1873年还制定了统一的监狱条例，以后又建立了监禁政治犯和长期犯人的“集治监”。

工业化的方针——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日本经济与西方相比差距很大，明治政府首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求知识于世界”。1870年维也纳举办世界博览会。日本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60万日元，成立博览会事务局，由工部大臣佐野常民率7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赴奥参观学习（工部省在1870年成立）。为了考察欧美各国的财政经济制度和工业生产情况，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了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代表团，由岩仓具视带队，包括许多政府要员，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赴欧美访问考察。使团正式成员48人，另有59名留学生随行。这次出访的任务是：第一，谈判修改幕府末年和西方一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禁止外国军队在日本驻扎；另一个任务是实地考察欧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1873年9月，使团人员陆续回国。他们花费一年多时间访问考察了英、美、法、比、德、俄等十几个国家。他们的考察结论是：发展资本主义应该学习英国，搞军事建设要学习德国。1874年5月，大久保利通向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建议书。所谓“殖产兴业”就是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动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国库资金，干预国家经济建设，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建议书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人民的贫富决定的，人民的贫富又取决于物产的多寡，物产的多寡又与是否鼓励人民搞工业有直接关系，归根到底在于政府是否鼓励殖产，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国家就能富强。

为了贯彻“殖产兴业”的方针，从 1874 年起，明治政府大力创办国营企业，以官办的“模范工厂”引导民间兴办工业，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改造幕府时期的工业企业，并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加强本国技术力量。为了加强技术力量，政府选派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当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就取代了政府用昂贵代价聘请的外国专家。到 1889 年，外国专家均被解聘。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工作中，日本也发生过盲目引进的偏差，或单纯地强调引进，忽视了自己实际管理水平的提高。

1880 年以后，贯彻殖产兴业的政策由大力创办国营企业向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连年亏损的企业出售给私人。1885 年以后，除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全部低价卖给了资本家。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在早期的工业革命热潮中，日本的工业、农业、铁路运输业、造船、对外贸易等行业均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例如，交通和通讯事业，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修建东京至横滨铁路，后来有私人兴建铁路。1877 年日本引进了电话，首先在东京和横滨之间使用，以后推向全国。1885 年前后，电报干线基本建成，近代通讯网落逐渐形成。

“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19 世纪 70 年代，明治政府在国民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主要是学习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新日本。这是日本学习西方的一次社会思想改革运动。

在“文明开化”运动中，明治政府进行了教育改革。改革的方针是提高国民知识水准，普及初等教育；培养科技指导人才，创办科技教育机关；掌握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1871 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统辖全国文教事务。1872 年颁布了纲领性教改文件《学制》，发展欧式教育，重视普及小学教育，规定小学要实行近代化教育，学制为 6 年。日本把接受小学教育、服兵役、纳税定为“国民三大义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1873 年，小学就学率为 28%。1902 年上升到 92%。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就普及了初等教育。1872 年日本创办东京师范学校，1874 年设立东京女子师范学校，许多地方也都设立师范学校。1877 年创办东京大学，设立法、理、文、医等学部。1880 年东京大学设研究生院，1885 年发展为综合性大学。该大学成为传播近代科学、培养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心。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日本办起了大量的农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专业人才，促进了农业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3）福泽谕吉的政治思想

福泽谕吉（1835—1901 年），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出身于低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热心于兰学，才智出众，志存高远，性格倔犟，很早就离别家乡到江户独闯天下。1858 年在江户设洋学塾，讲授兰学。他 26 岁时自学英文，期望学习西洋先进科学知识，以求献身于国家的振兴与独立。1860、1862 和 1867 年，他三度出访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颇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推崇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坚决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确立了“文明开化”、“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写的《西洋事情》一书详细介绍了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使日本人耳目一新。他写的《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等著作，成为日本进行文明开化教育的好教材。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政府官员学者成立了“明六社”，召揽天下有志之士，研讨发展教育和启发民智的途径与方法。他们创办杂志，著书立说，翻译外文著

作，全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天赋人权和国民平等，主张君主立宪。这些思想在明治维新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深刻阐述了“文明开化”理论，他认为，狭义的文明仅限于物质方面，广义的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它应该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尚而说的”。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有阶段性，在早期，人们“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是为野蛮阶段；随后人类处于半开化状态，再后进入现代文明阶段。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在于科学技术的推动，文明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就是得；反之，使文明退步就是害，就是失”。他认为实现文明是人类的理想，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堪称文明的个人，固然可贵，但却不足，还要使“一国的人民团结起来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他还提出“崇实致用”论，呼唤人们为国家的富强而献身。

（4）天皇制的确立

1874年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主张在日本建立立宪议会，并要求参政，这一呼声极高。1881年天皇发出诏书，许诺1890年设立国会，颁布钦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国会设置两院；内阁向天皇负责，而不向议会负责。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天皇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明治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日本天皇制的政治结构，其核心是天皇，围绕天皇的中心部分是元老、枢密院议会和内大臣；中心部分外又有内阁、议会和军部三部分。从而形成了藩阀元老政治、政党议会政治和军部法西斯政治等政治形态。其中藩阀元老政治占有重要地位。

在1871年明治维新的政府体制改革时，确立了藩阀在国家政权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藩阀，指在明治维新中起决定作用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在维新后所形成的派阀，其中以长州藩、萨摩藩为主。元老是指这两个派阀的首脑，他们在明治中期以后逐渐退居二线。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有重大影响。

1885年日本近代内阁制度建立后，内阁就长期成为藩阀元老掌握国家权力的重要机构。藩阀元老有一套控制内阁的手段。首先是伊藤博文等通过制定明治宪法使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天皇将“总揽政治权”的责任间接委任予内阁。前七届内阁总理大臣全部由长州、萨摩藩的首脑轮流担任，使内阁长期成为藩阀的地盘。其次，藩阀元老通过各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天皇以适当限制总理大臣的权力。“首相既不能左右各相，各相亦不得系属于首相”，凡重大问题均须内阁会议决定，以防止“攀党联合之力左右天皇大权”。第三，藩阀元老对内阁成员人选握有决定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决定行政各部文官制及文武官员之俸给，任免文武官员”。但根据天皇一般情况下不参政原则，这项权力大部分转到藩阀元老手中，内阁人选首先由元老“提名”，实质上是一种决定权。可见，藩阀元老政治是近代天皇制的

《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著，中译本，1959年版，第32页。

同上书，第9页。

同上书，第30页。

同上书，第186页。

重要支柱。

在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中，形式上天皇占据最高位置，但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天皇长期独揽大权的政治形态。由于天皇始终被神格化，形成了天皇不参与具体国事的惯例。繁琐事务让天皇劳神则是对神的“亵渎”。天皇即使有参与国事的意愿，也要受到许多限制，只能深居宫中。这样，天皇只能以侍从长、内大臣等为代言人，天皇的法定权力则发生了根本的转移，侍从长、内大臣、藩阀元老等往往能左右政局。

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模式。它的司法权居于次要地位，出现了内阁的行政权和半立法权；议会的半立法权和军部的军事权这样不平衡的三权鼎立形态。内阁中设有法制局，法制局的行政部掌管起草审查关于外交、内务、劝业、教育、军制、财务、通信等法律命令；法制部掌管起草审查民法、诉讼法、商法、治罪法及与之有关的命令；司法部“掌管恩赦特典及诸裁判所之官制及行政裁判”。这是 1885 年内阁制建立时的规定。

伊藤博文为制定明治宪法曾去德国学习考察。他深受德国政治制度及法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三权分立学说已经过时，而“司法权作为行政权的一个支派均属君主统揽”，“司法不过是行政的一部分”。在他主持制定的宪法中形成了内阁拥有半立法权的规定。在明治宪法实施的 58 年中，一些规定也有变化，但内阁的半立法权始终没有被削弱。

（5）明治维新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明治维新是在日本封建制度趋于瓦解、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起来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是以一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武士结盟而进行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以武装斗争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政权，并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日本能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在面临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通过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迅速摆脱了困境，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当时亚洲独一无二的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它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 200 年完成的历史进程，并显示出西欧式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特征”。这一革新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符合日本的民族利益，逐渐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使日本避免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些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成为改革派，领导了这次革命。他们缺乏变革的系统思想和理论，并且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后的日本，仍保留了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天皇制的国家形式以及军国主义传统。下层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且还保留了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思想仍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资本主义自形成之时起，就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为了掠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十、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

1. 中英鸦片战争

(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是满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清王朝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总揽一切大权。皇帝之下设有内阁、六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机构，分理政、法及行使监察职能。雍正时期设立的军机处，这时已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清朝在内地 18 个省设总督和巡抚；边远地区设立将军，掌管边疆的军政治理权。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统治日趋腐朽衰落，“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比比皆是。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这一时期的国家军事力量也日渐削弱，一向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也武事荒疏、逐渐腐化。社会经济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土地兼并在全国盛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农民反抗情绪与日俱增，国内危机四伏。

打开中国商品市场的大门长期以来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凯觐，中国封建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自 1757 年起（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开始限制中外贸易，仅准在广州一口通商，并且规定中外贸易由公行垄断经营。公行享有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只有它可以承销外洋进口货与代办内地出口货。它是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唯一的媒介。参加公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当时称为洋商（外国商人称为外商），习惯上称为十三行。自 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通过十三行连续颁布几次防范夷人章程。1835 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颁布的《防范夷人章程》规定：（1）兵船不准驶入内洋，否则封舱驱逐；（2）不准偷运枪炮及私带妇女等至广州；（3）裁节外人内河船只，禁止不时闲游；（4）查拿在洋私买税货。

清政府不仅在沿海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采取闭关政策，对商民也实行禁止沿海贸易的政策，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封锁隔离政策，禁止边民到内地进行贸易和开垦，造成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更加落后的局面。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处心积虑的侵略企图，闭关有防范、自卫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并没起到具体作用。闭关政策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无求于人的大国主义思想，自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而轻视与他国的往来与贸易。

(2) 鸦片贸易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

西方列强一直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他们急于开辟中国这个市场，终于找到了鸦片这种扣击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贩卖鸦片不是个别鸦片贩子的不法行为，而是受到英国政府支持、符合英国殖民政策的罪恶行径。18 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就确定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的专卖权。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第一任总督哈斯丁斯明确说过：“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并严密垄断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甚至研究如何把鸦片的调制达到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运到加尔各答的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然后再由投机商人转手

给走私商人运往中国。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还有美国和俄国。

1729年前后，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大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1767年以后，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1000箱，每箱获最高纯利1000元。到19世纪20年代前，英国每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每箱120斤）。30年代以后，鸦片输入量剧增，1838—1839年达到35500箱。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严重损坏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鸦片烟毒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泛滥成灾。清朝统治者中的多数贵族大臣终日昏昏，热衷于鸦片走私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享乐。只有少数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吏士绅对烟毒所造成的危害深为焦虑，力争堵塞鸦片走私渠道。

1838年，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掌殿廷仪礼）黄爵滋上奏皇帝，建议在严厉查禁鸦片贩的同时，要重治吸食者。这一奏折得到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陶澍等人的坚决支持。

林则徐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主要代表人物。1838年7月，他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并在两湖地区切实实行禁烟措施，成绩显著。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10日，他到达广州，到后第八日，即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责令所有进出广州的外国商船出具“甘结”（保证书）：“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他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还出示告谕军民绅商，凡吸食鸦片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同时还指名捉拿贩烟要犯。

林则徐的禁烟命令和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人阴谋破坏禁烟运动。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潜逃，阻止英商缴烟、具结。林则徐接到当地群众的禀报后，派人监视洋馆，下令停止了中英贸易。义律不得不指令英国商人遵照中国法度申报存烟数量，按期上缴，并劝美国商人缴烟，承诺烟款由英国政府支付。

从4月12日到5月21日，共收缴鸦片19,179箱又2,119袋，共重2,376,254斤。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将200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虎门销烟的场面盛况空前。海滩上鞭炮齐鸣，掌声雷动，群情激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意志，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反动气焰。林则徐领导的这场禁烟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伟大斗争的起点。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历任地方官，有廉洁之美名，实心任事，并具革新倾向。1837年2月升任湖广总督，任内力主禁烟。

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是把维护民族利益和了解世界统一起来的杰出政治家。他组织人员把搜集到的有关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资料编成《四洲志》，派人翻译西方国家的书籍和

报刊，以便让国人了解世界，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大多鄙视西方，不愿与外国人接触，对西方先进技术不屑一顾，妄自尊大。然而，林则徐在禁烟斗争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了了解世界的必要。他不是闭关主义者，更不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他在广东，一是禁绝鸦片；二是鼓励合法通商。他所打击的只是那些鸦片贩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英国官员，而不是一般的正当商人。林则徐提出“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斗争方针，成为反侵略和学西方结合起来的务实的政治家。在禁烟斗争中，他一不向贿赂伸手，二不向困难折腰，以坚强的意志和果敢的行动赢得世人敬仰，就连英国人也敬重他。在他死后不久，英国有人为他制作了蜡像，陈列于伦敦蜡像馆，而且陈列的时间相当长。他是 19 世纪中期名震全球的伟人。

林则徐的一生是悲壮的。1840 年，他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由于他坚决反对英国侵略者，遭到投降派的诬陷和打击，同年 10 月被革职。1841 年，林则徐赴浙江筹划海防；1842 年被流放新疆伊犁。他在新疆兴办水利，开垦农田，为民办事，为国效劳。1845 年，林则徐被起用为陕西巡抚，擢云贵总督，后因病辞职回籍。1850 年，清政府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处理广西的农民起义问题。他抱病前往，病逝于广东潮州途中。林则徐善诗文，有《林文忠公政书》和《信及录》等。

（3）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19 世纪 30—40 年代，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国内工商业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商品积压，失业严重，工人运动高涨。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摆脱困境，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一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立刻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器，英国政府开始积极策划一场侵华战争。

1839 年 10 月，英国借口“保护通商”，正式决定出兵侵略中国。1840 年 4 月，英国政府命令乔治·义律率领 40 多艘舰船和 4000 多名士兵开赴中国，6 月 21 日集结在广东海面，28 日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林则徐已改任两广总督，他督率广东军民严守海防，使英军侵占广东的企图未能得逞。7 月 2 日，英军进犯厦门，又被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率部击退。英舰继续北驶，进犯浙江，7 月 5 日攻占定海。8 月，英军窜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投递照会进行威胁。道光皇帝威慑英军的武力，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与英方谈判。琦善在同侵略者的交涉中屈膝求和，希望英军退回广东进行谈判，并许诺英方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击入侵之敌，侵略者涉足之处，无不遭到英勇反抗。在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离城约 5 华里。1841 年 5 月，广州战役开始后，英军的暴行和清政府的投降，激起了三元里一带人民的无比义愤，各界民众纷纷表示要与侵略者决一死战。5 月 29 日，一小股英军在三元里一带肆意抢劫，调戏妇女，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英军多名。为了抗击侵略者，三元里人民决心联合行动，三元里附近 103 乡的民众积极响应，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侵略武装力量。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水勇都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5 月 30 日，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进入了高潮，奋勇向英军驻地四方炮台进军，击败英军数十名，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31 日，广州附近 400 余乡的义勇赶

来参战，数万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义律率军赶来救援、亦被包围。英军奸细突出重围，向广州官府求援。奕山立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使英国侵略者得以逃出重围。6月1日，英军撤出广州，退至虎门外海滩。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显示了人民的强大力量。他们向侵略者庄严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这场斗争也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西方列强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另外，在闽、台、浙、苏等地，英国侵略者也遭到了英勇抵抗。英军进厦门时，英勇的福建人民把英军赶出厦门，使其逃往鼓浪屿。1841年9、10月间，英国军舰两次进犯台湾，均遭到台湾各族人民的迎头痛击，台湾军民缴获大量战利品。在定海、镇江和宁波等沿海地区，群众组织起“黑水党”，伺机杀敌，两个月之内，抓获和消灭敌人数百名。宁波人民还发布了《众义民公启》，号召民众同心协力，定期起事，共同消灭入侵之敌。在长江流域，民众也多次发动对侵略者的袭击。太仓皋桥的农民诱使英舰上的士兵登岸，然后奋力打杀，吓得英军再不敢登岸。

中国人民进行的反英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昏庸妥协，也由于清朝社会的经济落后，国力衰竭，尽管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取得某些局部的、个别战役的胜利，终究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败局。

（4）《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耆英、伊里布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战后英国在香港建立了殖民机构，香港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和商务基地。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驻领事。从此，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被打开。

赔偿英国款项总数为2100万元。其中军费12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费300万元。另外，1841年5月奕山还交付广州赎城费600万元。

在广州等五口通商地区协定关税。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中国海关增减进出口货物税率，须要经双方同意。这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提供了方便条件。

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这项规定践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自主权，也为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势力提供了便利。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为了议定关税税率等问题，中英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英国又在1843年强迫清政府补充了《五口通商章程》，同年10月，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并称《虎门条约》。英国从《虎门条约》中又取得了如下一些特权：

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处理。这项规定侵犯了中国的司法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恶劣先例。

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英

国人都要“一体均沾”。这一条款几乎为所有列强所援引，成为他们攫取侵略权益的“合法”借口。

居住及租地权。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外国侵略者利用这项特权，逐渐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形成完全脱离中国管辖的特别区域。

《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这个税则是英方拟定的。中方完全接受了英方的条款。《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的签订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冲动，各国资产阶级都紧步英国的后尘，把勒索的魔爪伸向中国。1844年7月，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1851年8月，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领土被分割，主权完整被破坏，政治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丧失。战前，中国在经济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2. 太平天国运动

（1）洪秀全和金田村起义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生于农民家庭。他幼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孝经》等多篇古文。他喜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很深，当过私塾教师。自16岁起四处广州府投考不中。在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受到启迪，从此他开始从事传教活动。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844年春，洪秀全与冯云山辗转赴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宣传革命。同年10月，洪秀全回花县制作宣传文章。1845—1846年，他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论证“皇上帝”是不分中外的“大共之父”，提出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人人平等”的“公平正直”的世界，号召人民起来战胜清朝封建统治者。

1847年秋至1850年间，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创建拜上帝会，积极发展组织，领导当地群众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为发动反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作准备。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治更加腐朽，英国鸦片走私更加猖獗，广大人民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被清政府各个击破。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把分散的群众斗争逐渐汇合成一股大起义的洪流。

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万余人陆续到金田会合，途中不断与阻拦的清军发生战斗；12月底，在平南县思旺击溃清军；1851年1月1日，又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战

斗的胜利使金田形势有了良好的开端。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拜上帝会会众在金田地区庆祝洪秀全38岁生日和起义胜利实现，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3月，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

（2）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和政策

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定都天京之后，各级政权组织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是天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后来在诸王之下陆续增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卒长、两司马等12级职官。爵位和职官不分文武，军政兼管。以后官制又有所变动。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关，分中央、省、郡、县四级。东王杨秀清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永安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定都天京后，东王府实际成为中央政权的国务管理机关。各级官员除奏谢恩赏可直达天王外，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东王裁处，最后才上达天王裁决。省级官员大都由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系统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关系的根本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途径和措施，描绘了几千年来农民理想的太平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对乡官的组织系统、任务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乡官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按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军民组织起来。乡官在维持地方秩序、征收赋税、办理军需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其成分比较复杂，除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外，充任乡官的还有流氓无产者以及地主士绅。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曾试图推行一套军事化的政策和制度。在天京，一度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商业，居民的财物一律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1855年初，天京居民恢复正常家庭生活，并允许私营工商业。

关于妇女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还提倡一夫一妻制，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他们还建女军，设女官。这些措施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和旧伦理观念。

在思想文化方面，太平天国对孔丘和儒家经书的权威采取了否定态度。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撤掉了他私塾中的孔丘牌位。他在1848年所写的《太平天日》中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把儒家经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书斥之为“妖书”，严禁买卖、阅读和收藏。但是儒家思想对维护太平天国的统治是有益的，所以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又宣布“孔孟非妖书”，删除其中的“妖话”仍可阅读。对《四书》、《五经》也只是作些枝节的改动，三纲五常、天命论、等级制等根本的东西仍被保留下来。

太平天国实行了开科取士制度，报考之人“不论门第出身”，试题“不本”儒家经典，体现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精神。

太平天国采取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他们严禁鸦片输入，鼓励正当贸易。

但是，太平天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并为宗教形式所迷惑，误把一些侵略者当作“洋兄弟”，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及“货税不征”。

总之，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都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但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因此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且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局限性，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3）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拜上帝会的最早会员。1851年金田起义后，因清廷搜捕洪秀全亲属，仁玕不能在家乡安居，去广西寻找太平军未果。1852年4月去香港，在瑞典教士韩山之处教书，并向韩山之口述了拜上帝会创立过程，韩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不久，仁玕回广东东莞任塾师。1853年再度赴香港，入伦敦布道会，任宣教师。1854年春到上海滞留半年，入墨海书院学天文、历算。是年冬再回香港。他3次避居香港期间，与外国传教士有较大接触，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859年，他辗转回到天京后，很受天王器重，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后兼管外交事务。1859年写成《资政新篇》，经天王批准颁布。他还著有《英杰归真》、《钦定士阶条例》、《立法制宣谕》等。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他在湖州扶持幼天王拟去湖北会合陈得才军，途中被俘，同年11月23日在南昌就义。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所著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是太平天国后期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包括四部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该文件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方案。在政治上，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出“权力归一”、“禁朋党之弊”；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使“上下情通”；发扬“公议”，以听取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在经济上，主张兴修铁路、公路及河道，举办邮政，设立银行等。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兴医院、办学校，提倡移风易俗。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不准外国人干涉我国内政。洪仁玕企图通过这一改革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使“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这一纲领虽已颁行，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加上太平天国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这一纲领未能得以实施。

（4）太平天国的后期活动和失败

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本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本营，从而使太平天国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太平军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的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和江苏的大部都纳入了太平天国的版图。

在太平天国节节胜利之后，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杨韦事件”和石达开分军出走，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害，武昌、镇江、九江相继失守，天京被围。

东王杨秀清很有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前期的巨大发展，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他个人权势的上升，骄傲专横的作风也日益滋长，

随意责罚太平军将士，有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东王驾出，官员回避不及，就要跪于道旁，他甚至借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借细小事杖责洪秀全。杨秀清上欺天王，下压有功将领的行为，造成了领导人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1856年夏，杨秀清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杨矛盾激化，给韦昌辉叛乱造成了机会。

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为了减少杨秀清对他的防范，表面上一向恭敬驯服，杨秀清轿到之处，他总是扶轿相迎。他甚至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其兄，而取媚杨秀清。对洪秀全更是极力阿谀奉承，骗得一个“爱兄之心诚”的美言。实际上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洪、杨矛盾。接到密诏后，他率3000心腹部队星夜赶往天京。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指挥部下包围了东王府，残酷杀害了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数千人，并造成天京城混战，二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被杀害，韦昌辉控制了天京，造成了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赶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不仅不服，还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逃往安庆，其在京一家老小遇害。

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并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在广大将士的共同要求下，洪秀全下令，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结束了韦昌辉在天京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但对他也存有疑忌，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极大地分散和削弱了太平军的兵力。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清军乘机猖狂反扑，太平天国遂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洪秀全为挽救危机，选拔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人重新组建领导核心。在军事上，太平军积极联合捻军作战，1858年9月，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三河大捷中重创湘军。1860年5月，再次攻破江南大营，并乘胜东下苏、杭，革命再度出现高涨形势。1860年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加紧勾结，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1864年6月，天王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散居江南各地的太平军亦被镇压下去。太平天国革命坚持长达14年之久，克复城市600多座，革命势力扩展到18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压迫的斗争精神。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外国侵略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勾结的情况下，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工农联盟，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

3.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1）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停泊于广州黄埔港的一只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该船是一艘属于中国所有的走私船，曾在香港注册，但此时已过期。英国为挑起事端，硬说它是英国船，

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中国士兵侮辱了英国国旗。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当地人民和爱国士兵奋起抵抗，英军被迫撤走。“亚罗”号船事件发生后，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还要求法国、俄国和美国共同出兵。法国借口一个天主教神甫在广西省被杀，跟英国共同出兵。沙俄和美国积极支持。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向广州进攻。广东人民发动了反侵略斗争，三元里及其附近人民又一次拿起武器，英勇打击侵略者。香港两万多工人罢工，使当地商务陷于停顿。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继续沿海北上。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6月26日和27日，清廷分别同英法订立了《天津条约》。在此之前，俄国和美国已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取得许多特权。11月，英、法又迫使清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国货物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白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白银200万两；扩大领事裁判权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带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并开炮轰击大沽炮台。美国兵船也从旁协助。中国守军坚决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船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

1860年7月，英法联军16000多人再次抵达大沽口外。8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攻占大沽和天津。9月，侵略军由天津继续进犯，逼近北京。这时，咸丰皇帝带领皇室和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负责议和。

10月，英法联军在得到俄国的军事情报后闯进安定门，控制了北京。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为了消灭罪证，于18日焚烧了圆明园，犯下了滔天罪行。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又于10月24日和25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以下内容：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资产发还他们；赔偿英法兵费各增至800万两。

这样，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进一步遭到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2）“北京政变”和慈禧“垂帘听政”

1861年的北京政变是晚清政治中的一大重要事件，它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斗争的结果，也标志着清朝统治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转变。

晚清时期，清廷内部存在3股政治势力。一股是咸丰皇帝周围的权臣，即顾命八大臣。他们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御前大臣额勒和布、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其中以载垣与端华政治地位最高，他们是皇室；而肃顺在朝中权势最大，有肃党之称。咸丰帝经常采用他们的主张。这一派主张对政治中的

弊端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对触犯法律的大臣也以法论处。肃顺重视选拔人才，提拔重用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他们还主张抵抗外国侵略，不肯妥协。另一股政治势力是奕訢。他是咸丰的异母兄弟，很有权势欲，曾任首席军机大臣。最初他也是主张排外的，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第三股势力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她是载淳（同治皇帝）的生母。在 1860 年咸丰帝离开北京避于承德之前，她与载垣、端华、肃顺的矛盾尚不明显。但咸丰遗诏命八大臣主持政务，完全排除了叶赫那拉氏以载淳生母的地位参与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叶赫那拉氏与顾命大臣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当时叶赫那拉氏势单力薄。她首先争取咸丰皇后钮祜禄氏，把她拉到与自己同进退的地位，然后又通过奕訢和奕訢取得联系，以利用恭亲王奕訢的势力。她通过让奕訢到承德为咸丰吊唁的机会，共同秘密策划政变。由奕訢联系，得到了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和胜保的支持。

1861 年 11 月，慈禧和奕訢借清朝皇帝回銮北京之机，立即发动政变（当时把在北京有党羽势力的肃顺安排去陪同灵柩缓行，肃顺尚在途中），肃顺被处斩，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其余或被革职，或被远戍，还有一些大臣被株连。只有额附景寿（奕訢的妹夫）未受牵连。政变后将已宣布的年号“祺祥”取消，另立年号“同治”，开始了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慈禧执政的开始。

慈禧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在同治时期。当时名为东、西两宫太后听政，实际上是西太后一人掌权。同治大婚后可以亲政，但大婚后第二年同治即死，同治皇后也被逼“殉节”。此后慈禧挑选了醇亲王奕訢的次子、年仅 3 岁的载湉（1871—1908 年）为帝，即光绪皇帝。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垂帘听政。1887 年光绪 18 虚岁，已可亲政，但西太后不肯放权，直到 1889 年才归政光绪。1898 年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幽禁，慈禧再次听政，并撤去了与朝臣相隔的垂帘，与光绪并坐，“若二君焉”。1908 年 11 月 14 日，慈禧死的前一天光绪死去（年仅 37 岁），慈禧又立光绪弟弟载湉的儿子溥仪（1906—1967 年）为帝，即末代皇帝宣统，即位时仅两周岁。

慈禧掌权后对篡权时的同盟者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打击。首先是排挤东太后慈安，致使慈安于 1881 年 4 月暴卒。其次是频繁打击奕訢。北京政变后慈禧对奕訢一再恩典，授其为议政王，但很快就对其采取打击政策。1865 年，就以奕訢“妄自尊大目无君上”和植党擅权为理由，免去其议政王和一切职务；只是由于众朝臣恳求及英国等在华外交使官相劝，慈禧才收回成命，恢复了奕訢的职权，但撤销了议政王的称号。1874 年 8 月，慈禧又以奕訢“召对失仪”的罪名把他降为郡王，并夺去了他的长子载湉的贝勒爵位，次日又恢复如故，以教训奕訢俯首听命。1884 年 4 月，慈禧又以“萎靡因循”的罪名把奕訢的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震惊朝野。慈禧把主持朝政的大臣改换为对她更为恭顺的奕訢（总理海军衙门）和贪鄙的奕訢（总理总署）等等。这时外国的侵略势力已把支持的目标确定为握有实权的慈禧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慈禧排挤奕訢就毫不干涉了。

慈禧对奕訢采取了利用、打击和控制的策略。奕訢政治上幼稚短视，性格软弱。慈禧利用他作为消除肃顺集团势力的打手和打击奕訢的工具。载湉入宫以后，奕訢更是对慈禧委曲求全，企望慈禧早日开恩归政光绪。然而慈禧从未减缓对光绪的虐待和对奕訢的打击与控制，直到奕訢辞世。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

朝政权也由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封建买办阶级的专政，并确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政治关系。

（3）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的变化

中国社会性质和政权性质的改变使清朝的国家机构设置和国家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设立了一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机构；二是打着“立宪”的旗号进行了某些国家制度的改革。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1865年正式设立海关总税务司署，表明清政府在政治和财务方面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控制。

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个过程。长期以来，清政府只重理藩，不重外交，未设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涉外事宜由理藩院和管理属国的礼部代办。鸦片战争后，为了适应中外“新的通商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变化，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初时一般称“钦差大臣”，由两江总督耆英兼充。1844年，耆英任两广总督，兼办“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五口通商大臣也成为兼任之职。五口开放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通商和外交的中心。60年代初，五口通商大臣一度由江苏巡抚充任，驻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岸口增多，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设立一个常任的全权机构来承办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有关事宜；而清政府当时正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迫切需要“借洋助剿”。在这种情况下，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这一机构的设立，使清朝政府早已存在的内阁形同虚设，进而分割了军机处的权力。

关于总税务司署，它是确立协定关税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攫取和控制中国海关的产物。1853年9月，上海道道台吴健彰因小刀会起义逃往“租界”，致使原有的海关无法征税。英、美、法三国领事便乘机以“协助中国征收关税”为名，开始行使中国海关职权，不久又提出外国人参与中国海关管理的主张。清政府为了得到外国侵略者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和多得一些税款，接受了这个无理要求。1854年成立了英、法、美三国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正式行使中国海关的行政权。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各税务司和海关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1865年在北京设立总税务司署，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他占据这个职位直到1909年。此人奸狡权大，他控制的总税务司署成为各侵略国控制中国的联合代理机构。

（4）魏源等人强国御侮的政治思想

鸦片战争不仅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分化出一批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反对投降、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姚莹和包世臣等人。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有深刻认识，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亲自参加了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他目睹侵略者的骄横残暴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坚定了为国复仇雪耻的思想。1842年，他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此书在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开拓殖民地、传教

活动，以及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生产状况、风土人情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论。他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出发，提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他认为西方国家所以强大，除了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强盛也必须走这条路。他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对清朝统治者复古守旧的反动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他重视生活实践，反对专从书本中讨知识的治学方法。

姚莹（1785—1853年），安徽桐城人。道光初年，他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相识；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入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及中国国情，所著《康輶纪行》一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作了深入考察，而且分析了英、俄等国的情况，揭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为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而自豪。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他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

包世臣（1775—1855年），安徽泾县人。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十分愤恨英国烟贩偷运鸦片，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期间曾建议林则徐和杨芳在广东沿海招募渔民和壮勇，阻止英军进犯，极为赞赏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主张选用三元里义民充任水师弁兵，乘胜收复香港。《南京条约》签订前夕，他赶写了《歼夷议》一文，建议发动南京城内的一部分清军，对英侵略者突袭，表达了他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他对社会问题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对漕运、盐政、河工和法律等问题都有积极的建议。在学术思想方面，他赞赏明末清初顾炎武一派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

4. 戊戌变法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经济的解体和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早期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原是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曾随李鸿章办洋务。他们的主要主张是：

在经济上，“振兴商务”，发展民间工商业，中国自己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银行和邮电事业，强烈抨击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和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

在政治上，兴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在思想上，宣扬“穷则变、变则通”的主张，为革新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一些思想更激进者对“孔孟之道”提出怀疑，甚至加以抨击。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作用，并在思想界施展其影响。80年代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变法”主张，并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股反封建的思想潮流。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也不满意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而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主张全面学习西

方，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并发动了以康有为为主要领导人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民族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现实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使他对封建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到失望，萌生了改革的思想。1879年以后，他有机会到上海、香港等地游览和考察，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事物，并开始阅读介绍西方的书刊，他意识到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赞赏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强国。中法战争之后，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他强烈要求变革图强。1888年，他写了五千言的上皇帝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一奏书没有到达皇帝之手。1891年，他回到广州，设立学堂，宣传他的主张。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康有为宣传变法的重要著作还有《大同书》。

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是这一时期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并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直报》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1898年向清帝上万言书，陈述变法纲领。1896至1906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并加按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严复堪称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父亲为湖北巡抚。他自1885年起，漫游10年，足迹遍西北、西南、东南十几省，对中国社会和民情有深入的了解。甲午战争后，他在浏阳创立算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之道。以后创办并捐助《时务报》，试办过农学会。他所写的《仁学》，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他对广大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他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他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认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具有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他对戊戌变法的舆论准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98年9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他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同时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师康有为。他主编过《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提倡“民权”学说。他所介绍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2）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派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以西方新学为武器，和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激烈论战，批判了反对变法、反对民权、反对西学的守旧思想，广泛传播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的维新变法思想。

“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从此变法的呼声更为高

涨，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也已基本确立。同年5月和6月，康有为又两次上书，反复强调变法的紧迫性，并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并说明设议院对皇帝有利无害。第三封上书递到了光绪手中。光绪认为康有为的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危机，非常重视。从此维新派得到了光绪的支持。

为了发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参与和支持变法，康有为等人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和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并大多是维新派创办的。

（3）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与反变法斗争非常激烈，在这一斗争的幕后是“帝党”和“后党”争夺统治权的激烈斗争。光绪赏识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许其专折奏事。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建议。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局事务；9月5日，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卿衔军机处章京。对“后党”的顽固势力，光绪则予以打击，7月8日，把攻击康有为的御史文悌革职；9月4日，又革去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职；7日，罢去李鸿章等总理衙门大臣职务。这些组织措施表明了光绪推行新政的决心。

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从6月11日至7月下旬，光绪颁布了几十条改革诏令，包括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方面，其具体内容是：

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部，切实开垦荒地，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全国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制度，等等。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派人出国游历、留学等。

7月下旬到9月下旬，又推行了政治方面的改革，如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重叠、闲散衙门，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上书朝廷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虽与维新派原来“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尚有距离，但毕竟表明他们愿意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

维新期间，光绪给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维新派关于实行君主立宪制、裁撤厘金及断发、易服、改元等主张均被光绪拒绝。新政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封建势力的顽抗。

光绪宣布变法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将帝党官僚首脑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免去，并驱逐回籍，又令嗣后二品以上大员授新职，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还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诸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做好了组织准备。9月初，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信杨崇伊等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10月底在光绪和慈禧到天津阅兵时举事政变。光绪得知后惊慌失措，乱

了阵脚，向维新派求助。维新派也无定见，竟向帝国主义和表面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结果袁世凯随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9月19日，慈禧即从颐和园回宫，密作政变准备。21日凌晨，慈禧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搜捕维新派，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经天津去了日本。谭嗣同拒绝了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把所著诗文和书稿交给梁启超保护，并决心一死以光耀变法。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不但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和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危机，挺身而出，主张变法，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倡导资产阶级新学，有力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播撒了新学的种子，以致在戊戌政变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旧学，追随新学，要求民主。历史证明，戊戌维新运动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主张维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想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幻想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不是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是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结果惨遭失败。

5. 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19世纪末年兴起的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直隶，然后迅速遍及山西、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南等省区。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组织。由于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的激化，它迅速由一个反清的秘密结社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组织。

甲午战争后，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和日本也把侵略魔爪伸向胶东半岛，在那里实行暴虐的殖民统治，外国教会势力在山东恶性发展，更给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世纪末，仅山东一省就有教堂千余所。清政府采取了“扶教抑民”的方针，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抗。鲁西北地区是德国军事统治的薄弱环节，经过长期酝酿，群众性的抗教反帝斗争首先从那里开始。

1897年春季前后，为了争夺玉皇庙基，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法国传教士指使下的天主教民发生冲突，当地群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山东巡抚张汝梅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义和团则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1899年秋，山东平原县义和团在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烧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和恶霸，并多次打败清军的进攻。1899年冬，直隶与山东交界一带的义和团反抗教堂压迫的斗争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春，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互相勾结，共同镇

压义和团。义和团与清军展开激战，义和团损失很大，一度转入秘密活动。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又高涨起来，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涑水一战打得清军狼狈不堪。

为了继续维护清朝的统治，保护自身的安全，并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清廷默许义和团为合法团体，并允许其进入北京城活动。与此同时，天津也几乎被义和团所控制。东北、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等地也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斗争浪潮。

（2）义和团的组织和“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坛口大多设在庵、观、寺、院里，或其他公共场所。各坛之间并不互相统属，但可联合行动，坛的负责人有老师、大师兄、二师兄等称呼。坛之大小不同，师兄数目也不一样，多者至六师兄、七师兄。他们负责训练队伍、指挥战斗和管理坛内事务。义和团的成员以男性青年为多，也有女青年和儿童参加。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先后提出过“助清灭洋”和“兴清灭洋”的口号。到1899年底，在直、鲁交界一带的义和团多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袁世凯镇压团民以后，这一口号在山东一度不太流行。但后来，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占上风之时，“扶清灭洋”的口号又广泛写在了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他们活动的纲领。

“义和团”口号的上述变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义和团提出“灭洋”的口号，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体现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扶清”，一方面是为了爱国；但由于清朝实行封建统治，“扶清”又说明义和团对反封建是缺乏认识的。其实，在近代中国反帝不反封建，反帝斗争是肯定不能彻底胜利的。

（3）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英勇斗争

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后来又决定直接派军队进行镇压。1900年6月，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2000多人的八国联军，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挑起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义和团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在大沽、天津、廊坊、北京等地，奋勇抗战。廊坊战役打死打伤侵略者近300人。在北京，义和团在围攻使馆的同时，对帝国主义在北京的宗教侵略中心——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包围63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

在东北各地的义和团，纷纷起来抗击俄国侵略者，并与当地清军协同作战，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侵略者胆颤心惊。他们据守瑗珲一个多月，在三姓抗战40多天；在瑛春毙敌200余人；他们还与当地驻军一起坚守海城40余日，多次击退俄军进犯。最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清政府的破坏，京、津和东北三省一些地方被八国联军和沙俄侵略军侵占，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

（4）中外反动派对义和团的联合镇压和《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的暴行骇人听闻。在北京，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一律焚毁。慈禧在出逃西安的路上，一面发布命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一面任命李鸿章和庆亲王奕訢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与帝国主义商议和谈。这样，清政府就与帝国主义公开同流合污，对义和

团进行共同镇压。当八国联军继续扩大侵略时，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清军不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按照李鸿章的命令大肆屠杀义和团。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既有共同的目标，又有各自的算盘；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夺。他们就议和撤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以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代理人。结果，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让步妥协，承认“皇太后（慈禧）为合例”，接受李鸿章为议和代表，而清政府要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1900年12月24日，除了武装侵略中国的俄、美、英、日、德、法、意、奥8个国家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11个国家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成为后来正式条约的主要内容。慈禧太后指使李鸿章无条件接受。1901年9月7日，上述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包括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

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京划定“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在这里驻兵，自行进行管理。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为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清政府向各国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以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千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都受制于帝国主义。

清政府将北京直到渤海一线的所有炮台、大沽炮台“一律削平”；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12个战略要地，派兵驻守；禁止中国两年内进口军火和军火燃料。这样，帝国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清政府的军事权。

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迫使清政府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100余人，并在侵略者被杀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大臣，办理今后与外国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的一个卖身契。这个条约，除了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穷凶极恶的敲榨勒索外，重新确立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的地位。清政府曾公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外国反动派绞杀了。但是，它对中国形势的发展具有不可泯灭的影响。义和团广大战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决心，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觉醒。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威慑了外国侵略者，打乱了他们瓜分中国的日程，甚至迫使大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周恩来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曾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在所著《中国实测论》中承认：“中国人数十年在沉睡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心而发，以强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关。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犂炮荷枪，以行

今日义和团未完之志者。”

义和团运动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义和团运动中，充分暴露了清廷的腐朽、愚昧和无知，情况的严重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致使有志救国之士莫不对现实感到绝望，从而迅速走上了革命道路。孙中山在评论那一时期国内形势时谈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清廷之威信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义和团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他们对清政府的反动两手策略认识不足，经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背后袭击和暗算。

十一、亚洲人民反对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斗争

1. 印度尼西亚爪哇人民起义

(1) 荷英法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和统治

早在 16 世纪末，荷兰殖民者就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入侵。1602 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实行殖民统治。1800 年，荷兰政府宣布解散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公司征服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从此开始了荷兰政府对印尼人民的直接殖民统治。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英法两国为了从荷兰手中抢占印尼，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806 年，拿破仑占领荷兰，将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王国，任命路易·拿破仑为荷兰国王。被推翻的荷兰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成为英国统治者的工具，操纵印尼殖民当局，成为英国侵占印尼殖民地的帮凶。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的争夺，委派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为印尼总督，丹德尔斯到印尼后，立即着手加强军政统治，扩充殖民军，创办军官学校，修建军事设施，如军港和炮台，还修筑了长达 1000 公里的军事公路。这些工程的实施，完全采取征用徭役的方式，强迫土著居民无偿做工，劳动极其艰苦繁重，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瘟疫流行，大批劳工死亡。

丹德尔斯极力削弱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力，他把爪哇分成 9 个省，由他自己直接统辖。他废除万丹苏丹，把万丹变成直辖区，还强迫日惹苏丹退位，大大加剧了荷兰殖民当局与当地王公的矛盾。丹德尔斯还假借筹备军费之机向土著王公敲诈勒索，同时强制农民扩大咖啡种植面积。由于英国的封锁，生产的咖啡和其他实物不能按计划运往欧洲，造成殖民地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和困难。丹德尔斯滥发纸币和出卖土地，土著农民深受其苦，从而引起农民对荷兰殖民当局的严重不满。因此，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很不稳固。

拿破仑战争期间，1811 年英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国委派莱费士为总督。莱费士推行有利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宣布印尼全部土地为英国政府所有，农民为世袭佃户，实行货币地租，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废除垄断贸易和国内关卡，鼓励发展私人企业。许多外国种植园主到印尼租赁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民），开办资本主义农场。

拿破仑战败后，荷兰恢复独立。1816 年根据英荷条约，又恢复了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荷兰仍采取旧的剥削方式，恢复垄断制度，力排外国势力，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在恢复旧有赋税制度的同时，又增加许多新税，如门户税、牲畜税、庭院税和过桥税等。殖民当局还在爪哇岛设 350 多个关卡，过卡即要交税。

荷兰殖民者还干涉土邦王公的内政，剥夺他们的实权，禁止各土邦封建主与外国的经济联系，例如不准他们把土地租给外国种植园主，已租出的要收回，严重地侵害了封建主的利益。总之，荷兰殖民者重回印尼后，更加重了对印尼的剥削和奴役，不仅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许多封建主也极为不满。印尼各阶级与殖民者的矛盾日趋激化，终于酿成 1825—1830 年爪哇人民大起义。

(2) 蒂博尼哥罗领导的爪哇人民起义

1825—1830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史称蒂博尼哥罗起义或爪哇战争。

蒂博尼哥罗（1785—1855年），是日惹苏丹的王子，曾任日惹苏丹的摄政，但荷兰殖民者剥夺了他的王位继承权。他企图推翻荷兰殖民统治，恢复王公贵族的权势，建立强大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起义前，蒂博尼哥罗已成为马塔兰封建贵族抗荷集团的领袖，他在日惹的领地成为抗荷人士的聚集地。荷兰殖民者视他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1825年7月，荷兰殖民者借口修筑公路，破坏蒂博尼哥罗的领地，并企图逮捕他。这一事件成为蒂博尼哥罗起义的导火线。

1825年7月20日，蒂博尼哥罗在斯拉朗发动武装起义。他以圣战为旗帜，号召人民为消灭异教徒——荷兰殖民者而战斗。成千上万的农民会集到他的旗帜下，一些封建主和阿訇也参加了起义。许多华侨也积极参加和支持起义。起义浪潮席卷了爪哇大部分地区。10月，蒂博尼哥罗建立了伊斯兰王国，自称爪哇素丹。1827年初，他整顿起义军，建立起几支骨干队伍，打得荷兰殖民军死伤惨重。后来荷兰方面采取了分化收买封建主的狡猾手段，不少封建主脱离起义队伍。蒂博尼哥罗的主要助手奇阿依·摩佐为争夺宗教最高领导权与蒂博尼哥罗发生矛盾。最后奇阿依·摩佐投降了敌人，起义军的著名青年将领申托特也叛变。这给起义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困难。荷军悬赏5万荷兰盾捉拿蒂博尼哥罗，但没有一个农民为领取赏金而出卖他。蒂博尼哥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抗战，多次拒绝敌人的诱降。

1828年3月，起义军在爪哇北部失败后，开始走向衰落。1830年3月，蒂博尼哥罗不得已同荷军举行停战谈判。他严词拒绝敌人的诱降，坚持要在爪哇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王国。荷兰殖民者背信弃义，将他扣留，终身幽禁于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坚持了五年的爪哇人民大起义最后失败了。1855年，蒂博尼哥罗死于流放地，他留下了一部《蒂博尼哥罗自传》。他在起义中始终坚持英勇斗争，甚至连荷兰殖民军官都不得不承认，“他虽然遭到一系列打击和不幸，仍然充满信心和勇气”。他是印度尼西亚杰出的民族英雄。

蒂博尼哥罗大起义是印尼人民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这次起义歼灭了15000多殖民军，惩办了许多殖民官吏，耗费殖民者2000万荷兰盾军费，烧毁许多种植园。这次起义揭开了19世纪中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

2.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1）扎伊尔王朝的统治

1796年，阿加·穆罕默德夺取了政权，在伊朗建立了扎伊尔王朝，定都德黑兰。扎伊尔王朝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高级阿訇是王权的主要支柱，负责宗教事务和裁判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则由世俗法院审理。国王下设首相领导的枢密院负责管理国家日常事务。全国划分为30个省和州。省总督和州长由王族国戚出任。

到19世纪中叶，伊朗仍处于扎伊尔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割据十分严重，各省、州的首脑都是拥兵称霸的一路诸侯，彼此混战不休，国王无法驾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保持着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游牧部落贵族又一向反对中央集权，甚至公开否认王权。因此，伊朗尽管有国王和中央政府，但在全国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号令。封建割据严重阻碍了伊朗社会经济的发展。

（2）伊朗的半殖民地化和社会矛盾的加深

19世纪初，伊朗已成为英、俄、法、美等列强争夺的对象，他们强迫伊朗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1828年的俄伊《土库曼彻条约》，俄国吞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阿塞拜疆，还取得2千万卢布的赔款和领事裁判权，以及在伊朗境内的自由贸易权，还有免交进口税的优惠待遇。1841年，英国强迫伊朗签订了内容相似的条约。法、美、奥等国紧步其后尘，也援例签订类似条约。从此，伊朗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商品，尤其是英国商品，大量倾销到伊朗，破坏了伊朗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处于萌芽状态的伊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也受到排斥或扼杀，造成大批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破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伊朗封建制度的危机。封建地主为得到更多的货币以供挥霍，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官僚，为获取大量金钱，则以高价卖官鬻爵。买得官爵的人，更是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伊朗的半殖民地化，加剧了伊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异族剥削、封建割据、诸侯混战和封建主的横征暴敛，引起了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低级阿訇的强烈不满，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阿訇，比较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在反封建斗争中成为群众的代言人。19世纪上半期，饥荒、瘟疫频仍，南阿塞拜疆地区有一半人口死亡。这对人民起义起了催化剂作用，伊朗人民群众奋起为生存而斗争，在一些地方，如赞兼、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等地都出现了零散的暴动和起义。1829年1月，在德黑兰，一些低级阿訇领导了一场抗俄斗争。他们率众冲进俄国使馆，杀死使馆人员。这些起义成为后来1848—1852年巴布教徒起义的先声和准备。

（3）巴布教徒起义

巴布教的创始人是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年），出身于棉布商人家庭，本人经商5年。他悉心研究伊斯兰教的神秘学说《古兰经》，1844年自称“巴布”。巴布的意思是门，救世主马赫迪的旨意通过此门传达于人民。1847年，他又自称马赫迪，并写了一部《默示录》，阐述自己的学说，并取代《古兰经》。巴布教的教义与正统的什叶派教义是相悖的，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巴布教徒分成两派。以巴布为首的一派代表城市商人和新兴地主的利益，幻想建立一个没有封建暴政和外国资本家剥削的、人人平等幸福的“正义王国”。巴布主张废除一切刑法和苛捐杂税，保护信巴布教者的私有财产，保障人身自由，严守商业通信秘密等。巴布反对使用暴力，企图用宣传、感化等和平手段，说服封建统治者实行他的改良主义主张，实现他的理想世界。然而封建统治者却用迫害来回答他，1847年将他逮捕入狱。

以农民出身的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幸福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一切平均分配。这一主张代表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这一派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和其他一些民主要求。

1848年9月，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乘伊朗出现王位之争、各州一片混乱之际，领导巴布教徒首先在马赞德兰省举行起义，平分财产，实行共餐制。王室几次派兵镇压，未能奏效，最后用欺骗手段，使起义者放下武器，然后进行屠杀。王军的暴行未能遏制巴布教的起义势头，到1849年2月，全国巴布教徒达10万人之多。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在赞兼举行起义，消灭敌军8千人。同年12月，王军炮轰赞兼，把起义者淹没在血泊中。

1850年6月，尼里兹也爆发巴布教徒起义。7月，国王下令处死巴布。巴布教徒的起义虽然遭到极大的挫折和打击，但一直坚持到1851年，以后还有隐蔽的恐怖活动。1852年8月，巴布教徒在德黑兰谋杀国王未遂。以此为借口，国王下令在全国大肆搜捕和屠杀巴布教徒，起义最终彻底失败。

巴布教徒起义是伊朗近代史上以宗教为掩护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斗争的主要锋芒是指向伊朗封建王朝，但这时的伊朗封建统治者已成为外国列强的走狗，因此这次起义也具有反抗外国殖民者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性质。

这次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下层劳动人民，但领导权则掌握在商人和阿訇手里，他们始终没有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未能广泛发动农民投身起义。各地起义者又各自为战，缺少联系，给敌人的各个击破造成了机会。

这次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矛盾，也使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巴布教徒起义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以重大影响，给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3. 印度民族大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1) 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印度是西方列强的重要角逐场。葡萄牙、荷兰都曾染指印度，法国和英国也卷入其中，最后英国取得了对印度的控制权。到19世纪中期，英国控制了全印度土地的2/3，人口的3/4。其余的地区由大约500个大小邦王公所统治。实际上英国成了整个印度的主宰。

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英国利用印度不同民族、部落、种姓、宗教和土邦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所有占领地都由东印度公司管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有所改变。1813年，英国通过“英属印度法令”，以自由贸易政策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政策，使印度成了整个英国资产阶级进行剥削的自由市场。英国工业品的输入迅速增加，而印度商品出口急剧减少，但印度的生产原料出口却大有增加。1833—1848年间，印度输往英国的原棉从3200万磅增至8800万磅；羊毛从3700磅增至370万磅。

英国殖民者最大限度地压榨印度农民，农民的土地税成为殖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殖民者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实行“莱脱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佃农要把全年收成的1/3到1/2作为土地税上缴。而在实行“柴明达尔制”的北印度和中印度，农民则要受到英殖民者和柴明达尔（即包税者）的双重剥削。1800—1801年度，土地税为420万英镑，到1857—1858年度增至1530万英镑。广大农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日益增长。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印度，而英国政府却禁止印度纺织品输入英国，摧残了印度的手工业，使成千上万的印度手工业者破产失业。闻名世界的印度纺织工业中心达卡一片萧条，人口由1827年的15万，锐减到1837年的2万。1834年，印度总督本克丁曾向伦敦报告说：“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已使印度平原白成一片了。”

原有印度雇佣军20万，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侵略工具。1849年英国统治全印度后，改变对印度雇佣兵的政策，将大批印度士兵遣散，并减少薪饷和

取消免税权，强迫他们绝对服从英国军官，强迫他们到伊斯兰国家作战，使之丧失原有种姓。因此，广大印度士兵对英国殖民者极其不满。

最初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各邦王公贵族作为殖民统治的依靠力量和支柱，对其采取了关怀和扶植的政策。在 19 世纪前 30 年中，从王公和地主土地上征税额是固定的。19 世纪上半期，各公国缴纳土地税总值比东印度公司从自己直接统治区所得税值约少 1/5，而各邦土地面积占全国一半，人口只占全国 1/3。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企图尽快消灭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直接统治印度，控制更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采取了兼并封建王公领地的政策，规定没有直系后裔的封建王公，死后其领地自行“丧失”，归东印度公司所有。有十多个邦依照此法被兼并，引起各邦王公普遍不满。

总之，到 19 世纪中叶，印度社会各阶层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领域中，而且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西方“文明”的入侵也破坏了印度古老的传统风俗习惯。殖民者企图消灭印度宗教和破坏种姓制度的一系列作法，也使印度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容忍。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搏斗开始在印度各地酝酿。

（2）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早在 1856 年，印度农村开始传递烤薄饼，据说这是反英起义的信号。走南闯北的民间艺人和教士到处进行反英宣传。印度士兵中间开始传递荷花，密谋举事。不满的王公贵族也暗中联络，商讨对策。

涂油子弹问题成为起义的导火线。1857 年初，盛传殖民当局新发的子弹涂有牛油和猪油，而士兵使用时必须用牙咬破包装纸。这是蓄意使印度士兵触犯自己的宗教禁忌。因为印度教士兵不食牛肉，而伊斯兰教士兵不食猪肉。印度士兵对殖民者的歹毒用心和卑鄙手段极为愤恨。3 月 29 日，第 34 兵团士兵曼加尔·潘迪开枪打死 3 个英国军官，被处绞刑。此事件加速了印度民族起义的爆发。

大规模的反英起义在德里附近的米鲁特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857 年 5 月—9 月的德里保卫战；1857 年 9 月—1858 年 6 月的勒克瑙和詹西保卫战；1858 年 6 月—1859 年末的游击战。

1857 年 5 月 10 日晚，驻米鲁特的第三骑兵连起义，次日攻入德里，拥立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印度皇帝，成立行政会议，作为起义领导机关。行政会议的大部分成员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它号召人民消灭英国殖民者，宣布废除柴明达尔制度。起义发展很快，迅速影响到全国一半以上地区，有 40 处士兵举事。在起义的前几个月中，起义者屡战屡胜。9 月中旬，英军发动猛烈攻势，德里终于陷落，以巴哈杜尔·沙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投降。

德里陷落后，起义中心转到勒克瑙和詹西。勒克瑙起义军民浴血抗战，多次击退英军进攻，但由于寡不敌众，1858 年 3 月下旬被迫退出勒克瑙。

接着，英军进攻詹西。在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的领导下，当地军民与英军激战 8 天，重创敌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只好退守瓜辽尔。6 月 18 日，在瓜辽尔城外的遭遇战中，詹西女王不幸阵亡。

詹西、瓜辽尔失守后，起义军采取了游击战术进行反抗。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使英军疲于奔命。最后英国殖民者采取镇压和分化收买封建王公的两手策略，一些王公同他们订立同盟，共同镇压起义。到 1859 年底，反英战争就完全结束了。

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掌握起义领导权的封建王公的投敌叛变。1858年11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颁布诏书，允诺尊重各邦王公的权利，大部分封建王公叛变投降。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是这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社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族，种姓和语言的矛盾，很难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英国殖民者的军事优势及分化瓦解政策，使起义军最终被各个击破。

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是印度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鼓舞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志和信心，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3）罗易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兰姆·莫罕·罗易（1772—1833年），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地主家庭，其父是莫卧儿王朝的大臣。罗易毕业于巴特纳高等伊斯兰教学院，在东印度公司任过职，1844年辞职后，致力于著述和社会改良活动。他幻想依靠英国殖民者的支持进行社会改革。他反对种姓制度和寡妇殉夫的习俗，主张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立法要和印度人民协商，要吸收印度人参加殖民机关。他反对中世纪的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元化宗教哲学。他于1828年创立了梵教派。

罗易逝世后，梵教派逐渐抛弃宗教形式。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在1870年创立印度改革协会。后来梵教派分裂，激进派创立了印度协会，这是印度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团体，到1878年，全国各地都设有它的分支。

在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代表还有戈文德·拉那德和达达巴伊·纳奥罗哲。他们主张非暴力主义，反对农民斗争，要求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自治和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普及欧式教育，发展民族工业。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反对中世纪的习俗、要求发展民族工业、争取民族平等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罗易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之父。但是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惧怕和排斥农民斗争，与封建地主阶级联系密切，对英国殖民者抱有幻想和依赖。因此，这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没有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和效果。

（4）国大党的成立和提拉克的民族独立思想

19世纪中后期，印度出现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纷纷建立各种组织，除了梵教会（1828年）和印度改革协会（1870年）外，还有印度协会（1875年）、雅利安人协会（1875年）。他们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社会改革的一系列主张。1883年，加尔各答的印度人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印度代表大会，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联合省都有代表参加。这表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孕育之中。这一时期，印度工人阶级也逐渐成熟起来。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沿海城市，产业工人总数已达50万人以上。他们深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较早地开始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多次举行罢工。农民的处境更悲惨。19世纪后半期，印度发生24次饥荒，死于饥谨者达2850万人。所以，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殖民者采取了高压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政策。殖民

当局坚决镇压一切反英暴乱，颁布《武器条例》，禁止人民拥有武器，取消出版自由。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竭力笼络印度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力图将资产阶级运动纳入合法的轨道。当时印度总督杜富林和老殖民官吏休谟对印度局势的严重性都有清醒的估计。休谟在备忘录中写道：“在当时和现在，我没有丝毫怀疑，我们当时确实是处于一个最可怕的极度危险之中。”

在总督杜富林的同意和支持下，休谟同印度地主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幕后多次谈判和策划，决定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了全印国民代表大会，国大党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50%，商人和高利贷者占25%，地主占25%。其中多数是印度教徒和拜火教徒，伊斯兰教徒人数甚少。大会主席是印度协会的创始人巴纳吉。

会议通过9项决议，中心议题是要求民族平等，给印度以自治，希望“用立宪和平方法”来达到目的。大会还提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加速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

国大党是个改良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一成立就表现出对宗主国的忠诚和温顺态度。大会主席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

国大党成立后不久就分裂成两派，一派为守旧派或温和派，以巴纳吉为首，掌握领导权，坚持与英国妥协合作的路线，代表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为激进派，也称极端派，领导人是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这一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

提拉克（1856—1920年），出身于马拉特族婆罗门种姓的小地主家庭，学过法律，1869年在孟买立法院供职。1880年创办《狮子报》，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印度贫穷落后的根源是英国的殖民奴役，因而坚决反对国大党温和派的妥协投降路线，主张在反殖民斗争中使用暴力。由于他的号召，孟买各地区农民在1896—1897年间的灾荒时期，拒绝向殖民者缴纳田赋。英国殖民当局于1897年借口一起刺杀英籍官吏的案件，判处提拉克18个月徒刑。

提拉克崇尚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但他不能区别民族文化的糟粕与精华，他始终佩带“再生者”的圣带，还竭力维护种姓制度，这不利于民族运动的健康发展。

提拉克的民族独立思想在印度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创办《狮子报》期间，他积极进行社会活动，揭露殖民当局的暴行，给马拉特青年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熏陶。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提拉克的影响日益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

4.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1）日本的入侵和《江华条约》

19世纪中叶，朝鲜处于封建社会。李朝封建统治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农民暴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封建统治受到严重打击。这时，在封建统治者内

部出现了以争夺土地和权力为主要目标的党派斗争。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出现了以丁若庸（1762—1836年）为代表的实学派运动。他们主张防止土地兼并，平分土地，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奖励发展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等等。这次封建改良主义运动虽然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是对人们的思想是有启蒙作用的。

正当朝鲜国内危机加深之时，欧美列强接踵而至，不断扣击朝鲜的大门。19世纪前期，英、法、美等国屡派军舰骚扰朝鲜，企图强迫朝鲜缔约通商，但都被朝鲜人民所击退。1875年5—6月，在英、美怂恿和支持下，日本以航海演习为名，出动了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在朝鲜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挑畔活动，朝鲜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而日本侵略者无视朝鲜政府的抗议，于同年9月再次出动云扬号到朝鲜西南沿海活动，并非法驶入江华海峡，海军陆战队小舰艇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炮兵击退了入侵之敌。以后日本多次出动舰只袭击江华岛、釜山等朝鲜重要军事战略基地。这次日本入侵事件称为云扬号事件。

1876年1月，日本政府以追究云扬号事件责任为由，将7艘军舰和千余人的陆战队开赴朝鲜，强迫朝鲜政府派出全权代表，按日本的要求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朝鲜政府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最后按主和派的意见，完全承认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2月在江华府签订了《朝日友好条约》，即江华条约。条约规定：朝鲜除开放釜山外，另开仁川、元山两个港口；日本有权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和暗礁，有权绘制海图；日本有权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设领事馆，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有权在朝鲜自由贸易，日货免纳关税，日币可以在朝鲜市场流通。

江华条约是个屈辱性条约，也是朝鲜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主权，使朝鲜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2）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

江华条约签订以后，人民群众不断掀起反对闵妃政权卖国求荣的斗争。这种反抗情绪也影响到士兵。1882年（壬午）6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反对闵妃集团的兵曹判书闵谦镐聘请日本军事教官、按日本方案改编军队和扣发军饷，史称壬午兵变。士兵起义迅速转化为反对闵妃集团和日本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起义者焚烧日本使馆，杀死日本人，冲进王宫，打死民愤极大的闵谦镐和几名大臣。闵妃出逃。

闵妃逃走後，大院君入宫掌权。在大院君的欺骗之下，起义暂时平息。7月闵妃引清军进汉城，大院君被捕，闵妃重新上台。

在朝鲜民族危机深重的关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开化派。1884年（甲申）12月4日，开化派借庆祝邮政局落成宴会的机会，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密谋策划发动政变。美国公使也表示支持开化派的行动。开化派依靠日本军队杀死守旧派官员闵泳翊、闵台镐等。次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宣布同清政府断绝关系，朝鲜完全独立。6日晨，新政府发表政纲。新政纲有40条，主要内容是：废除门阀，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6日下午，闵妃集团在清军援助下打败日军，重新掌权。开化派的“三日天下”结束。日本公使自焚使馆，连夜逃往仁川。开化派的主要领导人洪应植为清军杀害，金玉均逃往仁川，后亡命日本。

甲申政变是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其政纲反映了

朝鲜资产阶级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活动没有群众基础，不敢发动人民进行革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殖民者的支持上，这又从根本上违背了朝鲜的民族利益。

（3）甲午农民战争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朝鲜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特别是南部各道更为轰轰烈烈。起义农民打死恶霸地主、贪官污吏和日本商人。起义浪潮推动了东学教运动。

东学教的创始人是崔济愚。他于1860年创立东学教，提出“惩治贪官污吏”和“斥倭斥洋”口号，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者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思想。东学教逐渐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其思想也逐渐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

1893年大灾荒和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非法征收水税和杂捐，成为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1月15日，东学教地方首领全琫准领导全罗道古阜郡农民举行起义。起义者攻克古阜郡城，夺取武器库，释放囚犯，惩处贪官，开仓赈济贫民，焚烧土地文契。附近农民积极响应。3月，起义者攻占古阜郡战略要地白山，并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颁布了四条纲领：不杀人，不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4月间，起义军在黄土岬和长城黄龙江一带打了两次胜仗，起义扩大到全国各地，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全罗道、忠清道和庆尚道。4月28日攻占全州城，并准备进攻汉城。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集团惊慌失措，一方面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一面向起义军求和。全琫准犯了个大错误，接受了政府的欺骗求和，自动退出全州。政府也被迫同意签订《全州和约》12条，其主要内容是：惩办贪官污吏，平分土地，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杂税，改善贱民待遇，允许妇女改嫁等等。为了执行议和条约，起义军在全罗道53个郡建立了农民政权——执纲所。

6月6日，清军应朝鲜国王请求，在忠清道牙山登陆。日军借口清军登陆，出兵朝鲜，并于7月23日占领王宫，掳走朝鲜国王，组成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7月25日，中日战争爆发，9月清军撤出朝鲜。日军开始和朝鲜官军勾结，共同镇压起义军。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斗争的锋芒转向了日本侵略者。后来起义领导集团发生分裂，实力受到削弱。而日军不断增援，又有精良武器，10月起义军攻打忠清道首府公州，遭到惨败。到10月末起义军濒于瓦解。部分起义军在全琫准率领下向南撤退，准备再战。由于叛徒告密，全琫准途中被俘，次年3月全琫准就义。

甲午农民战争是在东学教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它是朝鲜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它以“尽灭权贵”、“逐灭夷倭”为旗帜，给朝鲜封建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揭开了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这次农民战争与越南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

5. 越南早期的反法斗争

（1）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从 17 世纪起，法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就到了越南。法国革命后，法国屡次派兵进犯越南领土，1843—1847 年对越南进行三次武装挑衅。1861 年法国占领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次年又与阮氏王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开始控制越南的内政和外交。条约规定割让嘉定、边和、定祥和昆仑岛给法国，开放土伦、巴叻、广安三港为商埠，允许法国商船和军舰在湄公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法国商人可以在越南自由贸易，向法、西两国赔款 400 万披阿斯特。条约还规定，越南必须通过法国才能与其他国家办理交涉。这个奴役性条约，标志着越南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4 年法国和越南订立《巴特诺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之后，清朝政府正式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法国确立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之后，开始对越南进行经济掠夺，主要是掠夺土地。1890 年法国殖民者强占了 10900 公顷土地，对越南农民采取封建高利贷的剥削方式，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实行烟酒鸦片专卖制度。东方汇理银行发放高利贷资本，控制越南的全部经济命脉。法国殖民者还垄断越南对外贸易、倾销商品和廉价强购大米等，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剥削。

（2）勤王运动

1885—1896 年兴起“文绅”领导的忠君爱国抗法武装斗争，史称“勤王运动”或“文绅运动”。法国入侵后，越南封建统治者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阮氏王朝投降后，少数主战派仍坚持斗争。1885 年 7 月，大吏尊室说在顺化组织反法起义失败后，推动咸宜帝（阮福明）发出勤王檄文。勤王的涵义是尽力于王事。中圻和北圻各省的爱国官吏和文绅积极响应，纷纷兴起“勤王之师”，以农民为主力，奋力武装抗法，给法国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其中潘廷逢领导的起义爆发最早，一直坚持到 1896 年。

（3）安世农民游击战争

最使法国殖民者胆颤心寒的是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花探（约 1857—1913 年）领导的安世地区农民起义。1887 年，黄花探在北圻山林区安世（河内以北，谅山以西）建立根据地，进行抗法游击战争。1892 年法军大举进攻安世地区，许多勤王运动领袖临阵退缩叛逃，唯有黄花探坚持抗战，成为安世地区起义军的唯一领袖。1894 年，黄花探的起义军更加活跃，经常伏击法军，给法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同年 9 月，擒获了法国大地主、《北圻的将来报》主编色斯耐，迫使法军同黄花探讲和。10 月法国殖民者与黄花探签订停战协定，法国撤出安世地区，雅南、牧山、安礼和友尚四个地区划归黄花探管辖。

在停战的烟幕下，法国殖民军加紧增修碉堡，加强包围圈，准备条件成熟后攻打起义军。1895 年 11 月，法国殖民者撕毁协定，调集海陆军进攻黄花探起义军，妄图速战速决，结果被起义军的游击战所挫败。1897 年，法国被迫签订第二次停战协定。1909 年 1 月，法国殖民军再次向安世地区反扑。法军使用了分割、围困和孤立起义军的种种方法。在 10 月 5 日的郎山战役中，起义军损失惨重。此后三年，黄花探一直处于法军的追剿之中。1913 年 2 月，黄花探被奸细杀害。

黄花探坚持抗法斗争近 30 年，最后以身殉国。他领导的安世农民游击战争，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正确的政治纲领，不能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最后遭到失败。

6. 菲律宾 1896—1898 年资产阶级革命

(1) 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

菲律宾是东南亚的一个群岛之国。从 1565 年起，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了封建神权统治，菲律宾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封建制度，而且西班牙的封建庄园制度也移到了菲律宾。庄园大部分属于王室，其余为西班牙军政官员和天主教修道会所拥有。修道会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掌握了政治、经济、财政、贸易、司法、行政和文教大权，故有“修道会帝国”之称。政教合一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重要特征。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长期实行贸易垄断政策，严禁自由贸易，使菲律宾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19 世纪初，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西班牙不得不放弃垄断政策，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开放菲律宾。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菲律宾进一步走向世界市场，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2) 何塞·黎萨和菲律宾联盟

19 世纪 60—70 年代，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并拥有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的代言人。1872 年以后，一批知识分子掀起了“宣传运动”，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何塞·黎萨（1861—1896 年）写的两部政治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很有影响。小说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西班牙在菲律宾推行的各项殖民政策。1889 年 2 月，哈埃纳、比拉尔和黎萨等人在西班牙创办《团结报》，宣传的内容有：要求把菲律宾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在国会中菲律宾应该拥有代表权；揭露和抨击天主教修道会，要求实现教会世俗化或菲律宾化，驱逐西班牙修道士；揭露西班牙当局的暴政，宣扬菲律宾的民族自豪感；要求出版、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等。《团结报》对唤醒菲律宾人的民族意识起了一定作用。由于资金和内部矛盾，《团结报》于 1895 年 11 月停刊。

1892 年 7 月，黎萨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其成员大多数是民族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宗旨是：通过合法途径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使整个群岛形成一个紧密、强大的共同体。为此，他们主张研究和实行改革，鼓励发展教育、农业和商业。这个温和的改良组织也为西班牙殖民者所不容。联盟成立几天之后，黎萨即被逮捕和流放。到 1894 年初，由于联盟内部的分歧和害怕西班牙当局的迫害，联盟自动解散。1896 年年末，黎萨被处死刑。

菲律宾改良主义运动的失败充分反映了菲律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西班牙万岁！打倒修道士！”这两个典型口号最能体现菲律宾资产阶级的本质。改良运动的领导人不敢领导群众斗争，脱离群众，因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它在唤起民族觉悟和推动民族运动发展方面还是有历史功绩的。

(3) 1896—1899 年反西班牙统治的斗争

1892 年 7 月，安德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 年）创立秘密团体“最崇高的、最受尊敬的菲律宾儿女协会”，简称卡蒂普南。该组织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民族独立。他们出版《自由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的“人人平等和反抗西班牙压迫”的口号吸引了广大群众，其组织发展很快，后来成为菲律宾独立战争的主力军。

1896年8月24日，波尼法秀在巴林塔瓦克发动武装起义，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而斗争。成千上万的卡蒂普南成员和群众响应号召，参加战斗，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西班牙殖民当局疯狂反扑，数以千计的群众被杀害，许多资产阶级温和派人士被逮捕，财产被没收。殖民者的恐怖政策激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和反抗，一些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人士也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在起义高潮中，以阿奎那多（1869—1964年）为首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解散卡蒂普南，自任新政府总统，并杀害了波尼法秀。阿奎那多的分裂活动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致使起义军节节败退。1897年11月，阿奎那多公然叛变革命，与西班牙当局签订《比阿克纳巴多条约》。按条约规定，阿奎那多率部投降，解散新政府，流亡香港。西班牙当局假意许诺在菲律宾实行“改革”，并赠送阿奎那多80万比索，作为交换条件。

（4）菲律宾共和国的成立和美国的武装干涉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企图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美国诡称“帮助”菲律宾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劝诱流亡在香港的阿奎那多与美军合作。阿奎那多信以为真。按照美方的安排，1898年6月，阿奎那多乘美国军舰返回菲律宾。菲律宾人民利用美西战争的有利时机，解放了除马尼拉及南部少数地区以外的大片领土，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指日可待。但是以阿奎那多为首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再次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于1898年6月12日在卡维特（甲米地）宣布菲律宾独立。同年9月，在首都马洛洛斯召开国会。1899年1月，正式通过宪法，成立菲律宾共和国，阿奎那多为总统。

美国与阿奎那多的“合作”是美国与西班牙争夺的需要。当美国大批援军抵达菲律宾时，美国再也不需要他的合作。1898年8月，美国强占马尼拉，逼迫菲律宾革命军撤走。同年12月10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遭到菲律宾政府的抗议。1899年2月，美国悍然发动美菲战争。一批民族资产阶级激进派坚持与美国血战到底，保卫民族独立。阿奎那多屈服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压力，实行投降主义路线，于1899年5月迫使马比尼抗战内阁辞职，6月杀害坚决主张抗美到底的鲁纳将军，严重削弱了抗美力量。11月，美军击溃菲律宾正规军，抗美战争转为游击战争。1901年3月，阿奎那多被俘，迅即宣誓效忠美国，号召人民停止抵抗。1902年7月，美国宣布美菲战争结束。

菲律宾独立战争是一次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兴的美帝国主义采用欺骗手段，伪装“朋友”，使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与之合作，最后背信弃义地绞杀菲律宾革命，使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菲律宾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最早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菲律宾人民同西班牙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震撼了亚洲。孙中山先生盛赞菲律宾人民的革命精神，他说：“菲律宾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它，尚且坚持数岁”。他打算率兴中会会员直接支援菲律宾革命，还曾帮助菲律宾革命军购买两船军火，只可惜未能运到菲律宾。

7. 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斗争

（1）阿富汗历史

15世纪前，阿富汗是欧洲、中东对印度和远东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

15 世纪末，欧洲通往印度的海路开通后，阿富汗变得闭塞了。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阿富汗完成了从氏族公社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并打退了伊朗和莫卧儿帝国的入侵。1747 年，阿布达里族世袭酋长阿赫美德在坎大哈宣布自己为阿富汗国王。在他统治期间，收复了伽色尼、喀布尔等地；同时向外扩张，东至旁遮普，南占信德和俾路支，西至里海，北包巴尔克。1761 年打败马拉特人，初步奠定了阿富汗封建统一国家的基础。

阿赫美德去世后，阿富汗分裂为许多独立的酋长国，其中巴拉克塞伊族势力最为强大，控制了喀布尔、伽色尼和扎拉拉巴德。1826 年，巴拉克塞伊的酋长道斯特·穆罕默德自称埃米尔，开始了巴拉克塞伊王朝在阿富汗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国家疯狂争夺殖民地的年代里，阿富汗成为英俄两国争夺的对象。阿富汗人民展开了反对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

（2）第一次抗英战争

1837 年 10 月至 1838 年 8 月，伊朗围攻赫拉特，英国以武力威胁伊朗撤兵，并要求同阿富汗缔结反伊朗和俄国的同盟。但当阿富汗提出收复被侵占的领土时，遭到英国拒绝。阿富汗转向俄国求援，于 1837 年 12 月接待了俄国特使。英国便以此为借口，1838 年秋发动了第一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1839 年 8 月 7 日，喀布尔沦陷；9 月，道斯特·穆罕默德投降。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1841 年 11 月 2 日夜，喀布尔爆发起义，许多英国军官被打死，喀布尔被夺回。道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尔汗坚定地领导起义群众进行抗英斗争，多次拒绝敌人的收买。英国侵略者被迫从阿富汗撤军。1842 年 1 月 6 日，英军仓皇出逃。不久，英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三个月后终于逃遁。阿富汗第一次抗英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3）第二次抗英战争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英国又加紧对阿富汗的侵略。1878 年 7 月，舍尔·阿里汗接见了俄国使团，而拒绝英使进入阿富汗境内。英国又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阿战争。1878 年 11 月，英军占领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舍尔·阿里汗进行了抵抗，后逃往北方，1879 年初死去。他的儿子亚古柏汗放弃抵抗，于同年 5 月在甘达马克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外交方面受制于英印政府。

这个条约激起举国愤怒。9 月，喀布尔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要求亚古柏汗对英宣战。英国再次调兵到喀布尔，亚古柏汗投降，而阿富汗人民的斗志不衰。12 月，6 万多起义军收复首都，把英军围困在几个据点中。舍尔·阿里汗的次子阿尤布汗在赫拉特也举兵起义。在俄国的支持下，1880 年初，舍尔·阿里汗的侄子阿布杜拉曼从中亚回到阿富汗北部，征集军队，挺进喀布尔。但是他害怕人民的力量，很快趋于动摇。处于困境的英军，急于寻求缓兵之计。结果英国承认阿布杜拉曼为喀布尔统治者；阿布杜拉曼承认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重要条款。

阿尤布汗则坚持和英国作战，决心把英军驱逐出坎大哈。后来英军虽打败阿尤布汗，但不敢滞留坎大哈，撤回印度。1881 年秋，阿布杜拉曼将赫拉特和坎大哈统一在他的管辖下。

第二次侵阿战争失败后，英国千方百计加强对阿富汗的经济渗透和财政控制，并开始蚕食阿富汗边境的独立部落，边区人民一直没有停止争取独立的斗争。

阿富汗人民两次抗英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吞并阿富汗的妄想。但是统治者的妥协投降，使英国殖民者得以利用条约控制了阿富汗的对外关系。

8. 缅甸的抗英斗争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16、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侵入缅甸，进行掠夺性贸易和海盗抢劫。此后，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都力图在缅甸建立贸易据点，争夺贸易垄断权。他们一方面互相排挤，另一方面又干涉缅甸内政，插手缅甸的民族纠纷。18世纪中叶，缅甸人民在雍籍牙领导下，反抗孟族人的统治，建立新王朝，逐步统一缅甸。

（1）缅甸人民抵抗英国侵略的斗争

1759年，雍籍牙下令取消英国商站，将英国殖民者全部驱逐出境。但是，英国殖民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1785年缅甸和阿拉干王国合并后，英国竭力煽动阿拉干封建上层分子脱离缅甸和在边境制造纠纷，挑动内战，破坏缅甸的统一。缅甸为了自卫，于1813年和1822年先后合并曼尼坡和阿萨姆。英国殖民者遂借此发动第一次侵缅战争（1824—1826年）。

1824年3月，英国在镇压了印度马拉特人起义后，对缅甸正式宣战，缅甸军队英勇抵抗。英军在仰光集结优势兵力，先后占领南部各城市，最后缅甸军被打败。1826年2月，英国迫使缅甸签订和约，缅甸割让阿萨姆、曼尼坡、阿拉干和典那沙冷等地，并赔款1千万卢比，准许英国派遣外交常驻代表，英国船舰可以在缅甸港口自由通行。同年11月，英国又迫使缅甸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

1837年，缅甸国王孟坑宣布不承认上述条约，并拒绝接受英国的使节。1852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戴贺胥借口缅甸官府逮捕两名违法英国商人的事件，出动军舰封锁仰光，向缅甸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赔款道歉，接着不宣而战，英国蓄谋已久的第二次侵缅战争开始。战事持续了一年左右，未经签约，英国就单方面宣布把勃固省并入英印帝国，并强行分割缅甸的大片国土。1862年，英国将阿拉干、勃固和典那沙冷合并，称英属缅甸，以仰光为首府，归英印总督统辖。

第二次英缅战争以后，缅甸国王曼同决心加强国力，准备同英国对抗。他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发展经济和加强军事的措施，如奖励兴办工业和开垦土地，建立兵工厂和内河舰队等。曼同死后，新王锡袍继续曼同的抗英政策。为了遏制英国的侵略阴谋，缅甸同法国接近起来。1885年5月，缅甸和法国签订协定，准许法国修建从曼德勒到东吁的铁路线，开设法缅银行。英国极为不满，多方制造借口进行挑衅。

（2）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

1885年10月19日，英国借口缅甸政府处罚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在上缅甸偷运柚木事件，发出最后通牒，要挟缅甸同意英国在曼德勒派驻官长，并可随时进见国王；孟买缅甸贸易公司争执立即转英印总督裁决；缅甸外交由英国监督等。锡袍坚决拒绝这些要求。同年11月，英国侵略军占领曼德勒，俘虏国王。1886年1月1日，英国正式宣布吞并缅甸。

英国吞并缅甸后，解散缅甸军队，不许缅甸人持有武器，采取“以印治缅”的手法，把缅甸变成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归英印总督管辖，并雇佣印度

兵镇压缅甸人民的反抗，还利用印度人大量掠夺缅甸资源，剥削缅甸人民。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严重破坏了缅甸的社会经济发展。

9. 土耳其 1876 年立宪运动

土耳其曾以奥斯曼帝国在 15、16 世纪称雄世界，版图扩及欧、亚、非三大洲，但从 16 世纪末开始走向衰落。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到 19 世纪中后期，土耳其逐渐沦为英、法等国的半殖民地。

(1) 土耳其沦为英法殖民地

在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属于英法集团，属胜利者一方。因此，战后土耳其表面上维持了帝国的完整和独立。实际上这并没有缓和土耳其帝国的危机。

英法为加强对土耳其的掠夺，在 1856 年就迫使土耳其苏丹再次颁布敕令，并以此作为参加巴黎和会的条件。这个敕令完全是按照英法的意图起草的。敕令的重要内容是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在土耳其占有不动产。敕令还提出，要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开辟运河、发展商务，要尽量利用欧洲科学、技术和资本等等。这表明土耳其已全面向欧洲资本敞开了大门，并丧失了主权。

1856 年创办的奥斯曼银行，分行遍及全国，垄断了土耳其贸易，并享有免税权和货币发行权。这家银行先由英国投资，后来法国资本也挤了进来。结果，土耳其的外债直线上升。1854 年负债 7500 万法郎；1870 年增至 25 亿法郎；1875 年 53 亿法郎。

外国资本家利用在土耳其修筑铁路的特权，修建了伊兹米尔—爱丁线，伊兹米尔—喀萨巴线和伊斯坦布尔—埃德尔奈线。这些铁路线主要是为外国商业和欧洲列强的战略目的服务的，它便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同时，对土耳其方面来说，承租铁路的条件极还苛刻。土耳其完全成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2) 凯末尔和新奥斯曼党

在土耳其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土耳其的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有所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俗学校的建立，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那米克·凯末尔。这批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对腐朽的苏丹专制政体日益不满。

1865 年 6 月，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创立秘密组织——新奥斯曼党，成员大多是作家、新闻记者、商人、军官和学生。他们曾密谋在 1866 年强迫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颁布宪法。但由于泄密，一部分新奥斯曼党人被捕，一部分逃往国外。凯末尔逃到国外后继续倡导立宪。

(3) 1876 年政变和立宪运动

70 年代的国际形势对土耳其极为不利。普法战争之后，“东方问题”又尖锐起来。土耳其成为俄、英、德、奥角逐的舞台，并面临着被重新瓜分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新奥斯曼党人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于 1876 年初发表宣言，批评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和首相马赫穆德·涅基姆的政策，指责他们是土耳其一切祸患的根源。5 月 22 日，新奥斯曼党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在群众的压力下，苏丹不得不罢免首相涅基姆，重新组织政府，其成员包括新奥斯曼党领导人米德哈特。但群众斗争并未就

此止息。5月30日，新奥斯曼党人又发动宫廷政变，废除了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由其弟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继承王位，并发表了立宪誓约，委任米德哈特为总理大臣。

米德哈特组织制定了1876年宪法，并于12月23日正式公布。宪法规定在土耳其建立两院制国会，帝国公民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和宪法上规定的一切自由。但还规定苏丹有权干涉国会。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这部宪法也称米德哈特宪法。该宪法并没有长久实施。1877年—1878年的俄土战争及土耳其的失败，给苏丹哈密德二世复辟提供了机会。他把战败归罪于宪法，在俄土战争初期就宣布解散国会，停止实施宪法，并将新奥斯曼党人米德哈特等逮捕流放，最后暗杀了米德哈特。凯末尔被放逐到帝国边远的地方。立宪运动宣告失败。

新奥斯曼党人的立宪运动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反对苏丹专制制度的斗争，对推动土耳其的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一运动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和市民，主要依靠官吏、军官、知识分子和学生，是有极大局限性的。这一斗争也没有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对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因而是不能成功的。

十二、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

1. 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

(1) 英法对埃及的侵略和控制

19世纪中期，英法竞相对埃及加紧侵略。英国取得了在埃及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及建立船队等特权；法国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利。1876年组建的埃及债务整理委员会，英国代表出任财政收入总监督，法国出任财政支出总监督。1878年，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埃及总督伊斯迈尔任用欧洲人组阁。这个“欧洲人内阁”雇佣了1300多名欧籍职员，并给予优厚待遇，埃及职员受到排挤。政府对农民横征暴敛，甚至预征两年的赋税，并强制农民以土地为抵押；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也进行限制和排挤，严重损害了埃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欧洲人内阁”的强暴政治引起埃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抗。

(2) 祖国党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

在反政府的斗争中，1879年1月，知识分子和爱国军官成立了祖国党，其领袖是陆军中校阿赫美德·阿拉比。祖国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口号，主张维护埃及主权和实行宪法，并出版了刊物《埃及是埃及人的》，宣传其政治主张。1881年9月，祖国党人在阿拉比领导下，指挥军队进攻总督府，要求解散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新任总督杜菲格被迫同意了祖国党的要求，由大部分祖国党成员组成了新内阁，阿拉比出任陆军部长，结束了英法两国的直接控制。新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英法企图收买阿拉比，遭到拒绝。

为了恢复对埃及的控制，1882年5月，英法派遣舰队驶入亚历山大港，无理要求苏丹杜菲格撤换内阁，放逐阿拉比。杜菲格完全答应了英法的要求。但开罗和亚历山大人民坚决支持政府，不能容忍英法的侵略行径，立即举行起义，要求废黜苏丹。杜菲格为逃避人民的惩罚，躲到了英国的军舰里。

阿拉比预见到外国入侵的危险，下令修筑亚历山大炮台。英国政府侵占埃及的决心已定，1882年7月10日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埃及在24小时之内停止修筑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事。在遭到拒绝后，7月11日，英国舰队炮轰亚历山大港，当天亚历山大城失守。阿拉比积极部署开罗保卫战，埃及人民积极支持，参军参战，捐款捐粮。埃及军民多次击退了英军的进攻，使英军无法在北线逼近开罗。但阿拉比轻信其他列强关于苏伊士运河区中立的保证，对东线毫无防备。英军在北线不能得逞，便从东线向开罗推进，经过几次激战，终于在9月15日攻下开罗。阿拉比被俘，流放到现在的斯里兰卡。阿拉比领导的抗英运动遭到失败。

英国占领埃及后，虑及埃及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为了避免法国的插手和干涉，没有立即宣布埃及为自己的保护国，埃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埃继林·贝林实际掌握了埃及的政权。1914年，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

2. 苏丹人民的反英大起义

(1) 埃及和英国对苏丹的统治

苏丹位于非洲的东北部，北与埃及相邻。1819—1822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占领了苏丹，苏丹名义上是土耳其的一个行省，实际上由埃及统治。70年代以后，英国利用其在埃及的债权国地位，逐渐取代了埃及在苏丹的统治地位。英国殖民者和苏丹当地的封建贵族、部落首长互相勾结，巧立名目，共同对苏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举国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摆脱剥削、奴役和压迫，苏丹人民进行了顽强的反抗斗争。

（2）马赫迪起义

80年代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马赫迪起义。起义的领导人马赫迪，原名穆罕默德·阿赫迈德（1844—1885年），出生于一个造船工人家庭，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深知人民的疾苦，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僧人。1871年他定居于阿巴岛，从事传教活动、宣传他的主张，谴责富人、官吏和外国侵略者的贪婪、不义和残暴，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881年8月，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宣布要在世上重建真正的宗教和正义，号召人民起来跟邪恶势力作斗争，进行“圣战”。他散发了许多宣言和信，宣传他的驱逐叛教者、异教徒（暗指土耳其人和其他外国人），建立“普遍平等、处处有公正的美好社会”的主张。他还提出了“宁拼千条命，不缴一文税”的口号。

苏丹总督威逼马赫迪放弃他的口号和停止“叛逆”行动，遭到拒绝后派兵捉拿马赫迪。马赫迪早有准备，在阿巴岛一举歼灭前来捉拿他的官兵126人。阿巴岛的战斗同时宣告苏丹人民反英武装起义的开始。

广大人民积极响应马赫迪的号召，加入了起义队伍。1881年12月和1882年6月，起义军两次重创英军。1883年1月9日，起义军攻下科尔多凡省省会乌拜伊德，宣布人人平等，烧毁了一切卖身契。11月5日，希克斯率领的一万英国远征军全军覆没，希克斯本人也被打死。这一败绩震动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决定重新启用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老奸巨滑的殖民主义分子戈登为苏丹总督。1884年2月，戈登到达苏丹首都喀土穆。

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戈登于2月13日宣布苏丹脱离埃及而“独立”，并建立一个代行临时政府职权的委员会。戈登以苏丹总督和英国政府官员的身份主持工作。戈登大耍两面派手段，写信给马赫迪，许诺任命马赫迪为科尔多凡省省长，随信带去一份委任状和一套华贵的服装。马赫迪不为其诱惑所动心，义正辞严地回信说：“我是众所期待的、当之无愧的马赫迪，……我无须你的委派。…向我们投降，你才有出路。”他也派人捎去一套服装——起义者的服装，命令戈登向起义军投降。

1884年3月，马赫迪解放喀土穆以北地区，1885年1月，攻克恩图曼和喀土穆这两个重要城市，全歼敌军，击毙戈登。同年夏天，苏丹几乎完全获得了解放。经过5年的浴血奋战，苏丹人民终于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不幸的是，马赫迪于1885年6月病逝。他的战友阿卜杜拉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定都恩图曼，史称“马赫迪国”。阿卜杜拉成为国家元首，改称“哈里发”。

马赫迪在领导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注意发展生产，加强武装力量，但是没有进行社会经济改革。阿卜杜拉主政后，为保障民族独立，抵抗外国侵略，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措施。政治措施主要是：把全国划分为20个省，各省首脑称大埃米尔，兼管军事和民政。省下设区，由埃米尔管辖。阿卜杜拉哈里发为国家最高首脑，掌管全国军事、行政和宗教大权。全国实行统一的法令。阿卜杜拉和地方首领占据了大片土地，形成了

新的封建统治集团，对农牧民的剥削仍很严重，阶级矛盾仍很尖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外防御力量。

英国不甘心在苏丹的失败，多次唆使埃塞俄比亚进攻苏丹。90年代后期，英法争夺苏丹南部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了抢先占领苏丹，英国殖民者再度入侵。1896年，25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大举进犯苏丹，阿卜杜拉率部英勇抵抗。1898年9月，恩图曼一役，苏丹军严重受挫，恩图曼陷落。英军从坟墓里掘出马赫迪的尸体加以焚烧。1899年11月，阿卜杜拉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苏丹人民的反帝反殖运动终于被英帝国主义所绞杀。

1899年1月，英埃签订了《共管苏丹协定》，在“共管”的名义下，苏丹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马赫迪起义是非洲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殖反帝武装斗争，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并影响了英属东非和乌干达等地区的斗争。这一斗争使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推迟了一段时间。

3. 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

（1）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角的高原地带，它是长期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闭塞一隅。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埃塞俄比亚濒临红海的地理位置日益显示出战略价值，成为英、德、意等国争夺的目标。在三国的争夺中，意大利逐渐取得了有利地位。当时英国忙于侵略埃及和苏丹，法国致力于夺取刚果，他们都无暇顾及埃塞俄比亚。而英国为了防止意大利向尼罗河盆地扩张，也希望把意大利的注意力引向埃塞俄比亚。

1882—1885年间，意大利占领了埃塞俄比亚的厄特里亚省。以后，意大利侵略军屡次向内地推进，均未奏效。意大利无法在军事方面获得进展，采取了支持埃塞俄比亚南方绍阿邦王公麦纳利克夺取皇位的方式，以达到其侵略目的。1889年，埃塞俄比亚国王约翰四世在英国唆使下攻打苏丹马赫迪起义军阵亡，意大利趁机支持麦纳利克夺取了王位。5月，意大利强迫麦纳利克签订了《乌西阿利条约》。条约规定，埃塞俄比亚北部包括阿斯乌拉在内的一些地区割让给意大利，意大利提供一些枪炮给埃塞俄比亚作为补偿。接着，意大利又玩弄篡改条约条文的恶劣手段妄图达到吞并埃塞俄比亚的目的。条约第17条按阿姆哈腊文本，原文是：“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在与其他列强或政府进行交涉时，可以请求意大利国王陛下政府给予协助”；但意大利文本却把“可以请求”改为“必须请求”。根据篡改的意大利文本，意政府声称埃塞俄比亚已接受意大利的“保护”。

（2）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卫国战争

意大利政府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麦纳利克宣布这个条约作废。1891年4月，麦纳利克又向欧洲列强发出通告信，坚决表示不能对列强瓜分非洲的行动熟视无睹。法国为了占领苏丹南部地区，表示支持埃塞俄比亚。

1893年2月，麦纳利克正式发表声明，决定从1894年5月起废止乌西阿利条约，并着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7月，意大利发动了侵埃战争，首先攻打提格雷省。埃塞俄比亚人民奋起保卫祖国。1895年3月，意军攻占了阿迪乌格里和阿迪格腊特。9月17日，麦纳利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痛斥

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广大人民踊跃响应，很快组成一支 8 万多人的军队。12 月 7 日，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安巴—阿拉古战役中告捷，打败两股意军。1896 年 1 月，马卡累要塞意军向埃军投降。3 月，在阿杜瓦决战中，意军惨败。此后，意大利侵略者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同埃塞俄比亚签订和约。10 月，双方在亚的斯亚贝巴正式签订和约。意大利被迫承认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赔款 1 千万里拉，放弃侵占的提格雷地区。

在非洲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时期，埃塞俄比亚是唯一的以胜利的民族战争打败外国侵略、保持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它为非洲人民树立了英勇斗争的榜样，在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

16 世纪中叶以后，阿尔及利亚名义上属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是独立国家。法国早就觊觎这个素有北非“谷仓”之称的国家。1830 年 6 月 13 日，法国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武装进攻。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反击，阿布德尔·喀德尔（1808—1883 年）领导了西部山区和沙漠地带各部落的抗法斗争，多次击败法军，迫使法国在 1834 年和 1837 年两次与喀德尔缔约，承认喀德尔在西部地区建立的“埃米尔”国。1839 年以后，法国集中兵力进攻“埃米尔”国，1841 年占领了起义者的都城马斯卡腊。1847 年，喀德尔在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一次战斗中失败被俘。这次抗法斗争告一段落。喀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规模大，战斗激烈，持续时间长。恩格斯称赞喀德尔是“孜孜不倦和大胆无畏的领袖”。

1871 年春，阿尔及利亚再次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卡比利亚山区的 30 个卡尔比部落，在封建贵族莫卡拉尼的领导下首先举行民族大起义。不久，一宗教首领哈达德发动起义，两支队伍兵合一处，达 15 万人之多，夺回了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土地，一度把法军从东部地区赶走。5 月，莫卡拉尼在一次战斗中阵亡；7 月哈达德被俘。起义遭到重大损失，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没有停止斗争，全国从北到南燃遍了起义烈火。到 1872 年初，这次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1900—1905 年，法军占领撒哈拉地区后，阿尔及利亚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

5. 突尼斯人民的抗法斗争

1881 年 4 月底，法国海军占领了突尼斯的宾泽特港，陆军侵入突尼斯城。5 月 12 日，法军包围突尼斯近郊巴尔杜的别伊王宫，强迫别伊穆罕默德·萨多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保护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法军对突尼斯实行占领，突尼斯的内政、外交均受法国监督，法国还在突尼斯享有投资特权。

突尼斯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屈辱性条约，以斯法克斯城为中心，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法斗争。法国殖民者强迫突尼斯政府派兵镇压，但官兵一到斯法克斯城，就倒向起义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者顽强坚持斗争，7 月 14 日斯法克斯城陷落。

1883 年 7 月，法国又强迫突尼斯别伊签订新条约，突尼斯正式接受法国的“保护”，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别伊仍为国家元首，但实权操在法国任命

的总监手中，法国官员充斥突尼斯政府各个部门。法国确立了在突尼斯的保护制度以后，对突尼斯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突尼斯人民的抗法斗争缺乏统一的领导，力量也比较分散。到 1881 年底，北部和中部的起义被镇压。南部的起义坚持到 1883 年。突尼斯人民的抗法斗争得到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和埃及人民的支持。突尼斯人民并不甘心屈服于法国的统治和奴役，到 20 世纪初，又掀起了新的民族解放运动。

6. 中部非洲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殖民国家在西非的扩张和西非人民的抵抗斗争

西非曾是欧美奴隶贩子瞩目和出入的主要地区。奴隶贸易后期，英、法、美等国开始了在西非沿岸的殖民掠夺。19 世纪中叶，美国侵占了利比亚；英国开始侵占塞拉利昂、加纳、尼日利亚；法国开始侵占塞内加尔和马里。殖民者的入侵，遭到了西非人民的顽强抵抗。其中居住在黄金海岸一带的阿散蒂人的抗英斗争影响最大。

阿散蒂人于 17 世纪组成了几内亚湾最大的国家，定都库马西。18 世纪初，其领土已扩展到海岸地带，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但是英国的入侵中断了它的发展过程。19 世纪初，英国殖民者逐渐在沿岸地区扩张，侵占阿散蒂人的领土。阿散蒂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和自由，1805—1900 年间与英国进行了 8 次战争。1824 年，新任总督麦卡锡亲自率领殖民军进犯阿散蒂，在邦加索战役中英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麦卡锡毙命。1853 年和 1863 年，英国又两次进攻阿散蒂人，均遭失败。

1872 年，荷兰将埃尔米纳等堡垒让给英国，从此英国独占了黄金海岸，英殖民者与阿散蒂国的矛盾更加尖锐。1873 年春，英国调集重兵，向阿散蒂人大举进攻。阿散蒂军在出击中不幸染上痢疾和天花，兵员大损，被迫退守首都库马西。1874 年 3 月 14 日，阿散蒂被迫与英殖民者签订和约，同意赔款 5 万盎司黄金，并放弃沿海地带的主权。

阿散蒂人并没有屈服和停止斗争。1890 年 12 月，英国提出对阿散蒂国实行“保护”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但英国仍不断制造借口进行挑衅。1896 年 1 月，英殖民军占领了库马西，俘虏了阿散蒂国王及其家族，悍然宣布阿散蒂为英国的“保护国”。阿散蒂人把象征主权和民族团结的金凳子藏起来，表示决不向英国屈服。1900 年，英国驻黄金海岸总督逼迫阿散蒂酋长交出金凳子。阿散蒂人忍无可忍，立即起义，掀起了第八次抗英斗争。经过 9 个月的战斗，英国援军打败了阿散蒂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交出金凳子。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领袖被监禁和流放。1902 年 1 月，阿散蒂被英国正式吞并。

阿散蒂人民近百年不屈不挠的抗英斗争，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殖民国家对刚果的争夺和 1884—1885 年柏林会议

殖民国家对中非的瓜分是在“探险”和“科学考察”的旗号下进行的，比利时充当了先锋。1876 年 9 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布鲁塞尔召开有比、德、奥匈、英、法、意参加的国际地理学会，会议决定成立“考察与开化中非国际协会”，并在各国成立分会。比利时的委员会后来改称“国际刚果协会”，受利奥波德直接指挥。协会派遣“探险家”斯坦利前往刚果活

动。1879—1884 年间，斯坦利在刚果为比利时建立 22 个商站，强迫刚果酋长签订 450 多个条约。

法国较早占领加蓬。1875—1879 年，法国派遣布拉扎从加蓬到内地活动，为占领西北刚果（后改称法属赤道非洲）作准备，法国与比利时发生冲突。占据安哥拉的葡萄牙对斯坦利的活动也提出抗议，英国则完全支持葡萄牙。英国承认葡萄牙对刚果河口的“主权”，但英葡享有同等的权利。由于英法矛盾尖锐，法国则向“协会”倾斜，德国也反对英国，支持协会。各殖民国家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决定自己对其他国家所应采取的对策。各国在刚果的争夺最后通过柏林会议得到解决。

1884—1885 年，在德国俾斯麦主持下召开柏林会议。这是一次瓜分刚果的会议，有 14 个国家出席。各国都承认了比利时在刚果的主权，利奥波德分别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协定。会后不久，利奥波德宣布刚果为“独立自主”的“刚果自由邦”，他本人为元首。

柏林会议承认：刚果盆地贸易自由和刚果河及尼日尔河的航行自由；禁止贩卖奴隶；任何国家以后在非洲取得领地必须通知其他国家。这次会议成为殖民国家疯狂争夺非洲的新起点。

（3）利奥波德在刚果的统治

利奥波德在刚果推行所谓利奥波德制度。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夺取当地居民土地，通过大公司租让制和强迫劳动，掠夺刚果的财富。他打算拥有一个面积达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它将比比利时大 70 倍。这一野蛮掠夺计划遭到了进步舆论的谴责。各国借口利奥波德的措施违反柏林会议的决议，进行干预，坚持要求进行“改革”。被排斥的比利时资本家也要求把刚果交归政府管理。利奥波德不得不放弃他个人对刚果的统治。但是在他结束个人统治之前，把大量土地租给了美、英、法、比资本家所组成的 4 家大公司。

1908 年，刚果自由邦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改称比属刚果，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刚果的殖民地位。

法属刚果也推行了利奥波德制度，殖民当局大量出租土地，把境内 2/3 土地租给了 40 个公司，公司强迫居民劳动。

（4）殖民主义者对东非的瓜分

1884 年以前，东非还是一片独立的土地。但是，英国同桑给巴尔签有“条约”，以禁止奴隶贩卖和帮助训练新军的名义，取得某些特权。进入 80 年代以后，德国开始在东非积极活动，妄图在赤道南北建立一个连接东西非洲的广大殖民地。1884 年，德国殖民主义者卡尔·皮德斯潜入东非，第二年便建立了德国东非公司，把罗符马河和乌姆巴河之间的大片土地据为德国“保护”之下，又把维都地区划归德国势力范围。

英、法不能容忍德国独占东非，三国之间矛盾很尖锐。英国指使桑给巴尔向德国抗议，并以英国东非公司的名义和当地酋长订约，建立商站。法国殖民者也加紧在东非的活动。为了协调三国之间的利益，1886 年三国达成瓜分协议，将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以及大陆沿海从罗符马河以北 1000 哩长、10 哩宽的地带，划给桑给巴尔苏丹；这一地带的南北两部分划为德、英两国势力范围，即后来的德属东非（今坦噶尼喀）和英属东非（今肯尼亚）。法国则获得在马达加斯加“自由行动”的权利。

英、德两国为了调整在东非的关系，1890 年再次签署协定：英国将北海的黑里果兰岛让给德国，德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和乌干达的保护权，德国

放弃维都。1894年，英国把乌干达变为保护国。至此，赤道东非被瓜分完毕。

7. 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的反侵略斗争

(1) 祖鲁人和布尔人的反英斗争

南非出产金刚石和黄金，各国殖民者在南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关系错综复杂。英国以开普殖民地据点，一再向东北、西北和北部扩张。1877年英国吞并了布尔人的德兰斯瓦尔共和国。为了阻止布尔人向东部沿海地区发展，1878年英国又要夺取祖鲁兰，消灭祖鲁人的国家。

祖鲁人属南非东班图人的一支，英勇善战，居住在南非纳塔尔地区。19世纪初，在恰卡领导下，祖鲁人逐渐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组织过渡。1828年恰卡死后，其弟丁刚继位，采取了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发展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反殖民侵略的严密军事组织。国王开芝瓦约在位时，决心保卫国土，反对英国侵略者。

1878年12月，英国殖民当局向祖鲁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开芝瓦约解散军队，接受英国官员的监督，并限期一个月答复。开芝瓦约召集酋长和长老会议，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1879年1月，英军入侵祖鲁兰。祖鲁人在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大败侵略者。但是，开芝瓦约没有利用有利战机乘胜追击，给了英国殖民者调集南非援军的机会。3月英军开始反扑，祖鲁人仍多次打败侵略者。7月4日，在乌伦迪决战中，祖鲁人损失惨重，开芝瓦约被俘，祖鲁人的抗英斗争失败。

英国殖民当局害怕祖鲁人再强大起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段，把它分成13个小国，扶植一些傀儡政权进行统治。1887年，英国正式吞并祖鲁国家，把它合并到纳塔尔殖民地。

祖鲁人失败以后，英国殖民者与布尔人的矛盾突出起来。1887年，英国吞并了布尔人的国家以后，在普里托利亚成立了由英国官吏组成的政府。由于布尔人和祖鲁人之间也有矛盾，布尔人没有利用祖鲁人抗击英军的有利时机进攻英国殖民者。1880年布尔人开始了反英战争。1881年2月，在马茹巴山战役中，布尔人击败英军，英国被迫同布尔人议和，恢复德兰斯瓦尔的独立。

(2) 色西尔·罗兹的扩张政策

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扩张过程中，色西尔·罗兹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者，并成为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理（1890—1896年）。他于1871年到达南非时，正是钻石矿发现以后。他很快吞并了许多小公司，垄断了当时占全世界产量90%的钻石矿业。1890年前后，他组织的南非金矿公司又垄断了金矿开采企业。他扬言英国人要征服全世界，在非洲实现“开普—开罗”计划，把英属南北非洲连成一片。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英国在吞并贝专纳以后，继续向北扩张。这时南非只有马达别列人和马尚人的土地没有被瓜分。1888年2月，英国抢先与马达别列酋长洛本古拉订立所谓“友好条约”，规定洛本古拉不得到英国许可不能与任何人进行谈判，不能将任何部分土地出售或割让。后来，罗兹又骗取洛本古拉同意，得到开采全境矿产的特权。1889年罗兹组织南非公司，得到政府特许状，拥有了在德兰斯瓦尔以北和莫三鼻给以西地区的行政、立法、开发、设置军警和分配土地等各种大权。

洛本古拉发现被骗后，拒绝批准条约。马达别列人举行起义反抗英国殖

民者。1893—1894年，英国以武力镇压了马达别列人的起义。马达别列人和马尚人的土地被占领后，这片土地以罗兹的名字命名为“罗德西亚”。

1895年12月—1896年1月，罗兹策划偷袭德兰斯瓦失败。以后揭露出罗兹与颠覆约翰内斯堡的活动有牵连，被迫辞去开普殖民地总理职务。

（3）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荷兰殖民者在南非建立开普殖民地后，从荷兰、法国来的移民，主要在这里经营奴隶制农牧场，他们自称布尔人（意即农民），实际上他们是农牧场主。在英国统治时期，布尔人与自己祖先的故乡荷兰失去了联系，不再称自己是荷兰人，而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了。布尔人不愿忍受英国人的压迫，试图离开开普殖民地。1838年，他们用武力赶走祖鲁人，占领纳塔尔，建立了第一个布尔人的共和国。1844年，英国宣布纳塔尔与开普殖民地合并，取消了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布尔人坚决不服从英国人的统治和管辖，向奥兰治河与瓦尔河地区迁移。这一过程也加速了布尔民族的形成。19世纪中期，形成了两个大的布尔人共和国，一个是德兰斯瓦共和国，另一个是奥兰治共和国。

英国人正式承认布尔人的共和国不久，在瓦尔河和奥兰治河的汇合处发现钻石矿，后来又在德兰斯瓦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于是，英国加快了夺取南非北部的步伐。英国人企图说服布尔人建立南非联邦，但是遭到拒绝。英国人决心以武力征服布尔人，布尔人也严阵以待。

1899年10月9日，布尔人向英国发出照会，要求英国把集结在德兰斯瓦边界的英军和近期调入南非的一切军事力量全部撤走；并保证今后不再向南非增派军队；有关两国的争端问题交第三国仲裁，并限24小时内答复。次日，布尔人抢先向英军发动进攻。战争之初的两个月，布尔人处于优势，一度攻入开普殖民地。但到1900年，英国大量增兵，陆续占领主要城市。1900年12月，英国宣布吞并了德兰斯瓦和奥兰治。但是布尔人没有停止反抗，由阵地战转为游击战。这场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02年签订了《韦雷尼京和约》，英国吞并了两个布尔人共和国，英国政府给布尔人300万英镑作为“补偿”。

英布战争，对布尔人来说，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世界进步舆论都同情和支持布尔人。

（4）马达加斯加人民的反法斗争

世界进入近代之际，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各部落开始向封建制度转化，以伊默利那人最为先进。他们在中部高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到19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全岛的统一，奠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

19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加紧了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侵略活动，遭到了马达加斯加人民的反抗。他们只是占领了东部的几个小岛，同时取得了通商的权利。1883年，法国借口侨民遗产继承问题，要求对西北部萨卡拉瓦人的保护权和对伊默利那国家的外交控制权。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女王拒绝。法国立即炮轰马占加港，挑起战争。在女王领导下，全国人民英勇抵抗，战争持续两年。1885年12月，女王被迫签订条约，承认外交权由法国支配，并把第亚哥、苏勒士港割给法国。

1895年，法国又以保护条约实施为借口，要求驻兵首都，被拒绝后，法国炮轰大马达威港，再次挑起战争。马达加斯加人民英勇抗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军花费半年时间，最后于9月30日攻入首都塔那那利佛。10

月1日，女王再次被迫签订保护协定。1896年，法国宣布吞并马达加斯加岛。但是，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抵抗运动一直坚持到1904年。

（5）南非种族隔离的出现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652年4月，荷兰人抵达开普敦，在那里开始建立殖民地的活动。当地以狩猎、采集和放牧为生的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有的被消灭，有的被赶到西北部的卡拉哈里和纳米布沙漠，有的沦为奴隶。也有一部分人因与白人发生性结合而被同化，成为后来混血种人的先辈。1657年，首批荷兰移民在开普斯贝克河畔建立农场，从非洲各地以及印度等国运来许多奴隶，也把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变为奴隶，依靠奴隶劳动发展农场。这期间也有法国移民迁入。荷兰人和法国人视自己为优等民族，并用行政权力和教会来强化自己的特权地位，用法律把居民正式划分为欧洲人和奴隶。德兰斯瓦共和宪法明文规定：“不论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国家里，黑人和白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

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了英国在南非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通过8次战争，占领了比英国本土大4倍的南非土地。1853年英国制定开普敦殖民地宪法。该宪法剥夺了大多数非洲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极少数非洲上层人士得到了选举权。英国殖民者还发明了“土著保留地制度”，把非洲人赶到保留地作劳动力储备起来。保留地的土地贫瘠，黑人那里受到饥寒贫穷的折磨，被迫廉价给殖民者做苦工。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理西尔·罗德在1894年提出“非洲土著法案”时宣称：“土著应该留在土著保留地，根本不能同白人混在一起”；“我们就是要做这里居民（黑人）的统治者，而把他们放在被统治地位”；“他们不应有选举权，因为我们不能让他们跟我们处于平等地位”。“土著保留地”的形成和罗德对“土著法案”实质的解释，为后来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英布战争以后，整个南非都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既统治着黑人，也统治着布尔人。但是白人在南非处于绝对少数，而黑人拥有威胁性的多数，他们不断反抗白人殖民者的统治。这样，也促使彼此敌对的欧洲白人走向联合。经过多次谈判之后，1908年召开了开普殖民者、纳塔尔、德兰斯瓦和奥兰治共和国国民会议，就新自治领地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1910年5月31日，建立了全部由白人组成议会的南非联邦。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联盟，实质是维护欧洲白人对非洲黑人剥削和压迫的种族歧视的国家。

总之，在1910年以前，英、荷殖民者在非洲实行种族主义政策主要表现为大肆杀害黑人，并制定了某些种族歧视的法令；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以后，白人的种族主义统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通过白人政权的立法活动，使种族歧视法制化、制度化。1910—1948年间，制定的种族主义法律达49项之多。

[美]理查德·吉布逊：《非洲解放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十三、近代后期的拉丁美洲

1.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

(1) 军事独裁统治——考迪罗主义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巴西除外)都建立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由土白人大地主阶级把持政权,唯有海地建立了黑人共和国。土白人政权是一种军事独裁制度,称为考迪罗主义(“考迪罗”是西班牙文“首领”的译音)。

考迪罗主义是拉丁美洲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盛行大地主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政治、经济方面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竭力勾结教会势力,并以军队为支柱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军事独裁权力不是世袭的结果,也不是来自选举,而是来自无数次战争与“革命”(或说是军事政变)。因此,它是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一种政治制度,是通过暴力夺得的政权,又是以暴力来维持的一种政权。

由于考迪罗主义的统治,许多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政变和内战连绵不绝,社会混乱,政局动荡不安。玻利维亚在 74 年内发生 60 次“革命”,哥伦比亚在前 70 年中发生 27 次内战,秘鲁在独立后的 100 年间更换 50 多位总统,智利在 12 年中制定 5 部宪法,墨西哥在 1824—1848 年间发生 200 多次军事政变。

在考迪罗独裁制度下,宪法形同废纸,人民毫无政治权利。黑人和印第安人受到歧视。“考迪罗”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经常向外国借债,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这为外国资本的渗入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提供了方便条件。

(2) 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工人运动

19 世纪,拉丁美洲各国的农业、采矿工业和某些轻工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各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在一些国家中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出现了第一批工人组织。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出现了第一国际支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 90 年代,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建立了社会党,并创办刊物,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墨西哥在 1878 年建立了社会党,并出版了《社会革命报》。在 20 世纪初,拉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掀起罢工高潮,给帝国主义及本国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3) 欧洲各国的侵略和门罗主义

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妄图卷土重来。西班牙拒不承认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法国殖民者不断干涉海地和墨西哥。英、美、德的势力竞相渗入拉丁美洲。美、英主要通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干涉的手段,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

美、英在拉丁美洲争夺霸权的斗争很激烈。英国的势力较早侵入拉丁美洲。在 1825—1828 年间,英国就干涉过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战争,企图占领乌拉圭。1845 年,它又联合法国武装干涉阿根廷—乌拉圭战争。1862 年,英国宣布中美洲伯利兹河流域为英国殖民地。拉丁美洲独立以后,英国

通过贷款、直接投资及控制各国对外贸易等经济手段，在拉美各国获得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以至于控制了拉美各国（主要是南美各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使之在经济上成为英国资本的附庸。

美国早有控制西半球的欲望。早在 1808 年，美国总统杰斐逊就曾表示过，“要从西半球排除一切欧洲影响”。1811 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转让美洲任何土地给欧洲列强。1812 年，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对英国公使说：“你们保住你们的东西，但是把这个大陆的其余部分留给我们。”美国统治集团早就怀有对拉美的扩张野心，但是它独立较晚，力不从心，但又不想坐视欧洲殖民者把拉美夺走。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要点是：反对欧洲列强把美洲独立国家视为殖民对象，反对把欧洲的政治制度强加于美洲国家，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国家事务。这些原则后来概括为一个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被称为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

英国万般无奈地接受了门罗主义，这对年轻的美国来说是一个胜利，对拉美各国也是有利的，毕竟对刚独立的拉美国家提供了一种防御，使它们免受侵犯。门罗主义以它民主的形式、道义的精神和含混的措词，受到当时拉美独立国家的普遍欢迎。美国也因此标榜自己是美洲国家的保护者。门罗主义宣称的不殖民、不干涉原则在国际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美国并非不从事侵略扩张，门罗主义出笼之时，美国正忙于西部领土扩张。美国也从未尽过保护者的责任。80 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力量日渐强大，美国开始向拉丁美洲扩张，与英国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美国步步进逼，英国实力日渐不支。1898 年，美西战争的爆发揭开了美国向拉丁美洲全面扩张的序幕。

（4）美国在加勒比海霸权地位的确立

美国内战结束以后，迅速发展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并走上了争夺霸权的道路，其首要目标是争夺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与英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895 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宣称，美国在美洲大陆实际拥有最高权力，“它的意旨就是法律”，坚持在英国和委内瑞拉的纠纷中英国必须接受美国的仲裁，并逐渐排挤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势力。1898 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强占了波多黎各，使古巴成为它的保护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地位。在 1901—1902 年英、德、意制造的加勒比海国际危机中，美国以调节为由插手干预，宣称根据门罗主义原则，美国具有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国际警察权”。这样，就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偷换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1901 年，美国还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在尼加拉瓜开凿地峡运河的权利。1903 年，美国又从巴拿马政府手中攫取了运河开凿权和霸占运河区域的永久租让权。1914 年，美国在巴拿马地峡凿通了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加勒比海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美国湖”。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控制，从而确立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地位。

（5）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早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就开始了民间的贸易往来。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横渡太平洋的航路已经开通，中国的丝绸等商品经由马尼拉运往墨西哥，畅销拉丁美洲各地。19 世纪中叶以后，大批华工移居拉丁美洲。为了解决华工问题，中国和古巴、秘鲁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开创了中拉正式建交的先河。

早期赴拉华工，为加速拉美经济的发展和促进拉美的繁荣以及促进古巴独立和中拉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大多数华工都与外国公司订有“契约”，一般规定要为雇主服务8年，在此期间无人身自由，故有“契约华工”之称。他们与欧洲式自由移民有很大的不同。大部分华工是被西方殖民者人口贩卖公司所欺骗或拐骗和绑架到拉丁美洲的，所订契约也往往是被迫的，受到非人的虐待，可以视为“变相的苦力奴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中国总是处于被屈辱的地位，而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则不同。清政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交往中一开始就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友好相待，互谅互让，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差异和分歧：关于华工问题，双方约定“禁止掠卖、虐待华工，并改善华工待遇”；“双方都提出了发展双边贸易、直接互通有无的要求”；“一致确立了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平等互利原则”。在签订条约的有关领事裁判权条款中，一般都同意列入“有关限制领事裁判权”的原则。有关利益的均沾问题，双方均明确表示：“只有属于自愿让与别国的利益和按照互利原则给予利益，才授例均沾”。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拉丁美洲诸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是有良好的历史基础的。

2. 古巴三十年民族解放战争

（1）西班牙对古巴的统治和黑人起义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最大岛屿，风景秀丽，资源丰富，素有“安的列斯珍珠”之称。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古巴，使之沦为殖民地。当时，古巴以“糖和奴隶”闻名于世，被称为“蔗糖和奴隶之国”。为了从古巴牟取暴利，西班牙殖民者在古巴推行单一产品制，主要是生产蔗糖和咖啡。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大量从非洲输入黑奴。到19世纪中期，临近古巴的许多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都逐渐衰落，唯独古巴的奴隶制经济仍有发展。

19世纪初，在海地革命的影响下，1812年在古巴东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起义。起义者提出了建立独立的黑人共和国的口号。这一斗争得到了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支持。但是美国南部奴隶主总想吞并古巴，并不希望古巴获得独立。古巴的土白人奴隶主阶级害怕古巴的独立会引起奴隶制度的危机，因而甘心屈从于西班牙的统治，坚决反对古巴独立和释放黑奴。这样，西班牙继续维持了在古巴的统治。1844年，马坦萨斯省的黑人策划起义，准备用暴力推翻奴隶制度，建立黑人与白人权利平等的共和国。这次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流产。但是，古巴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并没有平息，19世纪中期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

（2）十年战争

1868年，在西班牙国内发生革命的有利形势下，古巴第一次民族独立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持续十年，称为古巴三十年解放战争的初级阶段。

1868年10月10日，奥连特省的自由派地主、著名律师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佩德斯，首先在他的庄园举行武装起义。他释放了自己庄园的奴隶，

参见《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9、330页。

参见《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9、330页。

把他们武装起来，作为起义的基本队伍。然后在马埃斯特拉山区的雅拉村召开大会，发表“雅拉宣言”，宣布起义的目的是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因此，起义得到了混血种人、黑人和华工的支持和拥护。起义很快扩展到东部地区。1869年4月，起义者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自由古巴”，选举塞斯佩德斯为总统，并制定古巴共和国宪法。

在制宪过程中，温和派和民主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民主派占优势，因而宪法在某些方面比“拉雅宣言”还有所前进。宪法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度；古巴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和受教育等民主权利；议会是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具有任免总统和总司令的权力。这是对个人权力的一种限制。宪法的制定给古巴人民极大的鼓舞，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起义队伍进一步扩大。

这次独立战争持续10年，但是一直没有扩展到古巴西部。一方面起义军给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起义队伍中的右翼分子时时发生动摇，准备与西班牙殖民者妥协。1873年塞斯佩德斯被俘就义。1877年10月，起义军在军事上严重受挫，西班牙殖民者加紧分化瓦解工作。“自由古巴”政府中的不坚定分子同意与西班牙议和。1878年2月，双方签订了妥协性的《桑洪协定》。西班牙被迫同意在古巴实行政治改革，大赦政治犯和释放奴隶。停战以后，西班牙并没有完全履行它的诺言。

坚持独立的马塞奥等革命将领拒绝接受妥协性的《桑洪协定》，他们转移到国外，继续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斗争。古巴国内的斗争此起彼伏。1879—1880年和1884—1886年都发生了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1886年，西班牙政府被迫宣布在古巴正式废除奴隶制度。这是“十年战争”的巨大成果。

（3）何塞·马蒂和1895年解放战争

何塞·马蒂（1853—1895年），是一位优秀的革命领导者和诗人。他生于哈瓦那一个贫苦的西班牙移民低级军官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反西班牙的斗争。为了古巴的独立，他奔走于欧洲和拉丁美洲。1880年他到达纽约，在古巴侨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1892年建立了古巴革命党。党纲明确提出，要“实现古巴岛的完全独立”。在古巴革命党的领导下，古巴第二次民族独立战争于1895年2月爆发。

起义仍首先在奥连特省打响，“独立或死亡”的口号很快响遍全岛。马蒂亲临战场指挥，身先士卒，不幸在5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起义者在马塞奥和戈麦斯领导下坚持进行民族独立战争。9月召开立宪会议，成立古巴共和国政府。到1897年，革命党政府控制了古巴近一半的领土，西班牙军几乎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西班牙自由党党魁萨加斯培承认说：“在我们派出了20万人和流了这么多血之后，在这个岛屿上，除了我们的士兵脚下踩着的土地以外，再没有一块土地是我们的了。”到1898年，全岛 $\frac{2}{3}$ 地区被解放，哈瓦那也被围困。

（4）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到美西战争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发展很快，其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洲列强。未曾赶上瓜分世界的美国开始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美国首先把打击目标对准西班牙，它最感兴趣的是西班牙在太平洋上和美洲的领地——菲律宾和古巴。古巴是大西洋通向美洲大陆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是通往墨西哥湾的咽喉；古巴可以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据点；美国在古巴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所以，

美国对古巴一直怀有侵略野心。早在 1823 年，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在给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的信中就说过：“不但物理学上有万有引力定律，政治上也有引力定律。正象树上苹果被风暴打下后必然落在地上一样，古巴一旦强行断绝了与西班牙的不正常联系，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只能倒向北美合众国，美国在同一自然规律的支配下也不能推开不管。”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即将上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想要制定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欧洲列强统统赶出美洲。我首先想从西班牙开刀。”

1848 年，美国曾出价 1 亿美元购买古巴，遭到西班牙拒绝。19 世纪上半叶，由于美国实力还不强大，它的扩张重点又在北美，它基本上采取了维护西班牙对古巴统治的政策。下半叶，美国的政策有改变，暗中支持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给予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建立了许多援助古巴起义的组织。美国统治者并不希望古巴获得独立，他们对古巴形势的推波助澜，目的是由美国来占领古巴，取西班牙而代之。

1898 年，正当古巴独立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美国开始插手，诡称支持古巴独立，骗取古巴人民的信任。1 月 24 日，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名，美国“缅因号”战舰开进古巴哈瓦那港。2 月 15 日，这艘战舰突然爆炸沉没，美国一口咬定“缅因号”是西班牙人炸沉的。以此为借口，并打着支持古巴的旗号，4 月美国向西班牙宣战。

古巴革命政府一再声明，古巴完全有能力解放自己，不需要美国在古巴登陆。欧洲各国也照会美国，恳切呼吁总统和美国人民采取仁慈和克制的态度。但美国总统麦金莱表示要坚决采取行动。麦金莱明确知道西班牙已经停战，并准备与古巴起义者谈判建立和平秩序，却仍然要求国会授权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4 月 19 日，美国国会要求西班牙立即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管理权，并从古巴岛及其领海撤出它的武装力量。20 日，美国向西班牙提出最后通牒，限两天内作出答复。21 日，西班牙拒绝美国的最后通牒，声明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22 日，麦金莱正式发布封锁令。23 日，西班牙宣布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25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法令。

美西战争持续不到 4 个月，就以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终。西班牙请法国出面调停。美国提出，西班牙应放弃对古巴的一切权利，应将波多黎各以及西印度群岛的所有小岛让给美国等。1898 年 12 月，签署了美西和约，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主权的一切要求，让美国军队占领该岛。和约未规定占领期限。古巴起义军全力以赴，打败了西班牙殖民军。但是，美国未让古巴作为交战的一方参加谈判，战后对古巴进行了全面军事占领。

在古巴，美国大力扶植亲美势力，同时用欺骗的手法解散了古巴革命军，使古巴完全处于美军控制之下。1901 年，古巴制宪会议通过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并把美国强加给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录列入宪法。“普拉特修正案”是美国议员普拉特在 1901 年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一条修正案，内容是：美国“为保护古巴的独立”，“有权对古巴进行干涉”，古巴应给予美国以建立煤站和海军基地所需的领土；古巴不得将自己的领土转让其他国家等等。从此，古巴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3. 墨西哥的胡亚雷斯革新运动

(1) 19 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北与美国接壤，南与委内瑞拉和伯利兹相邻。墨西哥的人口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居第二位，面积居第三位。墨西哥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闻名世界的古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台克文化都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创造的，1519 年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1522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1810 年 9 月伊达尔戈神父发动起义，开始了独立战争。1821 年墨西哥获得独立，1824 年建立了联邦共和政体。

墨西哥在独立后的 50 年中，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状态。1833—1855 年间，圣安纳先后 6 次担任墨西哥总统。以他为首的反动独裁政权代表大地主利益，残酷剥削农民，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困苦不堪。那一时期，国内经济混乱，财政赤字每年高达 1 千多万比索，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1846 年美国入侵墨西哥。1848 年 2 月，墨、美签订和约，墨西哥被迫将北部 23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给美国，相当于墨西哥国土的一半。内忧外患严重地影响了墨西哥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

(2) 胡亚雷斯革新运动

1854 年，贝尼托·胡亚雷斯发动武装起义，1855 年 8 月，推翻了圣安纳的独裁统治。胡亚雷斯（1806—1872 年）出身于印第安人家庭，青年时当过仆役，后来当律师，1858 年出任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政权基本上代表中产阶级利益，反对教会和大地主的统治，主张实行改革。胡亚雷斯主持制定了 1857 年宪法和三项改革法案，在墨西哥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这场革新运动遭到以天主教会为首的反动势力的疯狂破坏，最后爆发为国内战争（1858—1860 年），史称“改革战争”。

胡亚雷斯革新的主要内容是：主张政教分离，限制教会势力，没收和出售大地产，封闭修道院；21 岁或已婚的 18 岁以上的男子享有选举权，总统由选举产生等等。这次革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教权主义和军事独裁制度，有利于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次改革没有消灭大地产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大地产制。

1861 年，法国拿破仑第三联合英国和西班牙，以墨西哥政府宣布延期两年偿还外债为借口，入侵墨西哥，推翻胡亚雷斯政府，于 1864 年把奥国大公马克西米连扶上墨西哥皇位，企图把墨西哥再次变为殖民地。墨西哥人民在胡亚雷斯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终于在 1867 年打败了侵略者，光复了墨西哥城，并枪决了马克西米连。

胡亚雷斯在改革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胜利后，还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两次战争给墨西哥造成的破坏和困难是严重的，这使胡亚雷斯没有充分的机会来实行改革。胡亚雷斯改革的影响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来。这次改革成为墨西哥革新运动的先声。1872 年胡亚雷斯逝世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开始了争夺政权的内战。1876 年大种植园主狄亚士攫取了政权。

4. 巴西的废奴斗争和 1889 年的共和政变

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古代巴西为印第安人的住地。1500 年，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巴西，16 世纪 30 年代，葡萄牙人入侵，在巴西建立殖民地，1549 年任命总督。17 世纪，当地黑人宋巴领导的反葡运动持续 60 年。1807 年，法国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王室逃往巴西，巴西成了葡萄牙帝国的中心。1822 年，葡萄牙立宪主义者发动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巴西宣布独立，葡王

子佩德罗任摄政王。

（1）废奴斗争的胜利

巴西独立后，奴隶制度依然保留，佩德罗一世的专制统治和奴隶制度严重阻碍了巴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到 70—80 年代，废除奴隶制和消灭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已提上巴西资产阶级革命的日程。

为了自身的解放，黑奴举行过无数次起义，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参与废奴斗争。1870 年在首都里约热内卢成立了奴隶解放协会。1871 年皇帝佩德罗二世（1841—1889 年）颁布里约布朗科“胎儿自由”法令，规定自法令颁布后出生的黑人婴儿一律获得自由。1873 年巴西共和党通过专门决议，要求废除奴隶制度。1885 年巴西又解放年满 60 岁的奴隶，到 1888 年 5 月，全部奴隶被解放。在巴西统治了 300 年的奴隶制度终于被摧毁。

（2）1889 年共和政变

在废奴斗争取得胜利后，巴西人民又进行了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斗争。1889 年 6 月 11 日，正式提出“打倒王权，共和万岁”的口号。同年 7 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次共和运动的领导人是军官曼努尔·丰塞卡（1827—1892 年）。11 月 15 日，他和另外一位军官本杰明·康斯坦发动政变，占领政府机关，逮捕各部大臣，废除佩德罗二世，建立了以丰塞卡为首的“共和政府”。19 日，佩德罗退位，返回葡萄牙。

共和国建立后，巴西政局陷入动荡之中，1891 年才制定宪法。宪法宣布废除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规定政教分离，解散教会学校，凡有文化的男子都有选举权。

巴西的废奴运动和共和政变是不彻底的。解放了的奴隶没有获得土地，并转而成为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的农奴或雇农。共和政体的建立也没有根本触动封建势力的基础，政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手中。1891 年宪法虽然公布，但丰塞卡仍然实行军事专制统治，重要官职都由他委任。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 90% 以上，所以实行普选权完全是一句空话。但是，1889 年的共和政变仍然是巴西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标志，它为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

